

学习与实践

学习与实践
批判

12

1975

出版社
路5号
印刷厂印刷
0.25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 目 录

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 洪立新 (3)

坚持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的调查 《文汇报》通讯员、《文汇报》记者 (6)

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

——谈谈为农村办好函授教育的体会 中共上海市教育局委员会 (11)

必须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杨希康 (14)

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

.....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河口海岸研究室 (17)

不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复旦大学 延 风 (18)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评《水浒》的人性论 翟 青 (21)

《水浒》与“国防文学” 红 宣 (26)

-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 复旦大学工宣队员 汪祖根 (30)
- 《水浒》中的上山与下山 上钢五厂工人 彭大华 (31)
- 识破“潜身”术 严栋生 马宝英 (33)
- 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 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 沈 津 (34)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 抓纲促钢 大干快上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36)
- 为 商业工作要努力为工农兵服务 戴 泉 (38)
- 人 人民饭店为人民 徐 堃 吴宗英 (40)
- 民 立足工农兵 服务无止境
- 服 中共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委员会 (45)
- 务 从配棋子想到的 完绍元 (47)
- 三十万与三千万 李关良 (48)

文化战线

努力塑造好银幕上的英雄形象

- 看影片《第二个春天》札记 石 川 (50)
- 读诗漫评 徐缉熙 (55)
- 并非小事 陈大康 (60)
- 书评：“眼前二万里风雷”
- 评《儒法斗争史话》 黄 霖 (61)

近代史研究

团结战斗的凯歌

- 直罗镇大捷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吴云乡 (64)
- 汪精卫卖国记(上) 史 锋 (69)
- 华西见闻 金盛曦 (80)

一九七五年目录索引

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发展文化大革命中 涌现的新生事物

洪立新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和培育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老、中、青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等。这些新生事物象春天的幼苗，在社会主义的百花园里茁壮成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

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亿万人民群众对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充满了喜悦的豪情。而维护腐朽事物的国内外反动派则对此充满了恐惧和仇恨。阶级斗争的事实表明，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必然在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一问题上尖锐地反映出来。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必须热情扶植和积极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这里阐明了新生事物成长的普遍规律。当新生事物刚刚诞生时，旧的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生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因此，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的顽强反抗，必须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反动阶级拚命地维护旧事物，革命阶级则热情地扶植新事物。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新生事物茁壮地生长

的时候,标志着革命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反之,当新生事物受到严重摧残或出现夭折的朕兆时,就意味着面临复辟倒退的危险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代表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对之十分嫉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恶毒诋毁文化大革命和攻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主要是来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由于某些领域的革命进行得还不够彻底,某些领域中的旧事物还占有暂时的优势,以及旧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会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带来困难。有的时候,我们的同志由于鉴别不清,或者由于缺乏经验和工作上的缺点,同样会妨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新生事物的嫩芽在一场政治大革命中破土而出固属不易,而它的成长和发展则更要艰难曲折。我们要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严肃地批判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并且要帮助一些同志改变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同样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逐步取得经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看问题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决不能抓住新生事物不成熟、不完善的现象和支流,指指点点,埋怨指责。以教育革命来说,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教师上讲台,实行开门办学,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深刻变化,是本质和主流的一面。现在教育界就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主张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否定工人阶级对教育的领导权,诬蔑教育质量下降,鼓吹“智育第一”(实质上是鼓吹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反对培养又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一笔抹煞教育革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正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战斗评论中所指出的:“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又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条战线都选拔出一大批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这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新的力量。但是,新干部的成长和成熟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严格要求和热情帮助。

如果轻视对新干部的培养、教育，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抱冷眼旁观或幸灾乐祸的态度，甚至动不动就想“一棍子打死”，那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一边。新生事物在前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积极地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始终不渝地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命运、共呼吸。如果不积极参加培育和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革命实践，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立场就不可能坚定，遇到风浪就会动摇。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例，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一出现，就显示出了它对于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但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我们还缺乏经验，上山下乡工作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问题。这几年来，由于广大知识青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乡村，由于各级党委的加强领导，由于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支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成果的有效经验，从而保证了这一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我们对待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应当象列宁说的那样，“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对待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扶植还是扼杀，这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如果不正确解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毛主席早就为那些右倾保守分子画过相：“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的，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飞跃发展的客观形势。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正在深入开展的学理论、评《水浒》，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不同态度，使我们看到了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仍在继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继续作战，为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继续作战，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新的胜利！

坚持走从工人中培养 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的调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批示中，肯定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毛主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过了六天，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从这以来，七年的时间过去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但是，教育界在最近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为了批判这种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我们在最近对上海机床厂进行了调查。

新型的工人技术队伍不断壮大

七年来，上海机床厂坚持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新培养了三百一十多名工人技术人员。目前，全厂工程技术队伍中工人出身的比例，已从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五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五。

在这支新培养的工人技术队伍中，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出来的有一百十名（其中十人已支援内地建设），其他二百多人是通过三结合设计、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以及多种形式办学等途径培养出来的。此外，全厂还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四五百名技术革新能手。

这个厂新成长起来的工人技术人员，大多数是不脱产的。以七·二一工人大学目前

在本厂的一百名毕业生为例，其中七十二人仍在车间当工人，在参加劳动的同时也搞技术工作；另外的二十八名已脱产当技术人员，仍坚持参加车间劳动，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比如有一位第一期毕业生，原来是车工，毕业后分配在一车间轴套工段，先后操作过七个工种，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后来担任了施工员，仍不脱离生产劳动。他看到车间里搬运主轴零件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就和工人一起动手设计、制造了机械手，群众称他是“万能师傅”。这样的技术人员，打破了工种界限、等级观念，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受欢迎。

这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人技术人员，与旧大学的毕业生有显著的不同，他们不仅在生产技术岗位上积极发挥了作用，而且重视做政治思想工作。七·二一工人大学第一期的一位老工人学员，是二车间修理组组长，过去他性情急躁，工作简单化。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回班组的第二天，他就主动找组里对自己有意见的同志谈心，诚恳交换意见。他还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厂里有一台机床经常漏油，机修工和操作工互相埋怨、指责，问题不得解决。他在检查后，发现毛病出在一只油管螺帽没有拧紧。他没有就事论事地处理这件事，而是召集现场分析会，算了一笔浪费账，使大家认识到：要拧紧油管螺帽，首先要“拧紧”思想，从而提高了后方为前线服务的责任感。他在修理中遇到损坏的零件，就自己测绘，自己加工。有的机床经过他修理后，改进了结构，提高了精度。工人说他“讲政治懂理论，讲技术会设计，讲生产能动手”。象这样的技术人员，在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中是不少的。目前，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工人理论队伍成员，二十一人担任了班组长以上干部。一九七一年以来，以第一期毕业生为主完成的机床设计项目有三十多项，大部分已发挥了效用，其中有我国第一台全自动双端面磨床、加工直径一米六的大型精密外圆磨床、一机两用的曲轴外圆磨床以及数字程序控制凸轮磨床等磨床产品，也有十米深孔滚压衍磨机、高效双头镗铣机等其他机床。

这个厂通过七·二一工人大学等途径培养的新型工人技术人员，他们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多了，就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同时，可以逐步减少脱产的技术人员，有些技术工作可以在下面完成。二车间搬运大型零件过去靠手推平板车，需要的劳动力多，体力消耗大，工人迫切希望改成电动车。可是过去有的技术人员不敢搞又不想搞，说是这种改装设计“太简单”，“没油水”，实际上是嫌搞成了无名无利，搞不成却要丢脸，长期没有人接这个项目。这个车间的一名女行车工，掌握了设计本领后，主动完成了改装任务。工人们操纵着这台电动平板车，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自己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员搞的！

工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机床厂工人阶级技术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工厂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得到了进一步落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在工厂企业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以前,国家急需这个厂设计制造一种大型磨床,却被厂里个别领导人一脚踢了出去,断言这样的磨床非进口不可。一九七〇年在工厂设备条件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由工人技术人员为主,八十天就完成了这种大型磨床的全部设计工作,半年内就制造了出来。它的成本只有进口价格的四分之一。这就说明,坚持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就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工厂的技术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第二,促进了工厂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个厂一批又一批工人技术人员的成长,工厂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部门中工人成分的增加,使这些部门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据统计,这个厂的磨床研究所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共研究了一百九十七个课题,完成了一百二十三项,已用于生产的有一百十二项。而文化大革命前,虽然研究的课题繁多,但真正用于生产的为数极少。这个厂还有六七百名工人分别担任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兼职教师及参加辅导设计、带领实习、编写教材等教学活动,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工厂斗、批、改的积极分子。一九六八年调查报告中提到的那个工人技术员,现在已经担任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依靠全厂工人群众,编写出四百余万字的教材,其中《磨床设计制造》一书已公开出版发行。他们在教学改革中,勇于实践,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积累了经验,作出了贡献。

第三,促进了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改善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上海机床厂坚持走“七·二一”道路,为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补上实践这一课创造了条件。这个厂原有的三百五十名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参加过一年左右的连续生产劳动,有的几年来一直扎根在班组,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一九六八年调查报告中提到的那位“副博士”,在听到调查报告的当时,情绪抵触,把手上的钢笔扔在桌子上。现在呢,她在二车间参加近三年的装配劳动后,思想感情起了较大变化。她在设计工作中,经常到车间听取工人意见,认真学习实践经验,在设计工作中做出了一定成绩,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称赞。这个“副博士”身上所起的变化,说明了即使是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较深的从旧学校

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鼓励他们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大多数是可以改造过来并有所作为的。

第四，推动了全厂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个厂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六八年相比，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近一倍，向国家上缴利润翻了五番。七年来，共试制成功一百二十七种新产品，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一倍半。其中由工人技术人员担任主要设计的有六十四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多。我国第一台大型曲轴磨床、第一台大型螺纹磨床等不少重点产品，都是在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发表后，由新成长起来的工人技术员担任三结合设计组组长的。过去，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影响下，这个厂不肯接受特大型磨床设计制造的任务。现在，在工人群众促进下，只要国家需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九七四年大型机床的产量是一九六八年的三倍。

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成果。七年来，上海机床厂取得以上这些成就，是经历了一番激烈斗争的。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发表以后，上海机床厂面临着怎样坚持走好“七·二一”道路的问题。广大职工决心自己办一所工人大学，加速培养工人技术队伍。但是，在对工厂要不要办教育这一点上，认识很不一致。有的同志列举了种种理由：工厂不是教育单位，不要办；工厂没有办学条件，不能办；技术人员已经不少了，不必办。这些看法实质上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的结果，也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流毒的一种表现，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工人同志说得好，我们不但要生产出千百万台磨床，更要培养出千百万工人阶级的技术人员。

这个厂的实践表明，工厂要办好教育，必须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以液压车间为例：这个车间在开展职工业余技术教育时，有的领导把它看成是“额外负担”，主张教育与生产“各算各的账”，只给几个人，随你怎么搞。结果不但教育没有搞好，反而连生产也受到影响。工人批评说：把教育与生产对立起来，这也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一种表现。在工人群众的促进下，车间领导和大家一起重温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批判唯生产力论，认识到只有把培养人与搞好生产统一抓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适应工厂企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认识一提高，改变了作法。他们把编写教材与总结生产经验、提高车间技术水平结合起来，把联系实际进行教学与车间开展技术革新活动结合起来，在完成生产计划过程中学习有关专业知识。这样一来，车间出现了新气象。一九七〇年到

一九七四年，这个车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制造出专用设备三十多台，实现小改小革六百多项，车间的生产能力比一九六八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增长了两倍。这个车间的前后变化说明，工厂要办好教育，就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在工厂企业的内部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

培养工人技术人员是不是只学习技术知识就行了？不行。上海机床厂的经验是首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如果不自始至终坚持这一条，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有些同志认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厂的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多设计一些产品。这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事实说明，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固然需要掌握一些技术理论，但关键在于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厂有一个新成长起来的工人技术员，由于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在组织上需要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时，他却把手中的技术作为商品，向党讨价还价。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如果只管直线曲线，不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照样会出现“技术到手，人被夺走”的情况。近几年来，这个厂在培养工人技术人员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思想教育作为中心环节来抓，不断批判“技术挂帅”、“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克服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努力提倡为革命学技术，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培养新型的工人技术队伍，还必须坚持从生产实践中来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从上海机床厂的经验来看，选拔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上大学，这固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要做到毕业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思想斗争就更要激烈得多了。有的同志甚至这样说，当个普通劳动者，何必到学校学几年！这种看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七·二一工人大学没有把工人学员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件事，只看作是毕业以后的事情，而是在几年的学习期间，坚持使工人学员做到手不减油腻味，耳不断机器声，来来去去，上上下下，自始至终不脱离工人，不脱离生产。他们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坚持对“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等开展批判，教育工人学员立志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坚决服从革命需要，自觉、主动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七年来，上海机床厂的广大工人和干部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的伟大意义。他们豪迈地表示：一定要继续努力作战，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走下去，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造就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而奋斗！

《文汇报》通讯员

《文汇报》记者

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

——谈谈为农村办好函授教育的体会

中共上海市教育局委员会

城市大学为农村办函授教育，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两年来，在各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高等学校为农村举办的函授大学，已在五个省的十个地区招生九万余名，发放教材四十万册，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支五百多人的函授教师队伍和八千多名兼职教师队伍。广大函授学员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这个“广阔天地的新大学”，直接为农村三大革命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成果服务，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

当前，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辽宁朝阳农学院在这方面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先进经验。正是在朝阳农学院经验的进一步推动下，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的函授大学，正在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自己的贡献。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函授教育要为普及大寨县服务，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引导他们扎根农村，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学大寨，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今年以来，函授教育把组织学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有的结合学习理论对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进行了调查研究，有的请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介绍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史，有的开展了回忆对比活动，边疆地区还调查了老沙皇的侵略史和新沙皇的挑衅罪行，进行了战备教育。广大学员通过学习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深远的意义，从而更加坚定了坚持乡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安徽阜南县张寨公社大龚庄生产队担任队长的知识青年王小弟，参加《政治经济学》函授学习后，又组织本队一百六十多人一起来学习政治经济学，从理论的高度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改变了这个生产队的后进面

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些函授学习小组,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联系实际对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开展了讨论,批判了“物质刺激”,激发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事实告诉我们,帮助知识青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他们中间就会涌现越来越多的“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这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为了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迫切需要造就一支宏大的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在这方面,我们函授教育也担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安徽亳县立德公社近年来机械化程度提高很快,添置了很多农业机械,但由于维修力量跟不上,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人乘机钻了空子。这个公社十五名知识青年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农用柴油机》函授科目的学习,成立了五·七农机修配小组,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堵塞了资本主义的渠道。贫下中农称赞说:“啥时叫,啥时到,既省工,又省料,又修机子又宣传,建设农村立功劳。”这告诉我们,组织知识青年学习科学文化,是关系到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大问题。两年来,我们开设了《农田水利工程》、《植保》、《育种》、《拖拉机》、《电工》、《柴油机》、《化肥农药》等函授课程。知识青年掌握了科学文化,“如虎添翼”,许多人被吸收到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可喜的贡献。江西余江县石港公社二十三名知识青年,参加《植保》、《化肥农药》函授学习以后,成功地防治了稻螟虫等农作物病虫害,实现了粮食较大幅度的增产。吉林延吉县太阳公社十名知识青年通过《拖拉机》函授学习,利用废料自己设计制造了手摇翻斗车和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中耕除草机。我们还举办了《农村常见病防治》的函授,单吉林珲春县一地,经过两期函授,共有三百五十多人参加学习,其中百分之七十担任了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由于这些函授内容切合农村的实际需要,不仅知识青年积极报名,而且农村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都要求参加。

办好这些科技函授科目,也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智育第一”,引导学员为革命学好科学技术,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有少数学员在学习往往暴露出“知识私有”、“读书进城”等错误思想。我们在面授中,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既提高了觉悟,又学到了技术。黑龙江呼玛县开库康公社有个知识青年,担任了拖拉机手后,放松了思想改造。今年他参加了上海机械学院举办的《拖拉机维修保养》的面授班,联系自己思想实际,批判了“知识私有”观念,认识到“不抓人头,要翻车头”,同时,进一步掌握了有关专业知识,决心为贫下中农开好拖拉机。

为知识青年办函授大学,对城市学校来说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参加函授工作的,有全市十六所高等学校的教师,还有一些中学教师和医务人员。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要搞好函授工作,还需要不断改造世界观,才能从不适应到比较适应。复旦大学有几位数学教师来到云南西双版纳搞函授,开始遇到不少困难。有的同志怀疑这里开数学课有没有必要。后来他们进行了调查,发现光在当地农场就有许多数学问题需要解决。于是他们改进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深

有体会地说：“农村不是不要数学，而是不要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的‘纯数学’，只要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数学函授一定能取得成效。”大多数函授教师在自己工作中都曾经有过象这些数学教师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办大学，自己也深受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急需而大学原先没有的科目，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办，自己不懂的，就边学边教。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化工学院、上海纺织工学院等校的函授教师，了解到腐殖酸类的土化肥是一种新的肥源，虽然过去在大学里从来没有接触过，但他们把推广腐殖酸看成是打一场政治仗，到江西、黑龙江等有肥源地区开设了这门新的函授课，同学员一起翻山越岭寻找肥源，培养了一支土化肥队伍，促进了农业增产。教师在函授教育工作中思想上和业务上的提高，反过来对学校的教育革命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推动。

在教学组织形式和教育方法上，我们实行送学上门，就地办学，因地制宜，坚持业余为主，自学为主，函授与面授相结合，采取巡回辅导、办短训班、印发学习材料和函授通讯、书面提问答疑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学员带了实践中的问题来学习，通过面授辅导和互相交流，再回到实践中去应用；学用结合，边学边干，把精力集中在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那种认为这种办学形式是什么“不正规”、“小儿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只要适合农村特点，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函授教育能够取得一定成效，这是同各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各条战线的支持分不开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州党委领导下，调动了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函授教育搞得很有生气。安徽阜阳市新华公社党委，根据公社一九八〇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实际需要，在函授大学基础上，自力更生办起了公社业余大学，增设了《农机》、《畜牧兽医》两个科目，学员也从几十人增加到四百多人。各地党组织和许多业务部门积极派出兼职教师，提供实习基地，承办面授短训班。许多领导干部亲自为函授学员讲课。上海赴各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当地的工人、贫下中农、教师、干部和技术人员中选拔的兼职教师，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又熟悉本地情况，是办好函授大学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现在，各地党委都制订了普及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我们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一步把函授教育办好，从而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村函授教育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无比正确，有力地粉碎了那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指指点点、评头品足的九斤老太哲学。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的同志，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培育它，使它不断适应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函授教育虽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大好形势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学习朝阳农学院等单位的先进经验，促进函授教育这一新生事物进一步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必须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杨希康

〔编者按〕 杨希康同志在基层单位蹲点搞调查研究，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这种做法值得提倡。此文是根据他在一次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

(一)

我校数学系应用数学教研组有二十八个教师。他们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大多数教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教研组的面貌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注意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

这个教研组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开门办学，不断提高了工农兵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教师世界观的改造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几年来，革命师生共同战斗，在推广正交试验设计、管道网络和元件可靠性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先后为工厂、农村和研究所解决了近一百个实际问题，举办了三十多期短训班，受到了工农兵的赞扬和欢迎。他们在实践基础上，努力向理论方面提高，编出了《线性代数》、《统计数学》、《可靠性基础》等教材，出版了《概率初步》、《正交试验设计法》等书籍。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

(二)

一九七二年，这个教研组的教师在工宣队的帮助和教育下，深入工厂去搞调查研究。他们走访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所，结果没能找到一个有关统计数学的课题，有的教师泄气了，说：“数学有特殊性，要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是有困难的。”教研组针对这种状况，组织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为什么找不到课题？究竟是数学不能联系实际呢，还是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了所以找不到课题，是由于教师的知识

内容陈旧，不熟悉而且不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他们通过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认识到了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接受再教育，在业务上也必须进行再学习。他们继续深入工厂，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根据工业生产上的需要，学习正交试验设计的理论，改革不适当当前生产需要的、陈旧的教学内容。在上海橡胶制品二厂工人师傅的帮助、支持下，运用正交试验设计的理论，指导聚氯乙烯合成橡胶配方工艺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接着，他们又陆续为钢铁研究所等单位解决了一些生产上急需的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正交试验设计的不断普及，生产实践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有的教师提出，为了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数学理论水平，搞“理论储备”。当时，教研组同意了这一意见，办了一个片面追求系统理论的读书班，大搞“理论储备”，结果越读越没劲，越来越感到这种做法的方向不对头。教研组在提高了认识后，再次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大家认识到了这种片面地、孤立地强调“理论储备”的做法，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前那种所谓“打基础”的关门读书的老路。他们在转变了认识后，坚持紧密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去认真学习数学理论，在教学中，则注意引导学员深入实际，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在科学研究中进一步开展“产品可靠性”和“回归设计”的普及和提高工作。

吃一堑，长一智。走了一段弯路，前进了一大步。广大教师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有的教师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视实践、轻视普及的思想倾向。一遇适当气候，这种倾向就象沉渣一样，还会浮泛上来。特别是在处理普及和提高、实践和理论等关系的时候，这种反复和摇摆是经常产生的。但是，反面的东西是可以引出正面的经验来的。教研组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正确引导，使得反复一次就能提高一步。

教研组还注意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组里有一个培训班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她的路线觉悟较高，但理论知识不够，有人认为，象这样的教师应该多给她点时间读书，着重解决业务知识不够的一面。教研组吸取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沉痛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背离了无产阶级政治，走“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老路，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革命接班人。因此，这个教研组安排她与组内几位中年教师一起，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同时，又有意识地让她独当一面，解决一些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并结合实际问题，认真地读一点书，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她在组内教师积极帮助下，各方面进步很快，现正在积极编写讲义，准备上课。这个教师的成长过程，充分说明了教研组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师资培养路线，才能使青年教师健康地成长。

对老教师，教研组竭力鼓励他们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力求在使用中进一步改造他们。教研组中有一个老教师，到煤气公司去开门办学，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他跟着工人师傅日夜奋战，在工人、技术人员紧密配合下，和学员一起，把线性代数的理论用到管道网的设计上，较好地解决了煤气、水、电三用管道网设计中的计算问题，为三用管道网设计计算工作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这个教研组还有一位老教师，曾动过肾脏切除手术，身体不好，但仍坚持做到努力为工农业服务。他在学习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后,提高了觉悟,冒着大雨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作正交试验设计的讲座。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搞了几十年的数学,由于路线不对头,没有为三大革命运动真正解决过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现在路线对了头,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业出一点力,这可真是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啊!大家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感到:“路线不正,精神不振;路线搞正,干劲倍增”。

(三)

几年来,这个教研组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一些成绩,是由于始终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教研组正副组长带头学理论,带头讲路线,带头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全组教师团结、紧张、艰苦奋斗,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这个教研组的正副组长,认真看书学习,每次学习运动中,他们都力争学早些、学多些,而且联系思想,抓改造,见行动。过去,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下,这个组的有些干部和教师重视高年级课,轻视低年级课,还错误地存在着教本系课高级、教外系课低级的看法。这个教研组的正副组长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带头学理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主动承担和认真教好外系和一年级数学课的教学工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凡是外系和一年级数学课,组内教师都争着报名去教。

他们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遇到矛盾,依靠群众;遇到困难,知难而进。几年来,组里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教师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他们不仅要完成普通班的教学任务,到工厂讲课,办短训班,搞科研,还要接待和答复来信来访,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带头承担最困难的任务,并依靠群众去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在同中山医院一起研究针麻课题中的数据分析时,发生了困难,一时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有的教师因此流露了畏难情绪,但他们耐心地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激发教师为工农业服务的思想感情,大家边实践、边研究,终于找到了较好的协分量分析方法,顺利地解决了针麻数据分析中的困难。

这个教研组的教师团结一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自觉地做思想工作,主动关心同志。有一次,组里要动员一部分教师到农村去调查,其中有个女教师,由于家庭确有实际困难,对这次下乡思想准备不足。组长为这件事很着急,大家也很着急。有个教师建议为另一位去农村编《农用数学》的教师开一个欢送会,以便对大家进行一次为农服务的思想教育。那位女教师因病没来参加这次欢送会,组里的其他教师就给她介绍了欢送会上许多教师表示克服困难、积极争取下农村的决心,她听了后很受教育,在认识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回家后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作了安排,主动提出要到农村去调查。她说,每个人都有困难,家庭和身体不好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在这个学期,那位女教师还担任了一年级学员的班主任,虽然身体很虚弱,但工作很积极,主动想方设法,积极做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每天都是深夜回家,第二天又一早到校,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最近,他们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战斗历程,用教育革命取得的成绩驳斥了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决心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妥善解决前进道路中遇到的问题,百折不回地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河口海岸研究室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可是，教育界最近出现了一种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搞糟了。它的要害，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

事实胜于雄辩。请看一看我们研究室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深刻变化吧！

我们河口海岸研究室从一九五七年成立，至今已有十八年了。文化大革命前九年和文化大革命以来九年的对比，就极好地说明了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前九年，我们研究室的状况是，“论文出了近百篇，生产问题不沾边”。那时候，在“论文成名，专著成家”的口号影响下，引导青年教师搞个人奋斗，去爬那个修正主义的“小宝塔”。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们，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风里来，雨里去，开门办学，开门研究，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迅猛前进。

有一种论调说，“现在我们大学水平低”，“科研不抓，理论不提”，这完全是在造谣。自从一九六八年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我们研究室贯彻执行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有力地推动了河口海岸的研究工作。从一九六九年到现在，我们同工农兵一起战斗，取得了十六项比较重大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港口扩建、码头选址、航道整治、船厂选址、护岸保滩等等，直接为国防、生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在进行水文测验、地貌调查的过程中，对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上升到理论，得到了规律性的认识，反过来又促进了河口海岸工程的改造和建设。有一个港口，过去按照外国文献规定的海峡建港比例宽度，下了“不能扩建，不能发展”的结论。我们深入港口现场反复查勘，建立了三十九个观测点，取了一百多个海底底质样品，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查阅了近四十年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可以扩建和发展的结论，驳倒了外国文献上散布的悲观论点。这个港口扩建以来，万吨巨轮一直通行无阻，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诬蔑我们“科研不抓，理论不提”的谣言。我们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为教育革命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革命的成果不容抹煞。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决不允许倒退，一定要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继续胜利地前进。

不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复旦大学 廷 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深刻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在教育领域内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使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深入批判，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当前，教育战线同全国的其他各条战线一样，通过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种变革。”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不仅其本身的进行过程和由此引起的反应要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而且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也必将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争论，方能获得深刻的了解。当前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这场大辩论，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只有充分开展辩论，真正做到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才能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地进行下去。

这场大辩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看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领域内是否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领域内占了统治地位还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了统治地位？现在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要我承认十七年在教育领域内是黑线专政，除非太阳从西方出来。”这完全是在明目张胆地为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翻案。

革命人民决不容许翻这个案！

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这个地方，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变。在旧的教育制度下，层层宝塔“拔尖子”，工农子弟根本无法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

就是通过了考试关、分数线勉强挤进去了，不是被诬蔑成“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赶出校门，就是在爬那个“小宝塔”的过程中，被资产阶级所溶化、吃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最后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而向资产阶级投降了。那时的高等学校，培养的是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提倡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鼓励的是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结果是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于学校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缘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自从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以来，工人阶级领导了学校的斗批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讲师上讲台，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等一系列革命措施，原有的教员队伍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与提高，还出现了举办短训班、函授教育等多种新型的办学形式。学校正在被逐步地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革命每向前进一步，都必然要经过殊死的战斗。正当教育革命向前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错误思潮，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此，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问题的实质，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严肃的批判。

“读书做官”论该不该批？自从孔老二鼓吹“学而优则仕”以来，二千多年来，反动统治者都莫不以此作为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支柱。它既是剥削阶级及其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又是加在劳动人民脖子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教育革命堵绝了剥削阶级通过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途径，拆掉了“读书做官”的梯子，自然要招致他们的极端仇恨和敌视。刘少奇、林彪这类修正主义头子就都竭力鼓吹“读书做官”论，咬牙切齿地反对和否定教育革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依然存在，“读书做官”论就随时有冒头的可能，而我们对“读书做官”论的批判也就一天不能停止。

“智育第一”批得对不对？“智育第一”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在阶级社会里，从来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标榜什么“教育就是传授知识”，这完全是照抄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其目的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所谓分数线，历来是剥削阶级的生命

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又怎么能够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呢？

“关门读书”行不行？列宁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信赖的。”所谓“关门读书”，就是把学生关在资产阶级教育的囚笼里，灌输资产阶级的一套，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我们实行开门办学，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体制和方法的彻底改造。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实质上就是要恢复“关门读书”那一套，把经过这几年教育革命好不容易才打开的校门又重新关起来，关闭广大革命师生同工农相结合的门，也就是通向三大革命运动的门。这不是明显地鼓吹走回头路吗？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关门读书”的沉痛教训，记忆犹新，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自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开展以来，关于十七年的争论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论的焦点。林彪反党集团就曾公开宣扬：“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有很多功绩”，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他们妄图推翻毛主席所作的结论，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逻辑，既然教育战线上十七年的路线是“红线”，岂不是只要照着老路走下去就行了吗？岂不是根本就用不着搞教育革命了吗？岂不是在这条战线上的一切革命行为都应当视之为“过头”的东西而一笔勾销吗？林彪反党集团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正是反映了失败阶级妄图重新夺回失去了的世袭领地的意志和愿望。为此，我们必须向那些鼓吹错误论调的同志猛喝一声：“同志，你究竟想往哪条路上走？”

肯定还是否定教育革命，实质上就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些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目前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这场辩论不是孤立的事件，每个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关心这场辩论。只有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分清了是非，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评《水浒》的人性论

翟 青

《水浒》第一回，说的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从这段装神弄鬼的文字开始，一部《水浒》展开了一百零八个魔君怎样“去邪归正”的故事。搞清楚一百零八个魔君“去邪归正”说明了什么，是我们深入认识《水浒》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知道，《水浒》故事从南宋的民间传说到元末明初成书，这一段时期正是反动的程朱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为了论证封建秩序的天然合理性，程朱理学提出了所谓“天理”和“人欲”对立的哲学命题，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经。在程朱理学直接影响下写成的《水浒》，通过描写一百零八个魔君“去邪归正”的过程，形象地为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作了图解，狂热地宣扬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人性论。

《水浒》描写的去邪归正即“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开的。

宋江，在梁山上是天理的化身。但这天理受了人欲的蒙蔽，本性不明，因此，就必须经历一个灭人欲、存天理的过程。九天玄女娘娘不是说宋江“魔心未断，道行未完”吗？这里的“魔心”，也就是“人欲”。宋江在浔阳楼上，想起自己“名又不成，利又不就”，提起笔来，发了一通醉后狂言。尽管这醉后狂言，只是“忠为君王除贼臣”的牢骚，但终究夹杂着追求功名利禄的要求，这就是人欲占了上风。《红楼梦》里贾府的焦大，仗着酒醉以奴才的身分骂了两句主子，结果还免不了被塞了一嘴马粪。宋江发了那么大的牢骚，自然要弄得在屎尿里滚得

臭哄哄的，险些还掉了脑袋。“遭逢坎坷皆天数”，为了使宋江“灭尽人欲，复尽天理”，天老爷不仅要给宋江历经磨难，而且还要直接对宋江进行说教。于是《水浒》安排了“还道村受天书”的一梦。“还道”者，灭去人欲、复还天道也。经过九天玄女的一番教诲，宋江决心去邪归正，这对宋江的“灭人欲、存天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紧接着，宋江就按照九天玄女的神谕，在梁山上打起了替天行道的白旗。于是，悖逆天理的聚义厅改成了体现天理的忠义堂，逆天而行的梁山起义军变成了顺天、护国的封建朝廷御林军。这时，就连九天玄女也要称赞宋江“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肯定他“灭人欲、存天理”的成绩了。罗真人说宋江“一点忠义之心，与天地均同”，智真长老也说宋江“忠义根心”，宋江还吹自己是“忠肝包天，义胆盖地”。总之，宋江在除灭人欲以后，就成为天理的化身了。《水浒》不是说宋江“英灵上应天星”吗？的确，宋江在灭人欲、存天理的过程中，总是“逢凶化吉天生成”。到最后，天使送来了药酒，宋江不但心甘情愿地一饮而尽，而且还要拖上个李逵，灭了这个人造反者的人欲。人欲灭则天理存，连肉体都可以为了忠义而被毁灭，剩下的自然是纯而又纯的天理了。过去的好多文章，都说宋江之死是什么“悲剧结局”，其实，《水浒》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天理在宋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是对灭尽人欲、复尽天理的一曲颂歌。

号称“黑旋风”的李逵则不同。他的“魔心”已经成了“反心”。在他身上体现的灭人欲、存天理的过程，比起宋江来要曲折和艰巨。但李逵由于一点天良未泯，所以最后在宋江的感召之下，终于也成了正果。在宋明理学家的心目中，皇帝是上帝天意的体现。因此，“存天理”就不能反皇帝，反皇帝就是最大的悖逆天理。为什么李逵要反皇帝？《水浒》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李逵有追求快活的欲望。这种追求快活的人欲大发作，脑子里就连一点天理的影子也没有了。象李逵这一类真正不堪忍受封建压迫和剥削而起来造反的劳动人民，在《水浒》中都被歪曲成了人欲的化身。比如，刘唐是为了追求“一套富贵”，三阮兄弟是向往“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因而他们都被说成是天生成的“恶性”。他们“天性由来太恶粗”，“赋性从来要杀人”，完全不符合理学家的人性标准。《水浒》的作者正是从理学家的标准出发，百般嘲弄了李逵等人的人欲。李逵不是要接母亲来梁山“快乐几时”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李逵的老娘命里该苦，想过快活日子那就是人欲，就是恶性。因此，书中索性让她被老虎吃掉。《水浒》诗云：

“饿虎饿人皆为嘴”，把想过好日子的劳动人民骂成禽兽。其实，劳动人民要生存，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水浒》对此大骂，不就是要取消革命吗？因此，对于李逵这种无礼的“黑禽兽”，《水浒》要让他受尽磨难，不但要将他泡在水里浸得两眼翻白，而且要将他送在蓟州府里打得皮开肉绽。不过，在宋江软硬兼施的训斥或熏陶之下，李逵身上的“天理”总算逐步地显现了出来，在睡梦中还朝皇帝端端正正地“拜了三拜”哩！最后甚至让李逵去跟着宋江做“一个小鬼”，成全了宋江的天理。李逵既然连肉体都灭掉了，他的人欲自然也不存在了，剩下的不也是纯粹的天理了吗？

整个梁山“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以宋江为代表的天理战胜以李逵为代表的人欲的过程。理学家们认为，“性即是理”，人性就是天理的体现。他们想用一天理，把不同阶级的人性拉扯到一起，这是道道地地的超阶级的地主阶级人性论。《水浒》硬要把不同阶级的人性说成是统一的，恰好表明了它的理论基础是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最突出的，要算第七十一回描绘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场面了。在这里，从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到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不分贵贱”，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人们，都亲密地抱成一团了。这是为什么？“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原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人性，即天理。在反动的程朱理学看来，天理只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只要识得彼此心中的天理，那就什么矛盾也没有了。《水浒》的作者把这种境界叫做“识性同居”，这就是说，不同阶级的人有着共同的人性，可以亲密无间地相处。被《水浒》歪曲得不成样子的梁山泊聚义，不就是这样一种无耻捏造出来的所谓“识性同居”吗？

从“识性同居”一类的人性论出发，可以直接引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来。既然梁山上的投降派和反投降派可以“识性同居”，那么革命农民同封建统治阶级自然也可以“识性同居”了。果然，按照《水浒》作者的安排，李逵反投降同宋江投降之间的矛盾，梁山起义同赵宋王朝之间的矛盾，总之，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矛盾都莫名其妙地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最终，天理战胜了人欲，一百零八个魔君也终于“去邪归正”，替皇帝打别的魔君——不“存天理、灭人欲”的魔君去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人性论魔术啊！

然而，魔术师是难免不露出马脚的。鲁迅早就针对某些人通过《水浒》宣扬

的人性论鼓吹起阶级的“兄弟情谊”，一针见血地揭露过：“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说得是很深刻的。在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什么时候出现过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待的事呢？根本没有。就说《水浒》中的梁山吧，是不是作兄弟看，关键也还是要看是不是实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标准。如果都真是做到了存天理，那自然不妨“一般儿兄弟称呼”；如果死抱住人欲而不肯存天理，那就用得着宋江的一句话：要“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了。李逵要反皇帝，宋江就立刻撕破了骨肉情分的纱幕，几次要将他推出问斩。你看，亲亲热热的“兄弟称呼”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杀气腾腾的血腥叫嚣了吗？《水浒》在这里，从反面透露了宋明理学人性论的极端虚伪性、欺骗性和反动性。

宋江投降了，便去打方腊。这体现了作者挥舞天理的屠刀对着不肯感化的人欲斩尽杀绝的意图。在《水浒》的作者看来，田虎、王庆、方腊一千人，公然“改年建号”，南面称尊，简直是一伙不肯“存天理、灭人欲”的魔君，这是非斩尽杀绝不可的。《水浒》诗云：“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刚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就是理学家的人性论的善恶观。按照这样的善恶观，革命、造反都是“恶”。方腊一伙人欲横流，都是一群没有天理的“恶兽”。《水浒》派宋江征方腊，也就是去屠杀人欲。宋江既是屠杀人欲的英雄，又是不断完善天理的天神，怎能不受到《水浒》的热烈颂扬呢？

“留与凶顽做样看”，《水浒》正是为我们提供了程朱理学人性论的一个典型样子。“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理学家们所主张的人性，即地主阶级的阶级性。在《水浒》中，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被美化成至高至善的“天理”，说成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性。所谓“识性同居”，对于地主阶级内部来说，是要大家按照“天理”即地主阶级的纲常伦理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贪官、奸臣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不合天理，这就是《水浒》也要反一反贪官、骂几声奸臣的缘故。对于农民阶级来说，是要他们老实地跪倒在“天理”面前，连一点反抗的念头都转不得。如果有了要求革命的人欲，结果不是被感化，就是被杀灭。这就是《水浒》让一百零八魔君“去邪归正”的缘故。所谓去邪，也就是灭人欲，所谓归正，就是存天理，而对不肯“去邪归正”的晁盖、方腊等人，则让他们死于刀箭。可见，《水浒》

鼓吹“识性同居”一类人性论的货色，既是用阶级调和的说教阉割革命人民的灵魂，又是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屠杀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阶级调和的理论，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对广大劳动人民统治和压迫的一个思想工具。从儒法斗争的历史来看，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或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能比较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隐瞒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儒家就不同，总是玩阴谋诡计，搞欺骗。儒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反革命的经验，逐步使自己的反动说教越来越精致圆滑。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程朱理学，把人性说成是“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结合，鼓吹人人心中都有个“天理”，把地主阶级的阶级性扩展成为全人类的人性，这就有利于论证地主阶级统治秩序的合理性。这种说法，比孔老二、董仲舒、韩愈把人性分成等级并且认为是不可更移的理论，欺骗性要大得多了。《水浒》这部书，写一百零八个魔君怎样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成为名垂青史的“忠臣义士”，去人欲这个“邪”，归天理这个“正”，就正是体现了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政治需要。昏庸的金圣叹不理解作者的苦心，武断地认为《水浒》是在写“恶”。有个叫做泷泽马琴的日本人就不同意，指出《水浒》是在“劝善惩恶”，“一百零八个魔鬼似的人物都改恶从善，成了宋朝的忠义之士”。这个说法，倒是确实反映了《水浒》作者的本意。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们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可以看到，人性论是投降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要狂热地鼓吹阶级调和论，鼓吹向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投降的思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搞投降主义的，也都是宣扬人性论的。从人性论出发，可以直接引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直接引出地主买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在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水浒》宣扬的地主阶级人性论，批判形形色色的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有助于我们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水浒》与“国防文学”

红 宣

《水浒》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它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革命“围剿”时期所交的好运并未见衰。不过，那些赞颂《水浒》的文章，已经从“服从政府”转向“民族性”之类的题目了。同时，又有一批打着“国防文学”新招牌的《水浒》续作叫卖过市。有一个鸳鸯蝴蝶派文人说：“要充分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男儿的抗战意思”，“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选用”，而“用水浒人物”又最能写出“理想中情事”。这话说得不错。在当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无论是对于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王明之流，还是对于鼓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无疑都是再“合适”、再“理想”也没有的了。

早在二十年代，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就提出了《水浒》有着“民族性”的说法。他在连篇累牍的《水浒》考证中，强调《水浒》寄托着“故国之思”、“种族之痛”，表现了“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宿怨”和“心理”，把投降派宋江打扮成“民族英雄”。象胡适这样的洋奴、卖国贼，也居然在那里大谈《水浒》的“故国之思”、“种族之痛”，岂非咄咄怪事？原来，他看中《水浒》，就是为了利用《水浒》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一些《水浒》的续作者要“用水浒人物”写“理想中情事”，不仅是因为《水浒》“深入民间”，“可以引起读者兴趣”，更重要的是《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与“国防文学”一脉相连，可以使他们搞民族投降“自圆其说”。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北宋时期的宋辽、宋金战争，是中国境内契丹族、女真族贵族集团和汉族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契丹族和女真族都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具有较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遭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水浒》的欺骗作用之一，正是在于它通过对历史的篡改，用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它把“扫除边患、报效国家”作为宋江投降的重要理由，让宋江在菊花会上哼出了“统豺虎，御边幅”，“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的词句，以粉饰他“愿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叛卖行

径,甚至恶毒地用反对投降的吴用想投奔辽国来反衬接受招安的“爱国”意义。它还让宋江在征辽时打了个大胜仗,使这个投降派俨然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但是,这同金圣叹删去后半部《水浒》一样,是不真实的。北宋末年,真正抵抗外族掠夺和侵扰的主力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以宋徽宗赵佶为头子的封建朝廷则是“主和派”的大本营。只有冲破反动王朝的阻挠,开展反对大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抗击外族的侵扰。宋徽宗跪倒在外族贵族集团脚下当了儿皇帝,“一生只信忠义二字”的宋江还不是只能当汉奸吗?然而,正因为宋江是打着“御边幅”、“平虏”的旗号去瓦解农民革命的,是通过阶级投降的途径曲折地走向民族投降的,在那些妄图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眼中,在那些妄图借口民族斗争来取消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国民党反动派眼中,就成了非常“真实”的、非常有用的东西。可见他们鼓吹《水浒》“是一部伟大的民族作品”,这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水浒》所以被他们看得那么“理想”,不仅因为《水浒》用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更重要的还是《水浒》所宣扬的“忠义”可以为阶级投降锻造思想武器。《水浒》中宣扬的投降主义是通过对“忠义”的维护来实现的。“忠义”,就是要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水浒》中的宋江就是用“忠义”的绳索把梁山好汉一个个缚给了朝廷,绞杀了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又用“忠义”的屠刀镇压了方腊起义。宋江不过是人格化了的“忠义”观念。

四十年代吹捧《水浒》的文章和《水浒》续作中鼓吹的投降主义,也是通过宣扬“忠义”来体现的。在四十年代初有一本名为《水浒新传》的《水浒》续作,虚构了宋江等人受张叔夜招安后北上“勤王”抗金的故事。作者说,他的这部作品是为“抗战”而作的,因而书中的“忠义”也就染上了一层现代色彩。小说中张叔夜致宋江信中说,“忠宁重于爱国?”换句话说,要“爱国”就得“忠君”,因此,要“抗战”就得接受招安,成为“国军”(这个现代名词在书中是一再出现的)。“爱国”与“忠义”划上了等号,爱的就决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国,而是以“赵官家”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反动统治集团的国,也即作者心目中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按照这样的逻辑,梁山起义军顺顺当地成了“赵官家”的“勤王军”,“在尊王攘夷的狂澜里,去立下名垂不朽的勾当”了。

如果说《水浒》塑造了宋江这样一个人格化了的“忠义”观念,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复活了陈独秀尾巴主义的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之流就是现实的“忠义”迷。他们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鼓吹“统一作战,统一指挥”;而为了求得所谓行动的“统一”,又首先必须进行思想的“统一”,于是《水浒》中的“忠义”观念就很有用得着了。他们按照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新生活运动”的“统一”乐谱,唱起了“忠

义”的老调。那个曾经卖力兜售“国防哲学”、“国防文学”的陈伯达，就照搬当年胡适的腔调，起劲地鼓吹《水浒》“是一部伟大的民族作品”，把《水浒》所宣扬的忠、孝、仁、义吹嘘为中华民族的“极高的美德”。他在另一篇题为《新人生观的创造》的文章中，更是大谈其“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怎样“尽忠”、“尽义”呢？他自己做过一个很好的注脚：“只要于抗战上有利益，我们对于自己的同胞怎样折节忍辱都是可以的”，比如为了乞求抗战而“在市府门前跪一夜”，“这样的‘委曲求全’和‘卑躬屈节’的风格”，便是“为民族而知大义，识大体”的“伟大的人格”。请看：委曲求全、卑躬屈节、直到双膝下跪，这就是他们标榜的“大忠”“大义”。《水浒》和《水浒新传》中的宋江用“忠义”把梁山农民军“统一”到地主阶级那里去，成了“赵官家”的“勤王军”，而王明、刘少奇、陈伯达这批现实的宋江，则是企图用“忠义”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造成为蒋介石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勤王军”。这样的“国防文学”，只能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尽忠”，为蒋介石的法西斯小朝廷“设防”。

党内投降派借口“忠义”背叛革命，党外的反动派则用“忠义”召唤投降。两者是相互呼应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他们惧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决定将力量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紧接着又连续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条文，并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集中反动军队先后向陕甘宁、晋西南和晋东南等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则大搞什么“国民精神总动员”，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他们还大肆贩卖“忠、孝、仁、义”，强调用孔孟之道“辟邪说，正人心”，是“纠正”“错杂思想”之“唯一手段”。正是这种缘故，《水浒》中的“忠义”便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垂青和利用。各种《水浒》续作和其他“国防文学”一起卖力地响应着这个“总动员”。一部《水浒新传》，写的就是梁山头领如何屏弃所谓“江湖上的小忠小义”，树立起“大忠大义”。作者故意让梁山起义军中三阮、朱贵这批农民出身的头领去充当敢死队，以“上报朝廷大恩”，“洗去往年杀人放火的罪过”。当他们为“赵官家”拚命而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时，又让他们临死前发出过去“走错了路”，“于今自己也被人开膛，却不是报应”的忏悔。那个被描写成最懂得“忠义”的关胜则跑出来正颜厉色地说死得好，可以给后人做做“榜样”，“教那班为匪的，都来跟我们效忠国家”。这番话显然是说给共产党听的。

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人，实际上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他们向来把剥削阶级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利益，当他们的阶级私利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卖国的道路。蒋介石就曾露骨地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他们是死心塌地卖国到底，“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向这类人物尽忠尽义，结局只能是跟着他们一起向异族侵略者投降。《水浒》有意掩盖了这一点，而《水浒新传》却无意中把它点穿了。书中写到徽、钦二宗投降金人以后，宋江“上体圣上议和苦心”，听任金人蹂躏祖国大好河山，根本不敢出战，说什么“逞了血气之勇，却误了国家大事”。好一个“国家大事”，说得明白一点不就是“投降大事”吗？阶级投降与民族投降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忠臣”听“圣上”的，“圣上”听“金人”的，忠于“圣上”必然发展到忠于“金人”。这就叫“君为臣纲”，“上体圣上苦心”吧！可见，无论是阶级投降还是民族投降，它们的思想基础都是“忠义”：在《水浒》中，“忠义”是“替天行道”，忠于皇权，接受招安，并为了皇帝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在《水浒新传》中，“忠义”则表现为“尊王攘夷”，为了皇帝忍辱负重，直至做出“最大牺牲”。既然“平盗”、“攘夷”都是以“尊王”为转移的，当皇帝需要苟且偷安的时候，又必然跟着去投降外族贵族集团了。阶级投降主义必然导致民族投降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忠义”又是连接这两种投降的纽带。正是在这根纽带，上，《水浒》、形形色色的《水浒》续作同“国防文学”攀到了一起。

然而还有走得更远的。那就是直接用“忠义”为侵略者和汉奸辩护了。在另一本《水浒》续作《水浒外传》中，就塑造了一个具有所谓人性的“侵略者”——金将占罕。这个文学形象实际上是蹂躏中国河山的日本侵略者的化身。小说竟让阮小七的女儿萧桂英为了解救花荣的儿子花逢春出险，舍身嫁给占罕；嫁到金营以后，萧桂英渐渐发现“占罕是个好人”，因此既爱花逢春，又爱占罕。对于这样一个毫无民族气节、出卖灵魂的汉奸，作者居然还要让顾大嫂对她大大歌颂了一番，肉麻地吹捧她在收复石碣村中的“功绩”和“贡献”，把她美化成“民族英雄”和“护国娘娘”。这里的萧桂英宛然又是一个赛金花。如果与赛金花有什么不同的话，只在于这个萧桂英最终还是陪同占罕服毒自尽了，临死前还对花逢春念着“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句，表达了她做汉奸就得做到底的决心。这样的“救亡”之作，究竟是爱国主义的还是卖国主义的，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忠于皇帝，背叛革命，到为了皇帝去“平盗”及“勤王”，到跟着皇帝向异族投降，这就是“忠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必然归宿。从“忠义”既可以引出阶级投降主义，又可以引出民族投降主义。《水浒》就是这样的一部为一切投降派所信奉的圣经。评论《水浒》，有助于我们识别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到底。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

复旦大学工宣队员 汪祖根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当然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但是，《水浒》作者写这个故事，则又自有其寓意。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这是《水浒》赞扬鲁智深这一“侠义”行为的两句诗。作者的这种“不平”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压迫的不平吗？完全不是。小说第四回说金翠莲“结交”了大财主赵员外，被“养做外宅”，过着“衣食丰足”的生活。这时，作者笔下的鲁智深在撞着金家父女后非但不怪，反而感于赵员外的宾礼相待，主动要与赵员外“结为相识”，甚至许愿“但有用洒家之处，便与你去”，大有为朋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之气概。

为什么作者要写鲁智深对镇关西感到“不平”，对赵员外又感到“平”呢？金翠莲在镇关西和赵员外那里，同样是做“小”，不过前者是“强媒硬保”、“虚钱实契”被骗了去；后者是“做媒结交”，自己送上门去。骗了去也好，送上门去也好，对金翠莲来说，都是充当地主老财的奴婢，并没有改变受压迫的政治地位。在作者笔下，鲁智深对金翠莲在镇关西那里感到“不平”，仅仅是“不平”于她没有做稳小老婆；对金翠莲在赵员外那里感到“平”，是因为她得到了好的归宿。镇关西太霸道，没有一点仁义道德的外衣，对封建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要让他吃鲁智深的拳头；赵员外乐善好施，恪守封建伦理纲常，专讲王道，所以要鲁智深去当他的奴才。这就是作者“平”与“不平”的人生哲学，是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的体现。

写到这里，想起了《红楼梦》里的焦大。尽管焦大与《水浒》作者的经历和教养都大相径庭：一个眼睁睁见了“不平”便破口大骂；一个则将心中之忿用来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但是，焦大的“不平”与《水浒》作者的“不平”并无二致。焦大骂贾府那些不肖子孙“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本意是希望贾家这百年望族香火不绝；《水浒》作者对镇关西、高俅一类人物的“不平”，也并非是要将封建社会的一套婚姻制度以至整个封建制度都用禅杖砸个稀烂，而是要大大小小的镇关西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上面做得巧妙一点，从

而使整个封建制度都长治久安。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作者俨然又是一个焦大。

从一部《水浒》看来,作者的心腹之忧倒不仅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几个镇关西,他最耽忧的还是广大深受封建压迫的怒气冲天的贫苦农民。作者竭力造成一种幻觉,就是要人们相信,天下不太平仅仅是由于在下的镇关西和在上的高俅一类人不讲仁义道德。你们有什么不平吗?就等着赵员外式的人物出来乐善好施,就等着鲁智深式的人物出来打抱不平好了,根本用不着革什么命,造什么反,用不着去触动封建制度,就会有好日子过的。可见,竭力颂扬鲁智深“杀尽不平”的另一效用,就是麻痹贫苦农民的觉悟,消弭他们胸中的不平,永远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

但是,就连这种拳打镇关西式的“不平”,《水浒》作者终究还是不放心的。鲁智深的“不平”对封建统治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威胁,但是封建统治者和《水浒》作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昏庸的头脑中,拳打脚踢的奴才无论如何要比俯首帖耳的奴才危险一些。对农民革命烈火的恐惧,使他们对世上的任何一点小乱子都心惊胆战。因此,《水浒》一方面歌颂鲁智深“杀尽不平”的行为,一方面又将这种暴力行为归结为“魔心”。书的结尾,作者让鲁智深看破功名世俗,“心灰意冷”,“只图寻个净了去处”,结果“善终坐化”,并一再宣传这才是“方成正果”,其意图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水浒》中的上山与下山

上钢五厂工人 彭大华

在反动的封建国家机器的压迫下,要革命,往往得上山。有句俗话说叫“逼上梁山”,意思是说凡是上梁山参加起义的人都是“逼”出来的。但这“逼”,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梁山上头领有一百多人,如果以为凡是上了山的,就都可以“一般儿兄弟称呼”了,山上就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无差别境界”了,那就很不妥当。

只要将这一百多人上梁山的原因和方式比较分析一下,便能发觉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人虽是被“逼”上山,但一旦上山,便要占住梁山,“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如阮氏三兄弟、李逵诸人;而另一种象宋江、卢俊义诸人,却是上了山又下山,下了山再上山,直到“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地步,才算“暂借水泊栖身”,但还是眼睁睁望着山下什么时候吊起一

只大赦的“金鸡”来接引自己下山。

之所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因为两种人的阶级地位截然不同。山下是两大阶级的生死对抗，山上也决不是世外桃源。象阮氏三兄弟，原是石碣村的贫苦渔民，由于深受“官司”压迫，早就“几遍商量”要上梁山。又如李逵，系贫农出身，流落江湖，衣食无着，所以一听得上梁山是条出路时，便跳将起来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山下对他们说是水深火热的地狱，所以，要上山建立一块革命根据地，并打出一个理想的农民江山。而宋江、卢俊义等人都是地主，两脚踩在自己的地产上，双眼还巴巴地望着朝廷的禄位。因为高俅一伙打碎了他们在山下的天堂，他们才迫不得已地上了山。阮氏三兄弟、李逵诸人的“逼上梁山”，是因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宋江、卢俊义诸人的“逼上梁山”，则是地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所以，两者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当革命以汹涌之势向前推进的时候，山下剥削阶级的营垒是会发生分化的，就会出现相当一批在地主阶级内部受排挤的人上梁山的现象。对此不必害怕，也不应象王伦那样紧闭山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在一条正确路线下，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可以在山上的革命熔炉中逐步改变自己的立场的。如林冲原是朝廷军官，是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才上山的，但他“自上梁山泊后，大小五七十阵，未尝挫了锐气”，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但是也有的人虽上了梁山，目的却是“暂据水泊，专等朝廷招安”。象宋江就是。对于这种人，革命派原应提高警惕，时刻提防的。然而很可惜，象李逵这样的人，只看见宋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就尊之为“哥哥”和首领。而宋江一上台，就搞投降主义，要把梁山上的人一个个地“逼下梁山”哩。

唠唠叨叨的“忠义”说教，是“逼下梁山”的精神准备；拆城毁垣、十日大买市，属于从物质上搞“逼下梁山”。然而，山寨里的人并非都是被“逼”下梁山的。象卢俊义、关胜这类反动立场从未改变的人，是欢天喜地滚下山去的。而象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尽管反对投降，但终于被“义”字束缚住了手脚，为宋江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他们应当说是被骗下梁山的。然而他们要重上梁山的心并未泯灭，李逵临死前大叫“反了罢”就是一个明证。

一百零八人上山后又统统下山，归根结蒂是《水浒》作者为宣扬投降主义主题而作出的反动安排。但是，他虽然在小说中把一支农民革命军逼下了山，而实际上，这山暗了那山亮，农民反抗斗争决不因此而止息。只要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存在，农民总归要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的。如果说还要下山的话，那就是杀下“梁山”，杀上“东京”，向整个地主阶级统治发起冲击。这是《水浒》作者和封建地主阶级所不愿想象的，然而却是历史的事实。

识破“潜身”术

严栋生 马宝英

“潜身水泊”，是宋江潜伏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充当内奸的自供状。宋江投降的全过程，是靠反革命两面派而实现的。

鲁迅说过：“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从宋江在浔阳楼上说自己要“潜伏爪牙”，到跪在赵宋皇帝面前讲自己是“潜身水泊”，两个“潜”字，都表明了宋江是潜伏在农民起义队伍里的内奸，是破坏农民革命的蛀虫。

“潜身”就是伪装。宋江要“潜身”，就要“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宋江是怎样伪装的呢？其一，用“天意”来神化自己。宋江一上梁山泊，就大肆宣扬东京街头的所谓小儿歌谣，使梁山起义军头领们认为他“正应着天上的言语”，推举他坐了山寨第二把交椅。其二，用“义气”来掩饰自己。在许多场合，宋江用了“同生同死”、“生死相托”以及“患难相交”、“兄弟情份最重”的花言巧语，来骗取大家的信任，为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服务。其三，用“让位”来抬高自己。宋江要骗取起义军将士的拥护，便通过一次次的“让位”，使朝廷将官、豪强地主跟随他，使起义军将士信服他，既猎取了“让贤”的美名，又达到了篡权夺位的目的。

“潜”原是为了“伸”。当宋江处于不利情况的时候，例如在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险些丢了脑袋，他就只得潜伏下来，钻入梁山，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公开打出了投降的白旗，把梁山起义军引上了投降的绝境，最后凶相毕露地对方腊等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屠杀。李逵等正是被宋江“潜身”时春风满面的兄弟称呼所迷惑，因而上了大当。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潜入革命队伍中的内奸，总是以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出现。他们都有一套“潜身”术。宋江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请看：宋江上梁山是“潜身”，林彪投机革命也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宋江善用“权谋”，林彪也大耍“韬晦”之计；宋江口蜜腹剑，林彪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表里不一。宋江是为了受朝廷招安，林彪是为了“克己复礼”。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宋江、林彪这些潜伏的“蛀虫”，比明火执仗的敌人更为阴险，披着革命外衣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危害更大。他们能起到公开的敌人所起不了的作用。我们要识破他们这一套“潜身”术，以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蓬勃地向前发展。

关于新发现的 《京本忠义传》残页

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 沈 津

我馆最近在评论《水浒》的过程中，清理了馆藏《水浒》的各种版本，发现两张旧书封面内页的衬纸，内容为《水浒》中“三打祝家庄”残文。残页中缝标名为《京本忠义传》，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双鱼尾不等，四周单栏，边框长十九厘米，宽十二点五厘米，残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和上半页三行，间有断句，字体方正，皮纸精印。经鉴定，《京本忠义传》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此书各公私藏家书目均无著录，比今天所见其他《水浒》各本更近于原本面貌。

自明代中叶以后，《水浒》由官府、私家和坊间多次刊刻，流传很广，现存明刻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几乎都题名为《忠义水浒传》，如明郭勋刻本、嘉靖刻本、万历天都外臣序本、万历容与堂刻本、明末四知馆刻本、杨定见序本，都以《忠义水浒传》题名。这次发现的残页干脆题名为《京本忠义传》，还是第一次见到。即使版心所题是简称，以前也未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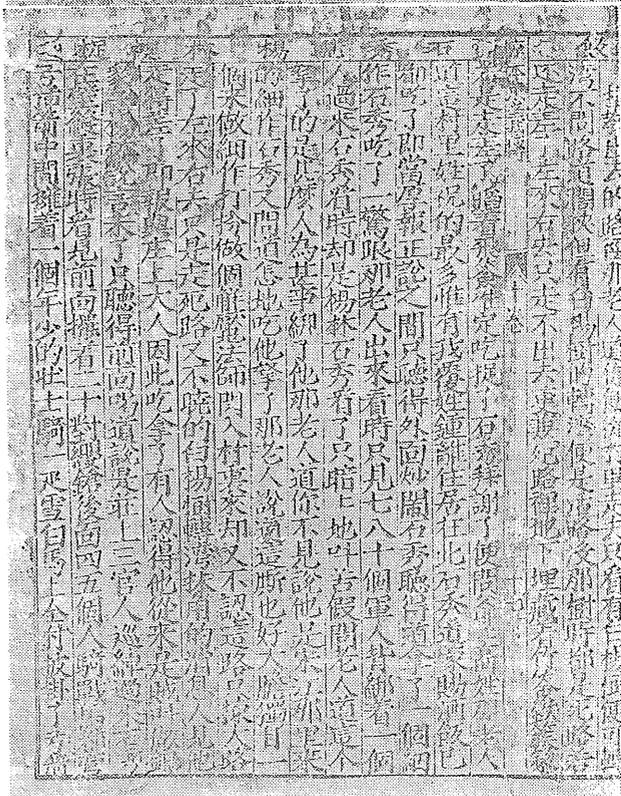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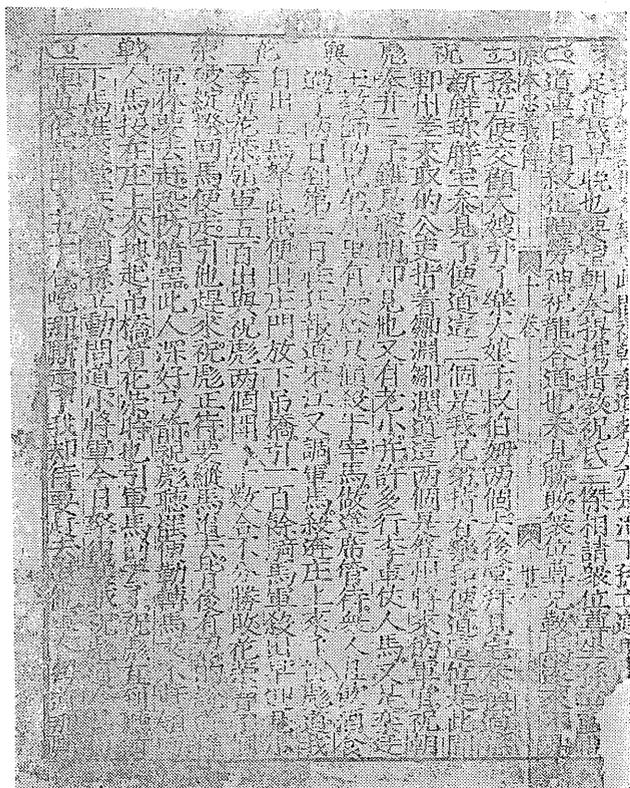
《京本忠义传》是残页，无回目可查。但每半页的边框上端都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如十七页是“石秀见杨林被捉”（容与堂本的四十七回），三十六页为“祝彪与花荣战”（容与堂本的五十回）。标题字数不等，视内容而定。郑振铎在《水浒全传序》中指出：“这（指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以前的原本，大约和许多古本小说一样，全书只分为若干节或若干条，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这个推断很有启发，此本可能就是这种“原本”，是否另有回目则不可考。郭勋本有回目而无标题，可证残页早于郭勋本。

《京本忠义传》有几回？原书不可得，只能从其他记载中查考推断。明代李开先在《词谑》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孙楷第认为：“《词谑》此处所云二十册，当等于言二十卷。”（《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末清初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中，也有“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的记载，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忠义水浒传》（残存八回）也是二十卷。今天所见《水浒》明刻本，除明嘉靖残本外，

都是一百卷一百回，卷回一致。残页版心标明为“十卷”，内容是三打祝家庄，相当于明容与堂百回本的第四十七回和第五十回。以五回一卷计算，第十卷恰为四十六回至五十回，以此可推断《京本忠义传》应是二十卷的百回本。

《京本忠义传》既为百回本，应属《水浒》的繁本系统。但其文字又较容与堂刊繁本略简，文言气息也较重。如残页十七页：“石秀道：‘蒙赐酒饭，已都吃了，即当厚报。’”容与堂本改为：“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匀了，即当厚报。’”这说明容与堂本可能是在《京本忠义传》本子上加工修饰的。这个本子与一九五四年校勘《水浒全传》用的九个本子无一相同，表明此本有它独特之处，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本忠义传》的题名。《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美化叛徒宋江，主要是通过标榜“忠义”，调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把农民起义引向投降主义道路。封建文人为《水浒》唱赞歌时就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水浒》“以忠义名其传焉”。可见《水浒》完全是一部借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残页干脆把《水浒》标名为《忠义传》，再清楚不过地点明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意。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抓纲促钢 大干快上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实践证明,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生产抓生产不行,只有抓纲促钢,才能大干快上。

在我们厂里,绝大部分负责抓生产的同志都是兢兢业业,决心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的。但是,怎样才能把生产搞上去呢?曾经有部分同志就生产抓生产,他们虽然辛辛苦苦,甚至到劳动力紧张的部门去顶岗位参加劳动,但是,由于头痛医头,没有抓到点子上,效果不大。另有一些同志,则消极地吸取过去那种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错误的教训,对生产工作不够大胆负责,往往遇到该解决的问题也不敢果断地处理。这里,反映了有些同志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同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划清界限。

唯生产力论是一种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它竭力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又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刘少奇、林彪都竭力宣扬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种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又是一种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机械唯物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对修正主义路线,包括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进行了反复的批判。但是,它的影响还存在,并且在人们的认识和行动上会经常反映出来。就拿我们厂十二车间一台三十年代的“500”轧机来说,这台机器经过工人群众的不断革新,到一九七〇年已经超过了原设计能力(年产五万吨),达到年产五万三千吨的历史先进水平。那时,有人认为潜力已经挖尽,生产已经到顶了,再要增产,就只能依靠基建投资,安装一台新机了。这些同志,见物不见人,关门算账,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反映了他们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还没有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诸因素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只有通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肃清唯生产力论的影响,才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十二车间

的党组织通过革命大批判，纠正原来那种“就钢抓钢”的错误作法，认真地“抓纲促钢”，广泛发动群众，揭矛盾，提措施，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结果，使老轧机重新焕发了青春，年产量一跃而达到十五万吨，生产能力提高了两倍。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创造力。怎样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从唯生产力论出发，就只会把工人看作机器的奴隶，对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则是一概看不见或者不承认；在企业管理中，要末搞管、卡、压，要末搞物质刺激。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是工厂企业的主人。因此，在企业的各项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以此来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自觉性，来激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厂里是经常存在的。我们厂在如何增产锋钢这个问题上，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斗争。锋钢是金属切削加工必不可少的材料，国家建设十分需要。但是，在一九七二年以前，年产量最高才达到三千多吨。锋钢生产为什么上不去？当时，大家都很清楚，关键是退火、精整两道工序跟不上。乍看起来，这是生产技术问题，要用添置退火设备，增加精整能力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实际上，透过生产技术的问题看实质，就反映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才是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只有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进一步完善起来，才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围绕如何把锋钢生产搞上去的问题，我厂干部通过学习和批判，提高了觉悟，就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他们发现，原来工人群众对发展锋钢生产是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的，他们不但为锋钢生产跟不上国家的需要而十分焦急，而且提出了许多把锋钢生产搞上去的革新建议，锻钢车间有些工人还主动试验简化退火、精整的新工艺。但是，过去车间之间分工如分家，相互不关心。正是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因此，要迅速提高锋钢生产，就要从抓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改革入手，克服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在车间之间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新型相互关系。事实正是如此，由于锻钢和炼钢两个车间打破了车间界限，相互支持，共同协作，并且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形式，试验成功了“基本不退火、大部不精整”的新工艺，使锋钢生产周期从原来的两个多月缩短到四十多天，年产量达到六千多吨，提高了一倍以上。

通过挖掘“500”轧机生产潜力和增产锋钢两件事，以及联系我们厂从一九五八年建厂以来发展钢铁生产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生产是要我们认真地去抓的，但是，抓生产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并同它划清界限，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为人民服务的

商业工作要努力为工农兵服务

戴 泉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上海商业战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年来,涌现出星火日夜食品商店、三八旅社、长寿支路菜场、牛桥下伸店和静安区粮油六店等一大批先进单位。他们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为了方便群众,他们增设了通宵服务、早晚门市、送货上门,以及以卖为主,兼营修、配、租等服务项目,受到了广大工农兵顾客的欢迎。

实践证明,商业工作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生意经”。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资产阶级思想和商业工作中的旧观念、旧传统还是很深的。比如,在商业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生意,轻小生意”,“重高档商品,轻人民生活必需的小商品”,“重买卖,轻修配服务”等错误倾向,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批判过,但这些批判了的东西,又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冒出头来,干扰商业工作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商业工作要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航向继续前进,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取得的成果,就必须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长期地坚持下去。

商业工作要努力为工农兵服务,还必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上海商业战线许多先进单位的实践都说明,商业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提高服务质量是辩证统一的。方向对头了,就能保证为工农兵服务的实现,但是,离开了完全、彻底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高标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成了一句空话。比如,在批判了刘少奇所鼓吹的“全民服务论”之后,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为工农兵服务就可以“简单化”。表现在商品供应上,“大路货”多,不太注意扩大工农兵需要的花色品种;反映在服务态度上,简单生硬,不耐烦,不周到,特别对贫下中农和外地顾客不热情、不主动。他们甚至把热情周到地为工农兵服务同伺候资产阶级老爷混同起来。这样的认识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为工农兵服务决不意味着

可以马马虎虎，粗声粗气，降低服务质量。我们应当向那些先进单位学习，千方百计地为工农兵服务，处处从工农兵的需要和方便出发，把服务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好，始终坚持高标准，真正做到使工农兵满意。我们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会不断地对商业服务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and 标准。商业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天地无限广阔，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质量也永无止境。

商业工作要努力为工农兵服务，还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以我为主”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我们商业部门掌握着商品分配的权力，又整天处在商品和货币的包围之中，因此要十分警惕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对我们队伍的侵蚀。商业部门供应的商品是面向工农兵的，但是有些人把商品当作“资本”，认为顾客“有求于我”，商业部门就可以“以我为主”。他们不顾群众需要，对紧张商品采取“惜售”的态度，当作“奇货可居”，甚至造成有些商品堆积仓库，发霉变质，而市场上则缺货断档。有的把热销商品同冷背商品硬性搭配出售，有的在供应方法和供应时间上只从方便自己出发。这些情况不改变，就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我们每一个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都必须懂得，商业部门分配商品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一定要努力为工农兵掌好权，用好权，根据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办事，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商业工作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努力为工农兵服务，还要抓好反映在商品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商品与广大群众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营什么商品，设计什么式样，都反映着各个阶级的兴趣和爱好，都是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资产阶级往往利用商品来散布他们腐朽的意识形态，腐蚀人们的灵魂。因此，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不仅要安排好市场，做好商品供应和服务工作，而且还有一个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刘少奇鼓吹“全民服务”的一个重要论调是所谓“百色齐全”，这实际上是要迎合资产阶级老爷小姐们的生活方式。当然，批判“百色齐全”，绝不等于说工农兵需要的商品就可以“单一化”。我们商业工作者一定要熟悉工农兵，了解工农兵的需要和爱好，多设计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风貌的商品式样，增加为工农兵喜爱的花色品种。

当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正在深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发展，我们整个商业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扶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商业战线上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商业工作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工作人员）

人民饭店为人民

徐 莖 吴宗英

在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一家并不显眼的人民饭店。它过去叫五味斋菜社，是大跃进年代飘扬在上海财贸战线的一面红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面红旗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了。

当我们来到人民饭店访问的时候，正是中饭上市的高潮，店堂上下已是座无虚席了。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员，在人群中穿梭来往，热情地为顾客安座，点菜，开单，收款。一张张提货单从堂口飞进了厨房，一盆盆菜点从厨房送到了顾客面前。一批批顾客乐呵呵地走了，一批批顾客又笑嘻嘻地进来。这里，是一派热烈紧张而又欢乐愉快的景象！

每天要这样热情细致地服务到桌，真不容易啊！于是，我们问饭店的党支部书记小江同志：“你们有多少职工？一天接待多少顾客？”小江同志笑了笑说：“说来有百把个职工，除了轮休等等之外，每天实际上店服务的不过六七十人。店堂上下三百多客位，最多一天要接待五千多顾客，比文化大革命前要增加两倍。”

六七十名职工，五千多顾客！我们正在思索着这两个数字的含义。这时，一位手端半杯啤酒的服务员，从我们身旁擦肩而过。

我们好奇地问：“半杯啤酒也好买？”

小江就从半杯啤酒打开了新的话题：

“为方便工农兵，考虑不同的需要，我们降低了菜点的起售点，新开了几种‘半’字号的服务项目，比如半杯啤酒，半两白饭，半两馄饨；也新增了一批‘分’字号的汤、菜，比如三分的大众汤，六分的炒青菜，八分的拌海带丝。这在习惯上一般就叫做低档菜，可是，你们别以为低档菜就是低质量，大众化就是简单化。”小江一边向我们解释，一边就讲了一个三改肉末豆腐的故事——

一角九分钱的肉末豆腐，是一只价廉物美的低档菜，工农兵顾客很喜爱吃。可是，有一天顾客反映：“豆腐有点酸”。烧菜的共产党员老刘师傅听了这个意见，就及时地和大家研究改进，把豆腐清水漂，开水出，果然去掉了酸味。但是，又有顾客反映：“豆腐烧得太碎了”。大家分析了原因，就把大锅烧改为小锅烧，果然好得多了。不久，又有顾客提出：

“豆腐烧得不香”。这又引起了老刘师傅的深思。他想到在旧社会自己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过的苦难生活，今天饭店的大门向工农兵敞开了，自己为阶级兄弟烧菜，即使是低档菜，也一定要烧出无产阶级感情来！于是，他又和大家一起积极改进操作方法，肉末豆腐葱油浇，看上去鲜白可爱，吃起来香嫩爽口。

刘师傅三改肉末豆腐的故事，使我们深受感动。在人民饭店，低档菜烧出高质量，一盆菜，一碗汤，都倾注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这时，小江随手递给我们一份新开的菜单说：“我们饭店最高的菜价是一元八角，最低的只有三分钱，分成二十多档，顾客有的吃得好些，有的吃得差些，差别很大。而老师傅讲得好：菜价有高低，但为工农兵服务的态度可千万不能分等级！”我们觉得这个话很深刻，正想发问，小江又继续告诉我们：“过去有些人总认为：‘点心市撩了半天阳春面，不及饭市做一只圆台面’。烧芙蓉鸡片，聚精会神；烧肉末豆腐，马马虎虎。大生意上门，热情周到；小生意进店，冷冷冰冰。归根到底，那还不是资产阶级生意经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我们头脑里作怪吗？”

听到小江这些话，我们都会意地笑了。莫看烧菜端饭很简单，不是同样深刻地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吗？饭店虽小，却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呢！人民饭店的职工，通过文化大革命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了服务方向和服务态度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想一想”的服务原则：每新添一个服务项目，新增一样花色品种，新订一种菜点价格，都要想一想是否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想一想是否符合工农兵的消费水平？想一想是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不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现在，这家饭店的菜单上共有八十多个品种，而七角以下的中、低档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正象小江说的：“我们在平凡的劳动中，要做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凡的事业来。只有这样去想，这样去做，我们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越走越坚定，为工农兵服务的天地，才会越来越宽广。”

人民饭店的同志们正是这样去实践的。我们在访问过程中，听到有关这方面的事迹是非常感动人的。

有一天，十几位急着去赶火车的大庆工人来到人民饭店。他们看到堂内已经客满，显得焦急不安。服务员看到他们那种神情，就主动上前问明了情况，立即把他们迎进店来，临时加桌，端上快菜。这十几位大庆工人临走时，在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的话：“大庆工人到上海，人民饭店暖如家。学习你们好榜样，增产石油当闯将。”

有一天的傍晚，来了几位浙江的贫下中农。其中一位女青年，筷也不动，饭也不吃，闷闷不乐。青年服务员小江和小杨，就上前询问。原来，那位女青年是因公轧断了手指，正伤心着，哪里吃得下饭！小江和小杨一边亲切劝慰，一边用汤匙把热菜热汤一口一口喂给她吃。饭后，还把她请到女宿舍，帮她洗脚，同她谈心。当这几位浙江农村的贫下中农

离开店堂时，他们激动地说：“要是在旧社会，我侬赤脚人连饭店的门都跑勿进，哪里还想受到这样热情的招待。感谢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人民服务员，你们真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啊！”

又一个下雨天，来了一批坐着手摇车的残废工人。由于店堂楼下人比较挤，这些残废工人很想到二楼去。服务员就主动走上前去，搀的搀，背的背，一步一梯，把他们送到楼上餐厅。吃过饭，又把他们一个个背扶到手摇车上。这批残废工人在离店时含着热泪说：“我们这些残废人，断臂缺腿的，要是在解放前早已被踢在路旁了，今天在新社会，处处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

人民饭店还经常会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突然袭击”。那是一天中饭市的高峰时刻，突然店门口传来一片伊伊呀呀的喧闹声。原来是董家渡幼儿园的一百二十多个娃娃，他们在人民公园听了园史介绍后，临时来到人民饭店吃午饭。哪里来位子安顿这许多小客人呢？有的老师傅又焦急又风趣地说，“可不能叫祖国的幼苗饿着肚子走啊！”于是，大家紧张动员起来，急急忙忙并桌子，端凳子，连职工食堂也都腾了出来，总算把这批小客人安顿了下来。厨房里也够紧张了，根据幼儿园的要求，每人一角五分钱，一菜一汤一饭，让小客人吃好吃饱。小客人们吃得很高兴，饭后还专门在店堂表演了节目。

在人民饭店，这类先进事迹就好象一串串晶莹闪光的明珠，数也数不清。颗颗明珠都闪烁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这些事迹以后，我们深情地赞叹着：店堂虽小，为人民服务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啊！

人民饭店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前进，决不是风平浪静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经常要反映到这里来。我们在访问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人民饭店的同志不仅是人民的服务员，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阶级斗争的战斗员。他们在五光十色的商品和花花绿绿的货币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把堂口当作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表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财贸战士的高度觉悟。

今年初夏的一天，有位顾客兴冲冲地进店来，说是他和哥哥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这次久别重逢，亲戚朋友聚一聚，想办四桌“配套菜”，每桌菜要一百元的。接待这位顾客的服务员老李一听，先是吃了一惊。“一百元一桌，四桌就要四百元！”老李心里盘算着，为什么要这样挥霍浪费呢？接着，就婉转地向来客解释说：“我们饭店最高的配套菜是二十元一桌，如果不够，可以添几样菜，但用不着花那么多钱。”这时，来客的脸色突然变了，很不高兴。老李一眼看到了他的心里，就耐心地同这位顾客讲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道理。老李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位阔气的来客已经忍不住了，他带着近似质问的口气冲着老李问：“你们多做几笔大生意有啥不好？”说着，便气呼呼的走出了店门。后来，饭店职工针对这桩事情专门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都认为老李做得对。有位同志说：“做这样一笔四百元的大生意，单从金额来看，等于接待几百名顾客。但是，我们决不许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到人

民饭店摆阔气。”又有的同志说：“我们决不能象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只顾赚钱不问路线！”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饮食行业流传着一句话：“你有钱来我拿货，随你吃来随你喝”，不分阶级，不问路线。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人民饭店的同志们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更加心明眼亮了。他们坚决抵制“资产”风，看到了堂口也是两个阶级必争之地。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把“资产”风从堂口挤走，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把无产阶级挤走。

“人民饭店管得宽”，说这种话的，有的是埋怨，更多的是赞扬。管得宽到底好不好呢？在访问中了解到的又一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有一天晚上，二楼餐厅来了一对青年男女，订了三桌配套菜。看他俩喜气洋洋的模样，是来办“喜酒”的。但是服务员发觉女方太年轻，心里就犹豫起来。经过一问，果然，这位女青年是一个进厂不久的艺徒。当时，饭店的职工就与厂里联系了，主动配合工厂向他们进行了晚婚宣传。结果很好，那对青年男女同意推迟婚期。人民饭店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过去是察颜观色捞生意，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是察颜观色看阶级斗争的动向！”他们把那些不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当作份内事来管。这种管得宽的精神不正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吗？

人民饭店为人民，真是名不虚传。人民饭店对工农兵那样深厚的感情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从一次青年职工座谈会上找到了答案。在座谈会上，支部书记老樊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要解决‘立足点’的转变问题。”他望了望坐在周围的青年人，用手一指，“小胡，你先说说吧！”

支部书记点到的小胡，是七二届分配来的中学生。小胡窘了片刻，然后就爽爽快地讲开了：“说实话，我刚进店的时候，心里窝着一股气。真是炒素、辣酱、豆腐汤，美好理想全泡汤。后来在党支部的教育和老师傅们不断帮助下，思想才慢慢地开了窍。而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今年六月去梅陇公社的劳动，我们把它叫做走‘烧菜学种菜’的道路。这一‘走’，可‘走’出感情来了！初下去，自以为年轻，劲头粗，种菜劳动算个啥，没想到第一课就认输。社员撒猪粪，用手撒，而我呢，看看猪尿，脚也踩不下去，更不用说用手去撒了。原想蔬菜队总是时鲜货先上口，想不到贫下中农把好菜尽往市区里送。他们说：‘种菜可要想到吃菜人’。这句话给我教育很深，我当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服务员，烧菜、卖菜也要想着工农兵啊！”

讲到“烧菜学种菜”，座谈会特别活跃起来。原来，这个店的党支部十分注意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服务员到生产第一线接触工农。平时多下工厂农村接触工农，在店堂为工农群众服务起来感情就大不一样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体会是很深的。有一个服务员当顾客参谋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一天中午，来了两位贫下中农。他们初到饭店，不太了解店里的情况，就各买了五两饭，合买了一碗榨菜肉丝汤，总共五角五分钱。接待他们的徐师

傅心里思忖，一碗汤怎够两个人吃呢？怎样让贫下中农吃得饱又吃得省呢？他就主动为他们当起参谋来，建议他们各买一碗油渣豆腐血汤，一只炒青菜，两套汤菜，总共只比原先的吃法多一分钱，既经济又实惠。

人民饭店的新老职工和干部，坚持“烧菜学种菜”，到目前全店职工学种菜的已去过十七批，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这样地学习工农、接触工农，促进了服务员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考虑到贫下中农的需要，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服务项目，象“以米掉饭”“代客蒸饭”“来菜加工”等等。

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好传统要坚持，必须有人传、帮、带。人民饭店的老模范桑钟培同志，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靠我们这一代人不行，还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代一代有人传下去。”桑钟培同志对我们讲了他在培养教育青年方面的一些体会。他说：“在去年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店里几位青年到南市区沪江饭店学习，在七姑娘服务小组跟班劳动。沪江饭店的先进思想鼓舞着大家，回来以后，青年们立即向党支部提出要求成立青年服务班。这是青年们学先进、赶先进的实际行动，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青年服务班成立的那天，我们老师傅看到青年们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茁壮成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深深体会到我们的青年，真是一代胜似一代。我的心情更是激动得无法形容，当场我把大跃进年代柯庆施同志在一次万人大会上亲手赠给我的一支英雄金笔，转送给青年服务班。我并把柯庆施同志当时热情嘱咐我的两句话：‘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也转达给青年服务班的全体同志，勉励他们坚定地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一代一代走下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老桑的话说得多么亲切，多么好啊！他不仅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作自己终生的革命事业，而且对新一代的服务员又寄托着多么深厚的期望啊！

我们抄录一首在人民饭店的意见簿上看到的诗，作为这篇访问记的结尾：

炉火映红心，
笑迎工农兵。
端出百样菜，
阶级情意深。
五湖四海送温暖，
人民饭店为人民。

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人民饭店和千千万万工农兵心连心的深厚情谊。人民饭店把温暖送到了工农兵的心坎中，送到了五湖四海。这温暖的源泉，是来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自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在实践着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服务。我们这篇访问记所反映的，算是一个缩影吧！

立足工农兵 服务无止境

中共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委员会

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一定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根据我们的体会，要真正坚持这个方向，并为工农兵服务得好，是会经常碰到激烈的思想斗争的。

我们商店天天都在讲为工农兵顾客服务，但是，究竟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商店的服务工作呢？有的同志认为，顾客进店，无非是为了买东西，只要满足了顾客对商品的需要，就算尽了自己的本份。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们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就拿我们商店缝纫机小组来说吧，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这个小组近几年来努力做好缝纫机的供应工作，工农兵顾客是比较满意的。这样就算做好了服务工作吗？并不。比如，前些时候，他们发现有些顾客买了缝纫机，却无法运送回家。不仅许多顾客感到不方便，而且被社会上某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人钻了空子，在商店门口高价出租运送工具。于是，有些同志提出，要设法解决运送问题。这是不是我们商店责任范围内的事情呢？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商业既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又是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以前，我们只注意商品的多少、质量的好坏，整天忙于组织货源，反映顾客意见，增加花色品种。当然，这些工作是应当努力做好的。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那就还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单纯买卖的圈子，还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优越性。有的同志说得好：“从流通领域来讲，商品到了顾客手里，这个流通过程也就完成了。但是我们为工农兵顾客服务的过程还没有完啊！”也有同志讲：“光顾做‘生意’，而不注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那末货源再充沛，商品质量再高，花色品种再多，也有可能被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所利用。”缝纫机小组的同志们通过学习，提高了为工农兵服务的自觉性，他们自力更生搞了几辆简易手推车，还备了几辆三轮车出租，专门为顾客运送缝纫机提供方便。

到此，服务工作算是到家了吧？事实告诉我们，还没有。有一回，有位顾客高高兴兴地买了一台缝纫机，借了三轮车踏回家去，在过桥时不小心把缝纫机的台板、铁脚摔坏了。缝纫机小组的同志从这件事中认识到，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以

后,他们就在每辆三轮车上加装了固定安放缝纫机的保险底座,挂了一块牌子,写上:“小心搬运,保险挂牢,谨慎慢踏,推车过桥”十六个大字。有的顾客称赞说:你们的服务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但是,不会踏三轮车的顾客又怎么办呢?缝纫机小组的同志们在商店储运部门的支持下,又增设了送货上门的服务项目。最近,他们根据顾客的要求,进一步开展了上门检修、传授使用、保养知识等服务工作。

缝纫机小组从卖货到送货,从送货到把服务工作做到“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业服务标准的问题,那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两把尺子。这个小组坚持按高标准为工农兵服务的先进事迹,对我们党委也是很深刻的教育,使我们认识到,只有真正立足于工农兵,想工农兵所想,急工农兵所急,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社会主义商业与资本主义商业的界限,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

我们商店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百货商店,正确处理好大商品与小商品、销售与修配的关系,也是检验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坚持了高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市百一店是上海第一大酒店,言下之意,大酒店就得有大酒店的“样子”。在这些同志看来,大酒店只能经营一些价格高、利润大的大商品,不能经营那些价格低、利润小的小商品,更不应当搞那些修修配配。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经营思想的反映。让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商店里作怪,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如果不坚决抵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生意经,就必然会腐蚀商业职工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商店的广大职工通过革命大批判,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商业工作中的流毒,打掉了大商店的大架子,在千方百计地为工农兵服务方面涌现了许多新生事物。这些年来,商店设立的通宵服务、上门服务、以卖带修、以卖带配、以卖带租、以卖带收、以卖带教、拆零供应等服务项目,共有一百八十多项。工农兵顾客热情地称赞说:“一个项目一片心,服务工作面貌新。跳出单纯买卖圈,才能心向工农兵。”商店职工同志听到工农兵的反映以后,也深有感触地说:“理论要学好,路线要端正;立足工农兵,服务无止境。”这说明,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才能不断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质量,才能真正使工农兵满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这些新生事物,深受工农兵的欢迎。我们有责任满腔热情地加以扶植和发扬,永远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近几年来,我们商店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为工农兵做了一些工作,但距离广大工农兵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心向工农兵,服务无止境,我们决心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开创为工农兵服务的更加广阔的天地,把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做得更好。

从配棋子想到的

完 绍 元

我那副象棋被弄丢了一个小卒子。趁星期天跑淮海路，到一家文具用品商店准备再买一副新的。谁知进去一看，象棋缺子可以零星供应。我高兴地配好一只小卒子，乘兴又看了几家商店，发现好多柜台都标有“以卖带修”或“以卖带租”、“以卖带补”等醒目字样。原来，不仅象棋缺子可以零配，缺一只袜子也可以配对成双，粉刷墙壁可以租借泥刀排笔，衣服破了可以代客织补……

商店里这一个“带”字，是何等地好啊！

这个“带”字，好就好在把商业工作带到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现在许多商店从工农兵顾客的需要出发，以卖为主，兼带其它，如兼修，兼配，兼补，兼租等等，这些服务项目的增加，表明了商业工作者在努力扩大为人民服务的天地。“三尺柜台有限，为人民服务的天地无限。”这话反映了商业工作者为人民服务自觉性的提高。

这个“带”字，好就好在为广大工农兵顾客带来了方便。比如，顾客买了家俱、缝纫机等大件商品，有的商店就包送；顾客买了新产品，缺乏使用保养知识，有的商店就传授有关这方面的知识；顾客又想买东西又想修东西，同一个商店就既卖东西又兼修配业务；顾客临时急需一件东西，商店可以暂时出租。商业部门的同志们为了方便工农兵顾客，想得多么周到啊！当然，这个“带”字对营业员也带来了许多麻烦。我们许多商店“宁肯把麻烦留给自己，不肯把麻烦留给顾客”，这正是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商业战线涌现了许多深受工农兵顾客欢迎的新生事物。现在，服务部门努力扩大服务项目，积极提高服务质量，已经蔚然成风。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恼人的事情。比如，半夜有急事叫不应机动三轮车；牛奶现在不少地方变成了订户出门自领。我想，这大概是把方便和麻烦的关系颠倒了吧！想到这些，我就更加感到了一个“带”字的可贵。

三十万与三千万

李 关 良

30万与3000万，是两个工厂的两笔产值账。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说起来有一段曲折而发人深思的故事——

今年年初，上海第一化工机械厂算了一笔账：多搞一些三辊研磨机，全年可增加产值30万元。就在同时，上海牙膏厂也算了一笔账：如果实现牙膏灌装自动化，不仅可以节省一百多个劳动力和一千八百平方米场地，一年还可以增加产值3000万元。而要实现牙膏灌装自动化，就需要第一化工机械厂提供十台牙膏自动灌装机。但是，第一化工机械厂没有生产过这种设备，从试制到拿出十台，要占用大量的设备和人力，增产30万元产值的计划就有“泡汤”的危险。

于是，围绕着怎样认识和解决3000万和30万的矛盾，在第一化工机械厂内展开了一场辩论。

3000万为30万的一百倍，当然是3000万重要。但问题在于：“3000万是人家的，30万是自己的。”如果为了牙膏厂的3000万，丢了自己的30万，岂不是“瘦了自己，肥了人家”吗？这是一些同志的算法，算来算去是一笔吃亏账。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3000万和30万，在两个厂是两笔账，而在社会主义的全局中，却是一本账。因此，宁愿自己丢掉30万，也要确保牙膏厂的3000万。

为什么有人说“吃亏”又有人说“合算”呢？这里反映了全局观念和本位主义在算账问题上的对立。搞经济工作，账总是要算的。但算账又会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只顾自己的30万，不顾牙膏厂的3000万，这是一种算法，算的是本位账。宁愿自己丢掉30万，也要确保牙膏厂的3000万，这又是一种算法，算的是全局账。毛主席说：“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3000万与30万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矛盾状况。增产30万，在第一化工机械厂这个局部是可行的。但是当全局要求第一化工机械厂“让路”30万的时候，就应当服从全局，30万就应当服从3000万。牙膏厂多搞3000万，虽然并不反映到第一化工机械厂的账本上，却在社会主义的全局一盘棋上能得到反映。因此，从本位主义出发说不合算的事情，从全局出发又是合算的。割裂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工作中就会搞

形而上学，搞孤立主义，那是十分要不得的。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但全局决不是局部的简单总和，而是全局高于局部。为了牙膏厂的3000万作出贡献，即使自己丢了30万也不要紧，因为全局还是增加了2700万。这一得一失，谁轻谁重，难道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在关于3000万和30万的争论中，还反映了产值指标第一和国家需要第一在算账问题上的对立。在组织工业生产中，一定的产值指标还是要的。但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计算产值指标，而是为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才是本质的东西。从第一化工机械厂的情况来看，三辊研磨机是熟门熟路的“当家产品”。一台研磨机只有百把个零件，结构简单，生产方便，而且产值又高。搞牙膏自动灌装机就麻烦多了。不仅要从头摸起，而且结构复杂，一台有近万只零件。仅以工时而论，生产一台牙膏自动灌装机的工时，大约可以用来生产十台研磨机。按产值计算，用同样工时生产的研磨机，产值等于生产牙膏灌装机的五倍。我们的同志如果被工时、产值一类的现象迷惑住了，只在现象上兜圈子，就会舍弃3000万而不顾，只抱住那个比较易于到手的30万。为什么第一化工机械厂的大多数干部和工人宁愿自己添加麻烦、减少产值也要去搞牙膏自动灌装机呢？就因为他们抓住了国家建设需要第一这个生产的本质，没有被产值指标这个现象所迷惑。这个厂的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通过访问牙膏厂懂得了：如果拿出十台牙膏灌装机，可以帮助牙膏厂割掉手工操作的尾巴，牙膏生产量能提高三分之一，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他们主张，不能在自己厂的产值指标上兜圈子，而要在满足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上下功夫。这种可贵的见解，对经济工作中不注重实效的某些形而上学，也是一个深刻的批判。

是算本位账还是算全局账？是算需要第一的账还是算指标第一的账？这反映了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坚持产值指标挂帅。马克思说：“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本质的差别，决不能搞什么产值第一和利润挂帅。因此，每一个企业在算账的时候，要把社会主义全局的需要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全局需要什么，就应当生产什么；全局需要多少，就应当努力去完成多少。事实上，衡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贡献的大小，产值指标的高低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而是要看是否以积极的态度去千方百计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出的需要。

3000万和30万是不是绝对排斥的东西呢？也不是。上海第一化工机械厂通过辩论统一了认识，在“宁愿丢掉30万，也要确保3000万”的思想指导下，把试制生产十台牙膏灌装机列入了增产计划。仅从工时的安排来看，矛盾是很大的。据计算，生产十台牙膏灌装机用去的工时达十一万二千多个，相当于这个百来人的小厂全年总工时的一半。但是，由于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充分发挥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厂在试制成功牙膏灌装机的同时，产值水平也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目前，第一化工机械厂的干部和工人，正以战斗的姿态迎接第五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到来！

努力塑造好银幕上的英雄形象

——看影片《第二个春天》札记

石 川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怎样运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来塑造银幕上的英雄形象？我们可以从影片《第二个春天》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

怎样刻画冯涛的英雄形象？作者、导演、演员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我曾经看过未完成的《第二个春天》的部分样片，总觉得冯涛身上存在着“官气”。无论是他初到东港向工人群众“演说”的姿态，或者他访问夏长发时让工人群众围桌而坐并仰着头看他站着说话的画面形象，都使人感到冯涛高人一头，很不可亲。冯涛是师级干部，是“官”，但这种“官气”却要不得。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如果银幕上的英雄成了个带着一腔“官气”的“上司”，这个英雄人物就不可能得到观众的承认。

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为了让冯涛这个英雄形象在群众心里扎根，剧本先写冯涛初到东码头，恰逢“海鹰”试航烧焦，齐大同命令“拖去关禁闭”，刘之茵等十分气愤。作为新上任的工委书记，冯涛一到就碰上“尴尬事”。刘之茵等是多么希望冯涛大喝一声，阻止把“海鹰”拖走啊！可是冯涛并没有这样做，他跳上“海鹰”，钻进机舱，“里里外外摸了一摸”，只说了一句话：“烧焦了也是自己的‘海鹰’嘛！”乍听起来，这句话好象隔靴搔痒，飘飘地没有份量，实际上却反映了冯涛高度的思想水平和党性原则。冯涛初来，情况不明，怎么可以对争论的双方下个支持谁、反对谁的结论呢？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又实在同情和理解刘之茵他们的心情。所以不禁吐出那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再写冯涛去医院探望夏长发，亲切谈心，当老梁要书记“给想个办法”时，冯涛笑着说：“书记的办法要出在同志们身上。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铆钉啊。”这就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书记与群众的关系。又写冯涛拜访刘家，鼓励刘之茵把“信心拿出来和有些人辩论辩

论”。他说：“真理不变成群众的思想行动，你个人的信心有天高，‘海鹰’也飞不起来啊！”冯涛的调查研究、访问群众，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有了这些铺垫，冯涛在工委扩大会上直截了当地支持刘之茵他们，就显得合情合理。这样，冯涛就始终站在群众之中，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代表了群众的意愿，从而带领着群众前进。

但是，从剧本上的英雄形象到银幕上的英雄形象，还有赖于导演的艺术处理和电影艺术形式的运用。现在《第二个春天》的完成影片，在剧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电影艺术形式的长处，使冯涛这个银幕上的英雄形象显得高大而又平易近人。

利用镜头揭示细微的神情变化的表现力，刻划冯涛的和蔼可亲。冯涛看到刘之茵，主动迎上前去握手时，刘之茵因满手油泥，欲握又止，冯涛满不在乎地一把紧紧握住。由于冯涛正是在刘之茵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一握，更使观众感到有一股力量传递到刘之茵的身上。这些，影片用中近景都把它细致地表现出来了。当冯涛跟刘之茵说“烧焦了也是自己的‘海鹰’”时，影片又用中近景镜头刻划了冯涛的眼神、表情，明确地表达了对刘之茵们的支持。青工小杨在夏长发面前告状时说，“海鹰”拖走“他连喷涕都不打一个”，而观众从画面所显示的冯涛的神态上，从他的话语里，却完全可以领会到冯涛是站在刘之茵一边的。镜头的这种表现力，在舞台上很难做到。但如果用特写镜头来强调，倾向性太强烈，又会感到做作，不自然。现在的影片采用中近景来表现冯、刘之间的亲切会面，表现冯对“海鹰”制造者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恰到好处的。

利用声画组合的艺术效果，突出冯涛的虚怀若谷。如在“海滨医院”，冯涛与夏长发、老梁等工人师傅亲切谈心，夏长发说到“怎么能一回试不成就砍掉”时，画面上展示的是冯涛凝神谛听的镜头，夏长发的话变成“画外音”；接着老梁说“是这话呀同志……”时，画面上还是冯涛凝神谛听的镜头，不过眼神转向老梁，老梁的话是“画外音”。这样一处理，打破了谁说话拍谁的老规矩，不仅使镜头有变化、不单调，从一个接一个的讲话中，反映了当时的热烈气氛，而且把冯涛的着意倾听的镜头与“画外音”组合起来，使观众产生夏、梁的话都说到冯涛心里去的感觉。在刘家那场戏，采用同样的方法，出现“我给你吹点冷风怎么样”的刘自强的“画外音”时，画面上的冯涛自然地微笑着说：“我正听着呢。”刘自强与夏、梁等工人师傅不同，吹的是“冷风”，反映了另一种人的意见，可是冯涛照样专心致志地“听着”，又从另一侧面突出了冯涛的宽阔胸怀。

利用镜头高低位置的变化，显示冯涛的平等待人。镜头掌握在人们手里，俯仰之间，无不包含着作者的褒贬在内。影片在描写冯涛与群众的关系时，常常采用平摄的镜头。如在医院，冯涛与夏长发、老梁等促膝谈心，镜头处理就把冯涛与工人群众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在工委扩大会上，夏长发站着发言，为了突出冯涛专心倾听的神情，影片还用了一个俯拍的镜头，让冯涛微微抬头凝视着夏长发。这不但没有贬低冯涛，反而强调了冯涛与夏长发的平等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决心是“造‘海鹰’的同志们下的”。

怎样才算把最好的镜头给英雄人物？导演原来认为只要把英雄人物拍得大一点、高一点、位置中心一点就行了。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一般说来，这说法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如仰拍可以使英雄人物显得高大，但如果处处用

仰镜头把英雄人物与群众对比，使英雄居高临下，这不是歪曲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了么？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反对用仰镜头，如工委扩大会上，冯涛站起来发言，用仰摄的镜头把冯涛与坐在旁边的齐大同、潘文相对比，就显得高大、挺拔，这个镜头就用得很好嘛。总之，“最好的镜头”不可能从仰镜头、俯镜头、特写镜头、近景镜头之类中找到划一的答案，而只能以准确反映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崇高品质为标准。

二

“厂长办公室”这场戏，是把全剧推向高潮的重要过渡。这场戏有着新颖、大胆的艺术处理，很好地表现了冯涛强烈的爱憎感情和深沉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规定情境是这样：外国专家赫文斯基不敢回答我方提出的三个大问号，溜了，并进行无耻的政治讹诈。这样，势必给新舰艇生产造成新的困难，因而在冯涛与齐大同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齐大同把“‘飞鱼’砸了锅，‘海鹰’又泡了汤”归咎于冯涛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冯涛则对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治讹诈切齿痛恨，对齐大同的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心里发凉”。影片在刻划这场斗争时，如果画面上塞满一张张愤慨的脸，耳边充斥一声声狂怒的叫喊，这是不能很好地刻划英雄人物的性格的。现在的影片通过细致的艺术处理，通过大幅度的调度，使冯涛这个英雄形象焕发出了光彩，艺术效果很好。在影片中，冯涛听到“飞鱼”国庆下水的广播，从会议桌的一角走到窗前，从窗前匆匆走到外间写字台前打电话，命令停止广播，又气冲冲地往阳台门走去。齐大同一会儿从外间走到里间，一会儿推开窗户，一会儿坐到沙发上。这样大幅度的调度，不仅避免了画面的单调，增加了场面的变化，与人物之间矛盾的发展相适应；更主要的是使观众感到冯涛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把冯涛的感情变化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里，冯涛的“潜台词”是：“人家把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能冷静吗？”从冯涛一贯的思想性格来看，冷静、深沉、胸有成竹，这里为什么会象山洪暴发一样激动呢？一个性格鲜明的形象，其色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冷静与激动，是对立的统一。对于冯涛的性格就应这样理解。“海鹰”关“禁闭”时，他只说“烧焦了也是自己的‘海鹰’嘛”一句话，从表面上看是够冷静了，可骨子里对“海鹰”是充满着多么炽热的感情！现在人家又是撤专家、又是停运主机，“把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了”，如果一味“冷静”下去，就无法表现人物强烈的爱憎感情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就破坏了英雄性格的完整性。影片采用大幅度的调度的艺术处理，正是基于对冯涛的思想性格的准确理解，因而是富有表现力的，是有助于揭示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

大幅度的调度产生“动”的艺术效果，在电影中有力地表现了冯涛感情的激动，但如果一味“动”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不仅节奏感不强，甚至会使人感到疲倦，不能深刻地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影片从艺术的辩证法出发，在“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继之以“静”的处理，动静对比，有助于完整地刻划人物性格。齐大同认为“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的困难时期”，冯涛驳斥他：“没有困难还要你我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这时，冯涛是声色俱厉、义正词严。接着，冯涛好象凝然不动了，响起了他低沉缓慢的话语：“过去，在困难面

前，我们想起了井冈山上的红旗，长征路上的草根，延安窑洞的灯火，一个信念，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可今天，在新的斗争面前，你呀……老齐同志，你把这股革命精神都给丢了！”与此同时，伴随着响起了抒情的音乐。这样强烈的动静对比，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进一步突出了英雄形象。在特定条件下，“静”的艺术效果就可以比“动”更其突出。然而这样处理，又不是故弄玄虚，故作惊人之笔。从冯、齐的论战来看，讲起“困难时间”，由此想到革命历史，顺理成章，而在表现这一段回忆时，节奏应当比较缓慢。一是由于这段回忆是冯、齐共同的经历，冯涛讲这些话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呈现出斗争历程中的种种景象来，再说，为了要把齐大同引入那种革命境界，也得给齐有想一想的余地；二来是要为观众着想，如果节奏快了，一闪而过，观众印象不深刻，就会对齐大同的被激动感到不可信。这样“静”的处理，正好表现了冯涛对于战友的深沉、浓烈的阶级情谊。它跟前面的“动”相映成趣，渲染了冯涛感情深处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使英雄形象具有了饱满的血肉。导演的匠心还表现在处理这种“静”的画面时并不是凝滞不动的，而是静中有动，动静结合。从冯涛的形象来看，是“静”的；从画面效果来看，却又是“动”的：影片用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移动的特写镜头，画面从冯涛的右侧摇移到他的左侧。这样，就反映了冯涛深沉的感情中激荡着起伏的波澜，使英雄形象的胸怀显得更加宽广。

三

“船台广场”这场戏，是全剧的高潮。尽管当时我们处在困难的境地，但影片通过鲜艳的红旗、蓝天的轻云、排空的浪涛的衬托和渲染，通过气魄雄伟的群众场面，把英雄人物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表现得那样火红、热烈，令人鼓舞。这里反映了影片的作者对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斗争有着深刻的理解。

英雄总是和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都有着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他们从事的斗争又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文艺作品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英雄形象的思想 and 行为落后于时代，英雄也就自然不成其为英雄；但如果英雄形象的思想 and 行为是当时所不可能具有的，也会使英雄形象失去了真实感。因此，任何样式的文艺作品都必须重视正确处理英雄与时代的关系。

《第二个春天》所揭示的那场斗争，发生在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当时国内外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苏修更是乘人之危，妄图迫使我们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对这种形势，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齐大同说，“现在不是那个轰轰烈烈的年月了”，“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的困难时期”。他被困难吓破了胆，在前进的道路上犹疑、动摇，以致迷失了方向。潘文认为，我国的“现实基础”是“要造出一个超过别人的零件”都不可能，因此只有向现代修正主义屈膝投降。只有冯涛的理解才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他正视困难，主张自力更生。人家卡脖子怎么办？冯涛的回答是：“我们自己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气魄和情怀！

为了使冯涛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准确地表现在银幕上,作者、导演要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充沛的革命激情。如果电影镜头比较客观地反映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撕毁合同、停运主机而“飞鱼”下马的冷落景象,破败寂静的工地现场,描写一层层低飞的乌云,一道道刺目的闪电,一声声震耳的雷鸣,这就不能准确反映英雄人物对时代的理解,不能衬托出冯涛崇高的精神境界。影片在艺术处理上抛弃了这种一般化的手法,另辟蹊径,在“火红”上大做文章,燃烧起了广大观众的革命热情。

镜头处理。冯涛在船台广场向几千群众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罪行、作新的战斗动员时,除了比较自然地插入不同类型的听众的不同反应的镜头外,还把冯涛的三个特写镜头组接在一起。这是在电影里很少采用的。这样的组接方法,镜头显得“跳”。但是这里的“跳”,正好表现了冯涛讲话时抑扬顿挫的节奏和他内心跳动激越的感情,使观众的心也跟着英雄人物一起跳动起来。当冯涛讲到“我们的‘海鹰’一定会飞起来”时,镜头从近景拉成大远景,使观众看到广场的整体景象,群起呼应,冯涛的决心变成了群众的呼声,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好说明了真理变成了群众的思想行动,为英雄与群众的关系点上了很好的一笔。接着镜头又细致地录下了猎猎飞舞的如画红旗、四海翻腾的排空浪涛、高远蓝天的映日轻云。这一组空镜头,象征着人民群众的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力量,它有意境,体现着英雄人物“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激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弦。

环境描写和气氛烘托。影片把这场高潮戏放在船台广场,而不是在已成“死鱼”的“飞鱼”车间。一来场面大,数千人的集会,声雄势壮,表现了全厂上下,团结一致,跟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非凡气概;一来说明全厂的希望和决心,已都体现在“海鹰”上。让观众看到船台上已经成型的巨舰,昂首挺胸,振翅欲飞,形象地说明了“我们的‘海鹰’,一定会飞起来”!这场戏的气氛渲染得很足,冯涛身后,群众当中,布满鲜艳的红旗,象征着中国人民永远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红旗高高擎起。强劲的海风,吹起冯涛的满头黑发,“怒发冲冠”,正是英雄此时对修正主义者愤恨已极的写照。排山倒海的巨浪,恰好与广场上“一定会飞起来”的吼声相辉映,汇成一股所向披靡的雄伟气势。所有这一切,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表现了冯涛的英雄气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那场斗争的本质。

音响效果。冯涛的激昂慷慨的话音,自始至终响彻着铿锵的金属之声。因为冯涛是在船台广场讲话,如墙而立的巨舰发出铮铮回声,是很自然的事,因而这样处理,一点不失真,而又略加夸张,艺术效果更好。因为冯涛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在发言,在控诉,在声讨,语气坚定,斩钉截铁,有如铁锤打钢板,字字震人心。这样处理,正好是冯涛铮铮作响的心声的写照,也恰到好处地象征着冯涛的声音,已经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化成为震天撼地的伟大力量。

这场戏艺术处理的成就,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首先要对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又要重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寻找反映内容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特长,使之更好地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这样,银幕上的英雄形象,才会以独具的风采铭刻在人们的脑海里,鼓舞着人们胜利前进!

读诗漫评

徐 绎 熙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工农兵赛诗会。会场内充溢着热气腾腾的战斗气氛。来自各条战线的工农兵，刚刚还奋战在高炉前、田野里或练兵场上，身上或许还带着铁水的余热或泥土的清香，现在又拿起诗歌这个武器向修正主义开火了！这里有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是剑与火交织的语言，是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热情歌颂，是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猛烈进攻！今日的海诗坛，不就是一个扩大了了的赛诗会吗？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诗风。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一代诗风，赋予新诗歌以新的思想内容、新的语言和新的风格。象《锁链、铁锤》这样的诗，犹如催阵的战鼓，以激越的音调、短促而强烈的节奏和饱满的政治热情鼓舞读者：

挥舞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
摧毁精神上的
——一切锁链……

这首诗所表达的，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主题。“翻身的奴隶啊，可曾想过，你的颈上，还有没有锁链？”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砸碎了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可是要从思想上砸碎几千年的私有制所留下的精神锁链，还要经过长期的、艰巨而曲折的斗争。我们的新诗歌，不正是应该成为砸碎种种精神锁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吗？《锁链、铁锤》这首诗的立意正在于此。这首诗的主题，正表明了当前新诗歌所应该发挥、也正在发挥着的战斗作用。

正因为我们的新诗歌是战斗的武器，不是供人玩赏的盆景或摆设，所以它不产生在玻璃房里，而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熔炉里锻造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优秀诗篇，那磅礴的激情，明朗的色彩和强烈的时代感，都根源于它们同现实政治斗争的紧密的联系。现实生活里每一次重大的斗争，在新诗歌里都迅速地得到了反映。我们伟大时代每前进一步，都在诗坛里留下了它的足迹。新诗歌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等方面，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诗歌创作同伟大时代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好作品还不是很多，但它正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的诗坛是有生气的，是大有希望的。

一首好的诗歌,首先要有革命的思想内容。诗贵立意,这个“意”,不是指空泛的概念或抽象的议论,而是指作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实际斗争中提炼出来的某种深刻的思想。或者说是作者对生活的某种认识和见解。《辽西母亲》这首诗(见《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之所以引人深思,不但因为它构思新颖,首先在于它立意很高。部队野营经过烈属张大娘家,大娘拿出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这封信本来是当年要寄给参军的儿子、鼓励他勇敢杀敌的。可是儿子在渡江作战时英勇牺牲了。作者没有限于描写这一动人事迹本身,而是更深入一层,描写大娘拿出这封信的一番深意:“不是让你们知道一个母亲的不幸,不是要告诉你们烈士牺牲的消息”;大娘想得很深很远。先烈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但是我们缅怀先烈,记住过去,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传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位革命的母亲听到部队进村唱“三大纪律……”,“就断定是当年的儿子又回到家里!”所以她拿出那封没寄出的信,“寄给你们——贫下中农的好儿女!”还要“寄向千里万里”!读到这里,我们也张开了思想的翅膀,从革命的过去想到革命的现在和将来。

诗歌的意境,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寓思想于形象之中。诗歌可以有政论的风格,也可以有很深的哲理,但是它们仍然应该同生动的、感性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深刻的思想、饱满的激情和新鲜活跃的形象融合成一体,并且用高度凝炼而集中的诗的语言表现出来,才会构成深远的意境。“意”和“境”,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请看下面这首短诗:

从东海岸边的岬山脚下, 海防战士寄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几块耸立的礁石, 面对着波涛滚滚的海面。

浪花在它脚下喷溅, 海鸥在它近旁飞旋,
朝阳给它涂上火的光彩, 象升腾的烈焰辉映海天。

我们读到这里,虽然看到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但正如诗的第三节所说的,还猜不透“它含义的深浅”,等读到第四节:

刚想把照片夹进书页, 却发现写在后面的赠言:
“愿将生命铸成红色礁石, 永远镇守在祖国的海防前线!”

——《红礁石》,见《解放日报》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

诗的最后两句,点出了主题,就使前面描写的画面活了起来,连“浪花”、“海鸥”、“朝阳”等,都有了新的含义。诗的意境也就出来了。

如果说,形象是诗的血肉,思想就是诗的灵魂。所以“意”和“境”,重点还在于一个“意”字。《上海新民歌选》中有一首《韶山颂》:

天下大山千万座, 要数韶山最幸福,
头一个见到毛主席, 笑迎红日东方出。

短短四句,诗意很深。作者对韶山的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以及韶山对中国革命

的意义，都表达出来了。我们也曾读到过一些同类题材的诗歌，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则虽然长达数十行，辞句很华美，但由于作者感受不深而流于空泛，反不及《韶山颂》意境深远、亲切感人。有些诗歌，用辞遣句，相当精巧，描绘一些生活画面，似乎也很美，但诗意很浅，读过以后留不下什么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思想，立意不高。

诗歌的意境，应该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在思想、情感上引起读者的共鸣，激起他们丰富的联想，从而使他们受到教育。新诗歌也需要讲究意境的美，但意境总是有阶级内容的，美也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诗歌，决不能去追求资产阶级那种病态的“美”。这正如李瑛同志在《向二〇〇〇进军》（见《朝霞》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这首诗中所写的：“生活啊，决不是什么花香鸟语，平湖秋月，我们却更爱那风雷激荡，大海奔腾！”让资产阶级的风雅之士去欣赏描绘花香鸟语之类的“典雅”的意境吧，我们爱的是火热的战斗生活，爱读的也是反映这种生活、燃烧着无产阶级战斗豪情、包含着丰富的革命思想的战斗诗篇。我们的口味决不是千篇一律的。我们既爱读深邃而含蓄的作品，也爱读壮阔而明快的作品。象刘鹏春同志的《大江抒怀》（见《解放日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用“大江”的形象象征我们伟大的祖国：

红花万朵，金霞万朵，雪浪万朵，
多壮丽的大江，俨然天下风光在这儿集合。
涛声千声，汽笛千声，战歌千声，
好沸腾的大江，仿佛五洲风雷在这儿巡逻。

作者描绘了一幅瑰丽辉煌的图画，显示出社会主义祖国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海港里一杆红旗，阳光下理论小组书声琅琅，
四卷雄文，映红江天，更添满江春色。
风浪里一叶飞舟，月光下领导同志访问社员，
千群一心，描绘宏图，同把伟景开拓。

这样的意境，是明朗、开阔、壮美的。而且充满着画意诗情。

反映我们时代的重大题材，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势磅礴、雄浑而又深沉的好作品，应该成为新诗歌的主调。我们已经有了《列车飞向北京》、《狂飙颂歌》等一批较好的作品，还期待诗歌作者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当然，我们也欢迎另一种类型的作品，例如《山村晨曲》（见《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一夜梨花雪，白了峰峦、山沟。 喂，清晨何处云雀亮歌喉？
听，“吱扭——吱扭”， 一声声，鸣得尖脆，啾得清悠。

早起的司务长为了不让鸟儿吵醒战士，出门赶鸟，发现了“干柴两捆，木炭一篓”。原来不是鸟儿在唱，

只见一位大爷推着小车， 哈，唱歌的是他飞转的车轴！

这是老根据地的人民拥军来了。大爷放下干柴木炭，就悄悄地走了。司务长赶了上去，一

个不收，一个要留，相持不下。诗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

“云雀”又唱起来了：“吱扭——吱扭”， 声声飞入战士们梦哟，
好似温泉心中流。 呵，化了冰雪，
暖了人心， 山村春色稠。

这首诗没有写重大的矛盾和斗争，只是选取了一幅山村小景，以动听的音调、巧妙的构思，构成清新而优美的意境，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它刻划细致，但不流于纤巧。生活气息很浓，时代色彩也比较鲜明。它自然不是浩浩的大江，而是涓涓的细流。但这细流，也是通向大江的，也能使我们感受到那沸腾的生活的战斗气息。这类格调清新、明朗而健康的抒情小品，也是值得鼓励的。

诗歌的思想、形象或意境等等，坐在房间里等所谓“灵感”是不行的。它们只能来自现实的斗争生活。有人以为，小说、戏剧创作要深入生活；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抒情诗，是不需要深入生活的。这是一种误解。就说感情吧，它又从何而来？“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一种革命的、具体而真实的（而不是那种停留在华丽辞句上的空洞的、做作的）感情，只能来自生活实践。有些诗歌之所以空泛、干枯、冗长，根本原因还在于缺少生活，缺少来自实际斗争的真情实感。结果，往往只好堆砌辞藻，排比铺张，用华丽的形式来掩盖内容的贫乏。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实际上，如果是真正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好诗，往往就象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本身一样朴实无华，却自有一股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象宁宇同志的《地窝子家》：

背包放下， 就地安家！
抡动坎土曼， 狠把砂砾挖——
一挖门，二挖室， 开个天窗迎朝霞……
胡杨树架梁， 红柳枝做檩，
汗水拌泥土， 抹上挡风沙。
……

诗句朴素而自然，没有雕琢斧凿的痕迹，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宁宇同志的诗集《红色的道路》里，象《留下这间草房》、《他们睡了》等，都是好的。例如描写船厂的紧张的战斗生活，可以有各种写法。《他们睡了》却摄取了一个独特的镜头：

他们睡了，睡得多甜， 躺在绿色的舱室中间，
试航轮机隆隆震耳， 他们全然不曾听见。

这些生龙活虎的造船英雄们，曾经日日夜夜苦战在船台上忘记了睡觉：

那些日子太阳不落， 那些日子月锁西天；
取匹红霞裹住船身， 网下星星撒向江面。

这样的诗句，没有到过船台上的人是想不出来的。船试航了，英雄们才“突然感到那么疲倦”，“摘下藤盔枕在头下，脱件衣服垫在背肩”，就这样在轮机声中沉沉睡去了。这种情

景，是多么真实啊！作者没有正面描写船台上的战斗场面，但我们通过这一独特的镜头，不同样地可以感受到那如火如荼的紧张的战斗吗？没有到过船台的人，脑子里是跳不出这样的镜头的，心里也不会涌起这种真切的感情：希望让我们的英雄们多睡一会，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轻轻摇吧！蓝色的大海，掌稳舵吧！试航海员。”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这些诗之所以好，是因为构思巧妙。的确，上面引到的那些诗，构思都是比较新颖的。构思，对诗歌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好的构思又从哪里来？它同样只能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的深刻的认识。所谓构思，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生活题材的选择、加工、提炼和概括。如果脑子里积累起丰富的生活素材，活跃着生动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对生活的认识出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并且产生了要把这种认识表现出来的不可抑制的激情，在这样的时候，诗句往往会随着激情喷薄而出，这就不难形成好的构思。所以，关键还在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上海新民歌选》中《批判稿》这首诗，写贫农老队长夜写批判稿：

夜半人不眠， 灯光接月光。

……

几番灯油尽， 未写字一行。

夜风敲窗问， 晨星探头望。

下面，作者没有平板地叙述队长如何思索，如何一笔一划地写等等，而是笔锋一转：

扔笔猛站起， 风吹灯芯晃。

扯开胸前扣， 鞭痕迭刀伤……

结尾两句更是奇峰突起：

今日大批判， 底稿——伤疤上！

这首诗构思的确很巧很新，但作者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构思，正在于他对过去的阶级压迫感受较深，对今天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意义认识也比较深。他正是从大批判，联想到老队长身上的鞭痕、刀伤，想到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专政，再想到今天开展革命大批判正是为了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不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可见，没有对生活的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就谈不上诗的构思。

当然，革命的思想内容，要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来体现。诗歌是富于群众性的艺术样式之一。我们的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提倡诗歌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正是为了让诗歌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更好地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此，广大诗歌作者不但要努力于深入生活，深入工农群众，而且要努力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力求使新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出现新的面貌。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新诗歌的创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并非小事

陈 大 康

近日读报，发现一篇文章的十二个难字注音，竟有六个字注错了。类似这样的错误，在商店的招牌或商品的商标上也常常可以发现。

一个把几个字注错了音，似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仔细想想又不尽然。难认的字注上了拼音，对于那些读过十几年书的人固然无足轻重，但对于工农群众和识字不多的青少年却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汉字在历史上虽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过伟大的贡献，但在今天，却已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发展和文化普及的需要。毛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如果视汉语拼音为小事，马马虎虎，谬种流传，难免要误人子弟。这个道理，有些同志给难字注音时似乎没想到。然而，这却是应该想到的。

现在中年以上的人，大都对拼音不很熟悉。要使拼音不出差错，就得查字典或请教别人，这确实有一些麻烦。但不注拼音或拼错了音，却常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这里就有个群众观点的问题。我在小时是颇吃过没有拼音的苦头的。见到了“扭”字不认识，就去查字典，上面写着：“女久切，音纽”。小孩子懂得什么“正切”“反切”？只好再去查“纽”字的读音。翻开字典一看，上面写的是“女久切，音扭”。于是，就只好对它干瞪眼了。但“扭”字后面一注上“niu”，对于学过拼音的人可就太方便了。其实，要做到正确注音也不难，只消查一查新出的字典就行了。一举手之劳，能麻烦到哪儿去呢？

然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学一点汉语拼音。老师嘛，今天的小学校里都教拼音，只要向自己的儿女们求教就行了。真要说难，一个一个的汉字学起来才叫难呢！鲁迅就曾说过：识汉字总要遇到“一条高门槛：难”；至于拼音，“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门外文谈》）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点拼音是决计不难的。

自一九五七年算起，汉语拼音的推广至今已有十八年的历史了。然而，汉语拼音在推广了十八年以后却仍在许多人中遭到忽视，这个事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凡是新生事物，提倡和推广固属不易，要巩固就更艰难了。为此，我们必须强调韧性的战斗，坚持不懈，这是与旧传统、旧习惯作斗争时所必需的。历史发展的道路从来是弯弯曲曲的，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和支持，尽力为这一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眼前二万里风雷”

——评《儒法斗争史话》

黄 霖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青年自学丛书《儒法斗争史话》问世了。编写这部近二十五万字的《史话》的是十六名青年工人。他们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本《史话》，就是他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历史的战斗成果，也是工人理论队伍在斗争中茁壮成长的生动记录。

无产阶级研究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实践证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史话》本身就是批林批孔的产物。这些不久前还在捏锄头、挥铁镢的年轻工人迈进上层建筑领域里来，就是为了战斗。他们在斗争中学，为斗争而写作，坚持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这就使全书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这也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比如《焚书坑儒》一章，作者赞颂了“焚书坑儒”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狠批了林彪一伙借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在《“削藩策”与“清君侧”》、《儒家阴谋诡计的代表作》等章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吴王濞发明的“清君侧”的鬼把戏，以及邵伯温兜售“辨奸”的骗子术。阴谋家、野心家林彪把这类破烂奉为至宝，妄图篡党夺权、实现复辟倒退的反革命阴谋，最后也只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另外，如在写康熙的《“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中，既雄辩地论证了台湾历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又有力地揭露了新老沙皇肆意侵略扩张，粗暴歪曲历史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批判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史话》其他一些章节中，作者也都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引出有益的启示。

努力做到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是《史话》的又一特色。古为今用并不是把历史和

现实作简单的类比,而是要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内在的规律,以作为现实的借鉴。那么,这两千年错综复杂的儒法斗争史究竟从何理起?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史话》的作者正是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从而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分析。本书第一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论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发展,在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斗争的推动下,整个中国形成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潮流。在这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儒法对立,也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从《千古一帝》到《桑弘羊舌战群儒》,作者抓住了儒法对立的阶级实质,指出在这一时期,站在儒家一边的是奴隶主复辟势力,而法家则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又指出,随着地主阶级阶级地位的变化,汉元帝以后整个地主阶级开始向反面转化,儒家学说成了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法家作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的代表,也逐步失去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特别是明清以来,整个地主阶级已经没落,李贽、龚自珍等法家尽管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黑暗,但他们“药方只贩古时丹”,根本找不到出路,免不了陷入空虚和绝望。这样看来,《史话》较好地揭示了儒法斗争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内容和特点。即使在同一时期内,如孙臆和庞涓,李世民与李建成,柳宗元与韩愈,他们有的是兄弟,有的一度是同学或朋友,作者也具体分析了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指出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同一时期的不同法家人物,作者也根据各人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或具体的斗争实践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曹操、诸葛亮、孙权的法治倾向,就有强有弱。这样坚持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分析,就比较细致,比较有说服力,给人们的启发也较为深刻。

为了正确反映儒法斗争受整个阶级斗争规律的制约,《史话》还十分重视研究儒法斗争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关系。劳动人民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劳动人民也是批孔的主力军。为此,《史话》不仅安排了《大泽乡风云》、《“天街踏尽公卿骨”》等专门章节详加论述,而且在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插入了如“柳下跖痛斥孔老二”等生动场面。正是这些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动、影响了法家的反儒斗争,为法家推行变革路线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比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章中,作者强调指出,因为黄巾军用革命暴力搅乱了世家大族的酣梦,孔孟之道的一统天下被打得千疮百孔,三国时期才出现了以曹操为代表的一大批法家人物,他们纷纷“以儒家为迂阔”,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前进、统一的家法路线。在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基础上,作者狠批了反动的“让步政策”论,正确指出:象“贞观之治”这样局面的出现,是隋末唐初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产物,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继隋末农民起义打击大地主门

阀士族以后，进一步同儒家保守派、大地主门阀士族势力斗争的结果，有力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尊儒反法和宣扬反动“让步政策”的丑恶嘴脸。

《史话》的作者是史学战线上的新兵。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一股可贵的闯劲。他们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在史料上，也下了一番挖掘、鉴别的功夫。就以写李悝的一章而言，作者高度评价李悝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巩固统治的第一次尝试，对“尽地力”的解释，在征引明·董说《七国考》引《水利拾遗》和宋·高承《事物纪原》引《沿革》材料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发展生产，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对于王莽、秦桧以及法家忽必烈等这些过去人们较少论及的人物，也作了精彩的批判和分析。

这本“史话”，虽然完全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它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全书各章分则能独立成篇，合则似一气呵成；纵则概括了两千年的儒法斗争历史，横则照顾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等各个方面，确见作者在篇目的安排、材料的组织上是独具匠心的。对这样的表现形式，广大工农兵读者特别是青年是欢迎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成书时间仓促，前后各章还不十分平衡，个别提法显得不够确切。比如，作者在论述西汉初年“黄老之治”后说：“在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夺取政权之际，便是它们踏上下坡路的开始”。这个论断同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的题解以及本书下文的有关论述相对照，容易引起读者的疑问。至于在材料引用上，如把杜牧《〈李长吉集〉序》中的“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斥为“儒家蠹虫”的“胡言乱语”，看来失当；说诸葛亮“坚决顶住了”张裕掀起的反动逆流，也欠妥贴。当然，这些细节上的不足之处，影响不了全书的光彩。

一滴水珠可以看整个大海。《史话》所取得的成就也正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工农兵理论队伍的迅速成长。十几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在半年时间内写出了这样一本水平较高的《儒法斗争史话》，有力证明了无产阶级完全有志气、有能力占领整个上层建筑，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史话》的结尾写得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战斗洗礼，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工农兵的理论队伍在茁壮成长，他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向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迅猛进军！龚自珍写的‘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的诗句，如果借用来形容工农兵风卷残云、势如破竹的英雄气概，倒是很合适的。”我们相信，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不深入，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必将在斗争中更快地成长起来。

团结战斗的凯歌

——直罗镇大捷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吴云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就亲自指挥中央和西北两支兄弟红军，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到陕北

深秋，陕北高原上吹遍了温暖的春风：“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来到了！”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达陕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表明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定无产阶级立场，预示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蒋介石百万重兵围、追、堵、截，妄想消灭红军于长征途中，阻止红军建立北方抗日根据地；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张国焘也反对红军北上抗日，竭力把党和红军引向绝路。但是，长征终于胜利了！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政治主张实现了！

毛主席一到陕北，就拟定了一个出色的歼灭战——直罗镇战役——的作战计划。

当时，陕甘边区军民正在进行着反对蒋介石对西北红军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这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蒋介石调动了晋、陕、甘、绥、宁等省的地方军队和东北军的主力，还出动了一部分“中央军”，共约十多人，分五路进攻，妄想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消灭西北红军，摧毁陕甘边区，使中央红军失去落脚点，以图完全消灭革命力量。能不能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是不是能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这一个事关革命大局的问题。

在中央红军没有到达陕北以前，由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千里来到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和长期坚持陕北斗争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了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刘志丹两同志任正、副军团长。红十五军团在“携手作战，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的口号下，面对优势敌人，顽强作战，在甘泉以北十五里的劳山全歼了敌一〇〇师，俘虏了敌人三千七百余人，击毙敌师长贺立中和敌参谋长，缴获的武器堆积如山。之后，又在榆林桥消灭一〇七师的一个团，活捉了敌团长高福源。这两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了迎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十五军团派出了许多侦察员和向导，沿着中央红军可能来的方向，迎上前去。他们多么渴望能早一点见到毛主席，见到党中央啊！十月十日，中央红军到了三岔，和红十五军团派去的向导接上了。十月十九日，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接着，一个“回马枪”歼灭了奉蒋介石命令尾追红军的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一个团，打垮了这个师的其余三个团。毛主席又率领中央红军从吴起镇沿洛河川经永宁山南下，去与西北红军会合。

十一月的陕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但西北红军每个战士心里都象烧起了一盆火，他们要同中央红军会师的热切心情，几乎要把这冰雪世界融化。就在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两个战役的胜利之后，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郿县的道德塬一带胜利会师了。至此，蒋介石追剿、围堵中央红军，阻止南北两支红军会师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了。

布下口袋拴“牛”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的会师惊恐不安，急忙聚集重兵，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当时我军的四周都布满了敌人：东边有阎锡山、李生达的部队，北边是井岳秀的部队，西边是马鸿逵等的部队，南边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先令张学良部的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率五个师分东、西两路向我方发动新的进攻，东边以二一七师从洛川、郿县大道北犯，企图与甘泉、延安的敌人连接起来，构成一条沿洛河川的南北封锁线。西边以一〇六、一〇八、一〇九、一一一等四个师，从甘肃沿葫芦河东进，妄图构成一道东西封锁线。敌人妄想把我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阻止红军南下与关中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在甘泉、郿县一带夹击我红军。

毛主席全局在胸，早在道佐铺时就指示十五军团负责同志，先把张村驿、东村几个小堡子打下来，为下一步的战役行动作准备。毛主席选择了直罗镇这个军事要地作为这场歼灭战的地点。直罗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中间是一块狭窄的盆地，一条从西而东的大道穿镇而过。它象一只横在地上的口袋，只要把两头扎紧，就可以关门打“狗”了。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适宜于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陕北军民积极行动起来，为打好这场歼灭战作准备。我们党领导下的鄜西革命委员会，动员群众参战，并组织了大批运粮队、担架队支援前线。各路红军团结一致，决心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毛主席指示中央红军要很好与十五军团协同作战。十五军团的指战员们在战前动员会上提出了“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的口号。洛河南岸充满了热气腾腾的备战景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军按毛主席确定的作战部署，分南北两路行动。毛主席亲自指挥中央红军进入直罗镇以北的石咀、凤凰头一带隐蔽集结，在战斗发起时，由北向南打。周恩来副主席等指挥陕北红军十五军团在直罗镇以南隐蔽集结，准备由南向北打。另以一个营的兵力布置在直罗镇西北的一个小山头上，任务是诱敌深入，把敌人牵进来。这样就在直罗镇布下了歼灭敌人的“口袋”。毛主席的指挥所就设在直罗镇东北二十里的宽坪。

经过三天的准备，一切就绪，只等敌人来钻“口袋”了。一些新战士等待得有些心焦，问老战士：“敌人真的会来吗？”老战士们风趣地回答说：“会来的。敌人一定会乖乖地听从毛主席的安排的。”

要的是歼灭战

果然不出所料，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敌一〇九师，在六架敌机的掩护下，向着直罗镇走来。

一〇九师是一支东北军，士兵们大都怀着失去故乡的强烈怨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放着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打，却老远地跑到西北来打中国人。为了给士兵们打气，敌师长牛元峰把全师集中在长武城外的一个教场上，讲了一通谁也不愿意听的关于打共产党的老话之后，瞪着一双水牛眼泡说：“过去同共军作战，人家称咱们运输队。从今天起，咱们坚决不当运输队。”于是，牛元峰就率领着三个团，自恃武器精良，鹅行鸭步地沿葫芦河向东进犯。

这一天，牛元峰的部队走到了离直罗镇二十里的地方，我军担任牵“牛”任务的一营部队迎了上去，牵着牛元峰的鼻子往直罗镇跑。牛元峰自以为“旗开得胜”，得意忘形，耀武扬威地进入直罗镇，并占领了周围的北山寺和旗杆山，还杀猪宰羊，庆贺胜利。他哪里知道早被装进我军布下的“口袋”了。当天晚上，毛主席下了作战命令：各路预伏部队和鄜县赤卫队按预定计划进入出击地点。部队和担架队撒满山谷，严阵以待。直罗镇外英雄夜伏，万籁俱寂；直罗镇里划拳喝酒，灯火摇曳。二十三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我南北两路红军一鼓作气迅速地占领了山头，随即居高临下象两只铁拳一样砸了下去。敌第六二五

团迅速报销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些被压到直罗镇里。龟缩在镇里的敌六二七团慌了手脚，稀里哗啦地逃上北山，朝着敌六二六团的工事一头钻了进去，双方乱成一团。六二六团当官的破口大骂，要把六二七团赶出去，六二七团赖着不肯走，活象潮水冲进了蚂蚁窝，惶惶然不知往哪里爬好了。尽管敌人的飞机来助阵壮胆，也不能使敌人定下神来。毛主席站在霞光灿烂的山坡上，身披一件蓝布旧大衣，不顾敌机在头上象没头苍蝇似的嗡嗡乱撞，依然指挥若定。毛主席不时地看看地图，发布命令。毛主席传令各军，要协同作战，加强团结；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在红军的凌厉攻势面前，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

但这时，一股敌人缩在直罗镇里，还在作垂死挣扎，军官们举着手枪威逼士兵顶住我军的进攻。敌人还几次组织反冲锋，战斗一时处于顶牛状态。身为军团长的林彪，面临着激烈的战斗，站在北山寺的山头上，心慌意乱，犹豫动摇，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毛主席果断地命令他率领部队立即冲下山去，他才硬着头皮、迟迟疑疑地下去了。一到山下，由于指挥不坚决，不但没打垮敌人，反而被敌人包围了起来。经毛主席派人援救，才把他救了出来。在我广大指战员的强攻猛打下，敌人就象挨了一阵乱竿的鸭子，溃不成军。红十五军团当头给敌人一个闷棍，红二师拦腰猛刺，红四师堵住尾部，牛元峰这条“牛”陷在“口袋”里动弹不得，只能挨揍。十一时左右，我先头部队冲进了直罗镇。英勇的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围上去，迅速缩小包围圈，最后直捣敌人的师指挥部。敌师长牛元峰只率领了一个多营的残兵，逃进了镇东旗杆山上的一个寨子里。

老牛湾里把“牛”歼

逃到镇东土寨子里的牛元峰残部，利用断壁残垣，负隅顽抗，死不投降。土寨子居高临下，而且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十五军团组织了一次强攻没有打下，正准备组织第二次猛攻，周恩来副主席来了，他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小寨子的工事、地形，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寨子里没粮又没水，他们很快就要逃跑，我们必须在敌人逃跑时消灭他们。

缩在寨子里的牛元峰，呼呼地喘着气，向军长董英斌喊话求援。董英斌所属的一〇六、一〇八、一一一几个师都近在几十里内，但全都隔岸观火，不敢来救。

红军把寨子紧紧围住，展开了政治攻势。战士们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利用东北军和“中央军”之间的矛盾，激发东北军士兵的爱国情绪，进行阵前喊话。一个不久前刚刚从东北军中投诚过来的战士，大声喊道：

“东北军弟兄们，我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为了不作亡国奴，你们要掉转枪口，

打回老家去，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穷哥们不打穷哥们！”

战士们又喊起了口号：“优待东北军！”“缴枪不杀！”

这边一喊，那边的敌人士兵都静静地在听。许多人不想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他们看见军官来了，就胡乱打两枪，军官一转身，士兵们又伸长了脖子仔细听下去。

到了晚上，牛元峰看到待援无望，士兵们又纷纷厌战，不能再守下去，就趁黑夜带了少数亲信向西突围。红十五军团的七十五师立即追了上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追到直罗镇西南二十五里的老牛湾，终于活捉了牛元峰，消灭了残余敌人。敌一〇九师就这样全师被歼，他们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正好输送给了长征以来长期没有得到补充的红军。那个发誓从此不当运输队的牛元峰，最后还是当了一名不小的运输队长。

我英勇的红军战士乘胜挥戈向西，追击敌一〇六、一〇八、一一一几个师。我军刚到黑水寺，敌人马上向西缩回。在直罗镇战役后三天的凌晨，在黑水寺以西二十里的张家湾，我军又全歼了敌一〇六师一个团。

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直罗镇一役，牛元峰的全师复灭和一〇六师一个团的被歼，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一〇八、一一一师和一〇六师残部退回甘肃境内。从东面侵入杨泉源的敌二一七师也望风而逃，退出郿县。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胜利的曙光闪耀在洛河上游，河水欢唱着向渭河平原流去，把胜利的喜讯传遍了陕南、陕北的山山水水。

直罗镇战役是毛主席亲自拟定计划、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西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的紧密团结，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在总结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把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把群众与我们一致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这种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一致，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毛主席一贯提倡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哪个山头、哪个方面军的，不管是北方、南方的，都要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团结起来。在直罗镇战役中，正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团结一致，西北红军中的陕北红军、陕南红军、陕甘红军团结一致，才取得了战役的辉煌胜利。

直罗镇大捷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安放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配合了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对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和支持。从此，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陕北在十三年长的时期中，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汪精卫卖国记(上)

史 锋

一九二五年三月,北京刚有了一点春意,软骨虫就从石缝里挤扁了身子钻出来,沿着台阶往上爬。

台阶上正有一个男人走过。这人,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的分头;那只朝天的烟囱鼻子,更显得特别。他,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步上台阶,小心地从软骨虫背上跨过,走进屋子。

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的卧室。他已经病重垂危,深以国事为忧。这天,他对随侍在侧的汪精卫等人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呵。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你们的。你们如果想使敌人不来加害你们,就一定要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汪精卫噙动了几下鼻孔,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跟总理(指孙中山)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

台阶下的那条软骨虫,已经爬上了门槛,朝着正在觑颜无耻地说大话的汪精卫,不胜惊诧地张望着。

汪精卫是广东番禺人,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清朝的小官吏家庭。他一九〇五年投机革命,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一九一〇年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没有成功,自己反而坐了牢。第二年被释放,从此俨然成了“英雄”。但他在骨子里却始终坚持反动阶级的本性,在辛亥革命胜利爆发后,暗中勾结袁世凯出卖革命果实。五四运动中,全国人民愤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汪精卫竟写文章鼓吹中日“合作共存”,踏上了亲日媚外的道路。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汪精卫靠着追随孙中山所捞到的政治资本和投机手腕,当上了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撕下了他的“左派”伪装,不久又因与蒋介石分赃不均,被迫出走。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得到了一个重新上台的好机缘。

这个好机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反蒋浪潮。汪精卫看到蒋介石处境艰危,就趁机向蒋介石集

团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对独裁，求和平统一”的口号，要求调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实行蒋、汪合伙，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无奈，只得让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由汪精卫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主持政务。汪精卫就这样在国难声中沉浮泛起，重新爬上了统治地位，开始了汉奸的卖国生涯。

拍 卖 主 权

说也凑巧，汪精卫一月二十八日在南京登台，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天深夜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上海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奋起抗击，打得敌人死伤逾万，三换主将，还是只能爬在滨海的狭窄地区，无法前进。

上海抗战的炮声，吓昏了南京的蒋、汪合股公司，他们赶紧卷起铺盖，“迁都”洛阳。汪精卫惊魂未定，发表谈话说：“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从这时起，在短短三年半时间里，汪精卫伙同蒋介石破坏了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出卖了大片的大好河山。在这段时间里，汪精卫卖国成了瘾，卖国的勾当干得越多，越使他一步紧似一步地投向日本帝国主义。当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驻华公使要回国时，汪精卫大摆筵席，亲自把盏，为他饯行，后来又手拉手送到车站。列车开动时，汪精卫竟然洒下了眼泪，表示了无限的深情。当时有个新闻记者，讽刺汪精卫这个卖国贼，在文章里引了李白《赠汪伦》诗中的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后来，汪精卫又进一步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封闭进行抗日宣传的报刊，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汪精卫亲日派面目的日益显露，引起了依附英美的蒋介石集团的严重不安，他们就利用全国反日爱国浪潮，打击亲日派。蒋、汪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全体中央委员在一起合影，汪精卫满脸笑容地坐在前排的最中间。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刺客，举起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打中左额。汪精卫转身往椅子底下去躲，背部又中一枪，左臂也被枪弹擦伤。事件发生后，汪精卫集团说凶手是受蒋介石集团指使的，蒋介石集团则矢口否认。正当吵得不可开交时，汪精卫集团成员、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又在上海被刺杀。这等于给了汪精卫一个严重的警告，吓得汪精卫不敢再在上海就医，带着枪伤逃出上海，到国外去了。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都代以蒋介石的亲信，汪派的上层分子被一脚踢出了行政院。

被迫下野的汪精卫，漫游西欧，吟诗作赋，装出一副超脱闲逸的样子。实际上，他在窥测时机，想重新登台。

扩大班底

西安事变又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泛上水面的机会。他听说蒋介石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立即兴冲冲地打点行装回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守军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抗击。芦沟桥反抗的炮火，把中国推上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当权派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照汪精卫的本意，国民党决不能抗日。但后来看到连蒋介石也被迫改唱抗战调子，自己如果再坚持反对，势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也将与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发生冲突，因而不得不改变策略，口头上表示抗战，暗中却努力拼凑卖国集团，成为潜伏在抗战阵营中的一伙投降派。

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除了汪精卫的旧班底陈公博等一批人以外，又从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了周佛海等一伙亲日分子。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他纠集了一群心腹在暗地里进行活动。

一天，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家里，陶希圣、胡适、熊式辉、高宗武一群人又聚集在一起，嗡嗡营营，攻击抗战：

“这边调子越高，那边态度越强。”“这边”是指抗战的人们，“那边”是指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战争延长下去，中国和日本当然都会有困难。但是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已经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他们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唱高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臭名逐渐扩散开去，吓得熊式辉警告周佛海说：“你要小心。某要人说你是非战集团的主要人物。”此后，周佛海就约了高宗武、陶希圣等躲到紫金山灵谷寺后面的高塔顶上去密谈。

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的亲日卖国集团逐渐形成，卖国论调就大量出笼。他们出版书籍，编印刊物，宣传汉奸理论。汪精卫以宣扬战争恐怖的手法，瓦解人民抗战意志，他说：“我们所谓抗战，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听起来“壮烈”得很，实际上唱的是“再战必亡”的滥调。而在私下，他就明目张胆地对人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还说：“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所谓“另想办法”和“转圜”，都是投降的同义语。

一阵臭似一阵的亡国、卖国的论调，一个接着一个的托派分子、叛党分子、反动政客诸如陈独秀、张国焘、叶青的来参加卖国大合唱，汪精卫的卖国贼嘴脸也就暴露得可以了。

暗中通敌

一九三七年冬，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中国出现了长期抗战的形势，它自己已经被陷在泥淖之中，于是在继续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妄图实现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按照德国政府的指示，出来牵线。蒋介石立即作出愿意投降的姿态，彼此来往频繁。

这一来，可急坏了汪精卫。他怕蒋介石会成为日本的第一号奴才，于是抢先在十二月五日接见新闻记者，向日本横抛秋波：“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的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第二天上午，他又匆匆忙忙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陶德曼转达日本所提出的和谈条件。汪精卫竭力主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可是，这笔肮脏的政治买卖还来不及成交，南京又被日寇占领，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所提出的投降条件也更苛刻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陶德曼根据日方提出的新条件，再作第二次调停。汪精卫随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议。汪精卫还是主张接受日方条件，并将此事告知蒋介石。但蒋介石还想做些讨价还价。汪精卫要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签字，孔因没有蒋介石这个大老板面诺，不敢贸然签字。汪精卫十分恼火，责怪孔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活画出一幅汉奸的猴急相！

这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涨的时候，“和谈”的消息一传出，便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多次揭露这个阴谋。蒋介石害怕国民党这座已经倾危的大厦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同时日方提出的条件，也过多地损害了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不敢按日方提出的价格拍板成交，这次投降没有成功。

日本帝国主义见诱降不成，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由日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叫嚷：“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决心以扶植傀儡政权的办法来逼迫国民党投降。在这以前，日本已在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现在它又在南京扶植起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积极筹划南北两个傀儡政权的合流。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周佛海之流仍不死心，认为“和平之门不可闭”，“不放弃和平工作的进行”。周佛海同高宗武商议说：“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隔绝，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考虑走出汉口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于是，他们就派了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偷偷地到了日寇侵占的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

茂、日本南满洲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搭上了关系。接着，董道宁在南满洲铁路公司的代表伊藤芳男陪同下，到东京求见了日军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周佛海又以蒐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活动。这时候的蒋介石，也正在心心念念地想“和平”，一听正中下怀，立即召见高宗武，命他去香港打听日本的“和平”条件。

三月五日，高宗武秘密从香港到上海，见了松本重治，急急忙忙地打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是真心还是假意？这个姿态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十六日，高宗武、松本重治又在华懋饭店同刚从日本回来的董道宁、伊藤芳男会见。董道宁汇报在日本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会见的经过，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虽然发表了近卫声明，“但由于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趋势，日军内心的真正意向无疑地是想迅速招致对华和平”。这个情况，使得高宗武等如获至宝。为了报答日本主子的垂青，高宗武急忙透露汪精卫与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已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主和派”。这也引起了日方的极大兴趣，这一根线就渐渐地扯紧了。

不久，日本因为对华战争的长期化，引起它自身内部的重重矛盾，改组了近卫内阁。宇垣一成继广田弘毅为外相，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是又一次向国民党施放钓饵。周佛海大为振奋，对高宗武说：“到东京去一次怎么样？”高跃跃欲试。但这时蒋介石已在考虑自己另派亲信到香港，与日寇直接接洽投降，以便确保“儿皇帝”的地位，同时也害怕高宗武往返次数太多被人觉察，使自己被动，打算不让高再去香港。陈布雷将这个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这时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大为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周佛海认为投降有望，不能就此撒手，要高宗武赶快走。高宗武便于七月初从上海秘密乘船到达东京，通过同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进行会谈，了解了日本方面的诱降条件，并且摸到了日本主子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希望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的这只“底”。

高宗武回到香港，因自己不经蒋介石同意私自去日本，恐怕因此而被蒋扣留，不敢回到武汉，另派人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周佛海接到报告立即与汪精卫密商。汪知道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不禁暗自高兴。为了借日本人的力量压一压蒋介石，便对周说：“将报告原样交给蒋。”蒋介石看了之后，认为日方无异是要他下台，大发脾气，把陈布雷叫来，开口就骂：“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通知他马上回汉口！”然而，汪精卫、周佛海摸到了日本主子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从此以后，以高宗武为“跑街”，与日寇秘密接洽投降这项卑鄙的政治买卖，就从蒋、汪两家合伙转为汪记独家经营。

高宗武从东京回到香港之后，因为生病，其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香港同松本重治密谈了五次，初步确定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首领”的方案。梅思平回到重庆，把勾结情况报告了汪精卫。

汪精卫得到梅思平的报告，眉飞色舞。十一月三日，日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

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个声明立即遭到了中国人民的严正驳斥，也遭到了一些国民党人的非议。蒋介石集团一方面鉴于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一方面对“更换人事组织”，要他们下台也感到难堪，因而满怀怨愤地于十三日重申“继续抗战”。汪精卫集团听到近卫声明，意识到是主子给他们打气，就象加服了一帖兴奋剂，更加死心塌地叛国投敌。

在梅思平离渝赴沪去同日寇进一步谈判的前夕，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时，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从旁激励汪精卫：“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汪精卫决定抢在蒋介石前面去当汉奸头子了。

密 谋 出 逃

梅思平在重庆接受汪精卫的委派，于十一月七日返抵香港见到了高宗武。为了保密，两人有意分别乘船去上海同日本方面进一步谈判。

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里，日、汪双方举行预备会议。参加预备会议的有：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高宗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这所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私宅，名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预备会议，后来就称做“重光堂会谈”。

会上，高宗武、梅思平转达了汪精卫作出的保证：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起见，保证日本之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部门的日华合作。他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合办”华北的经济开发、驻兵内蒙等条件，都一口答应。在谈到北平、南京两个傀儡政府的处理问题时，双方发生了争执。汪精卫集团要求日本取消这两个政府。今井武夫声称，这两个政府都是“日本指导下的政府”，不同意取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日本人为了给汪精卫一点甜头，才决定，日后汪精卫的傀儡政府成立时，这两个政府就“自行引退”。

接着，汪精卫集团提出了成立“新”政府的计划，请主子批准。计划的要点是：在日本确认投降条件后，汪精卫就与陈公博、陶希圣等一起设法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日本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蒋断绝关系，前往香港，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云南、四川地方军队就起来响应；日本军队要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阻止中央军对上述军事行动的进攻，日军从贵州方面进行追击；“新”政府将建立在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等地区，日本从广东、广西撤出一部分军队，使两省也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地盘。

十一月二十七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带到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决定承认密约。梅思平又到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汪精卫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于十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

声明。

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改嫁”了。

但是怎样逃出重庆呢？成群结队地走，必然会使人生疑，他们于是商定分散出逃。当时有两条路，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方便，但蒋介石的特务控制着机场，太冒险；另一条是经昆明到越南的河内。昆明是西南地方军阀龙云的窝巢。当时，龙云已经被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施展一番功夫拉了过去。龙云朝着陈璧君拍胸脯：汪精卫如果经由昆明出国，我负责护送，一切都包在我身上。由于有了龙云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汪精卫集团决定。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名义，于十二月五日先去昆明，陶希圣也尾随而往。汪精卫又电约陈公博在八日从成都出发，至昆明会合；并指派陈春圃（陈璧君的侄子，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打前站，先去昆明。

逃 出 重 庆

可是不巧，就在汪精卫预定十二月八日逃离重庆的前两天，蒋介石回到重庆。不仅汪一时不能脱身，而且蒋还叫陈布雷电令周佛海立即回重庆。

周佛海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做贼心虚，非常紧张，只怕事情已经暴露。如果回到重庆去，那就不可能再逃出来。但独自逃到香港去，又不顶用，而且等于告发了汪精卫。最后，派了一个人去问汪精卫，得到的回音是蒋介石并不知道他俩的关系，这才放下心来。

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日本主子也搞得很被动。近卫只能以患病为理由，把原定在十一日的演说和广播延迟到十四日。到了那一天，汪还在重庆，近卫只好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溜回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究竟是否有投降诚意。

主子怀疑，奴才着急。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不得不取消定好的挂车包厢。

一天，汪精卫拍密电给昆明的周佛海，周叫陈代译，译出电文是：

“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陈春圃以为译错了，一再核对，还是看不懂，只好去问周佛海。周笑一笑说，“兰姊”是汪的代号，“秀妹”是日方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指日方发表声明日期的隐语，全文的意思是要通知日方不必因为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这些代号和隐语是在重庆口头约定的。于是，陈就以原电密码通知在香港的高宗武去同日本主子联系。

汪精卫在重庆，象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了十天，才找到了一个脱逃机会。十八日，预定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而这天，龙云的参谋长正好要从重庆返昆明，汪趁此机会，弄到了飞往昆明的飞机票。于是，就趁机溜走。

当汪精卫等人到珊瑚坝机场搭乘飞机时，军统派在机场的特务劝阻他们登机，几乎使他们走不成。汪就摆出官架子，大发脾气，连连的说：“我是国民党副总裁，连去成都参加会议都不行，是什么人的命令？”几个特务面面相觑，只好让他登机。谁知登上飞机，忽然发现周至柔（国民党空军头子）也在机上，汪精卫又是一惊，摸不透他是来干什么的，一直

忐忑不安，打定主意一到昆明就赶紧出逃。

飞机在昆明着陆后，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曾仲鸣出面撒谎，说汪精卫身体不适，不接见当地官员。

深夜，汪精卫同龙云密谈，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最后还用激将法对龙云说：

“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汪先生说那里的话，我完全同意。”龙云马上表态说。

汪精卫一听，就趁热打铁说：“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

龙云又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十九日，龙云果然从欧亚航空公司代包了一架飞机。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乘上飞机，仓惶出逃，偷越国境，陈公博也稍后赶去，一起公开叛国，成为亿万人民唾骂的汉奸卖国贼。

二 “卫” 双簧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确知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

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二十九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

《艳电》配合近卫的招降声明，奴颜婢膝地吹嘘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帮助主子用一切好听的词句欺骗人民。

汪精卫集团深感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是他们投降卖国的最大障碍。因而《艳电》叫嚷要中国共产党“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妄图镇压人民抗日力量。

《艳电》是汪精卫卖国集团公开投降日寇的反革命宣言。

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一唱一和，紧密配合，二“卫”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美丽的“和平”肥皂泡。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汪精卫竟丧心病狂地秘密请求日本主子加紧军事侵略，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以政治效果为目的采取作战行动；对重庆彻底轰炸，借敌军来杀中国人，以实现他当儿皇帝的野心。

汪精卫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严厉谴责。

一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批判了汪精卫

散布的种种妥协投降谬论，揭露了他卖国求荣的罪行。

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一致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破坏抗战，不知羞耻。人民群众还自动捐款塑造了跪着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丑像，让它们长跪街头，路人走过，都朝着它们责骂和吐唾沫，以表示人民的义愤。

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主张抗战的人士，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

汪精卫充当汉奸卖国贼，国人皆曰可杀，一致声讨。可见投降派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必定陷于极端孤立的绝境。

蒋、汪火并

蒋介石集团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日寇，也相当恼火。因为蒋介石正在同日寇秘密谈判，谋求投降妥协。现在汪精卫抢在前面耍当傀儡头子，就会降低蒋介石的要价，甚至日本主子有了汪精卫这个宠儿之后，可能不一定再要他这个蒋某；再加上汪派还在不断地拉拢蒋集团中的人马，动摇他的地位。因此，蒋、汪之间的狗咬狗争斗，又尖锐起来了。

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除他的一切职务。但背地里又派遣汪过去的心腹谷正鼎去河内进行游说。

谷正鼎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一听，知道是调虎离山之计。眼看就要到手的第一把交椅，岂肯就以五十万元的代价让出去，又想起了过去被刺的疮疤，更加恼怒，便对谷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归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什么护照？！”

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一听，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就命令戴笠派了军统特务十几名去河内暗杀汪精卫。

去河内执行任务的军统特务，侦察到汪精卫等辗转匿居在河内市内高朗街二十七号。于是他们就设法租赁了邻屋，住了进去，进一步仔细观察，看到汪经常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活动。一天清晨二时，军统特务越墙而入，把门打破。这时，房内一片黑暗。特务们凭手电光，看到有一男一女，就开枪射击，特别集中于男的身上。打了一阵，认为目的已达到，就呼啸而去。实际上这间房里住的是曾仲鸣夫妇，汪精卫夫妇住在另一个房间。曾

仲鸣就这样当了替死鬼。

汪精卫既要东躲西藏，日、汪原先约定要去笼络的一些人如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也都不敢公开来归附他，“重光堂”密约中关于在云南、四川国民党统治区成立“新”政权的计划也无法实现，这使汪精卫处境十分孤立。汪精卫哀叹道：“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三月十八日，日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把日内阁五相会议促汪精卫出马的决定，当面交给高宗武。汪精卫取得日本主子的支持，顿时胆壮起来，决定对蒋进行反击。

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一文，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央银行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委会的会议记录，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是早就主和的，质问他们为什么当时可以谈和，现在不可以谈，而且还要对汪夺其生命？这发冷炮，打得蒋介石十分狼狈。蒋介石急忙赖账，说这是捏造污蔑，并开展对汪精卫的假批判，以掩盖自己妥协投降的活动。这场狗咬狗的笔战，相互揭老底，着实热闹了一阵。

东京“拍板”

曾仲鸣被刺丧命之后，汪精卫深感四面楚歌，再耽在河内，恐仍有生命危险；急于逃走，又怕途中再遭到狙击，急得走投无路，只得于四月七日、八日连续与日本驻河内领事馆联系求救。

正当这个时候，日本的影佐祯昭等人赶到了河内。日方建议汪精卫乘日轮北光丸去上海。汪却忸怩作态，自行租了一只七百五十吨的小货轮凤安号。二十五日深夜，在细雨迷蒙中逃出河内，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原来约定，二十六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结果因天气关系，凤安号推迟了五个小时开船，两条船失却了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二十八日，刮起了大风，小货船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顾不得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爬上了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主子“同舟共济”了。

汪精卫在日轮上，写下歪诗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生平未尽心。”

无耻地同文天祥的壮烈诗篇《过零丁洋》唱反调，向他的主子表示了尽心充当汉奸的反革命意愿。

五月六日，北光丸在上海虬江码头靠岸，汪精卫就在船上同赶来的今井武夫会见。汪精卫提出要亲自去日本会谈。日本对于这个要求，着实踌躇了一阵，最后才表示同意。

八日，汪精卫离船登岸。他深恐再遭蒋方特务暗杀，不敢住进他在租界里的私宅，便欣然按照日本主子的安排，住在江湾东体育会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日夜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过日子。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也都象一群见不得阳光的蝙蝠，白天蜷伏在江湾一隅，夜间才敢出来活动。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周佛海等大小十一个汉奸，乘了日本海军飞机，秘密前往日本，进行卖国交易。

汪精卫带了什么去见他的外国老板？他带去的是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汪精卫的好“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一整套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幌子，以便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当时，日本已经有人怀疑汪精卫的这一套花样是否有效。因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欺骗性。后来又因考虑到汪精卫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他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精卫让他试着去办。

但是，在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鼻子，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政权去染指；取消王克敏、梁鸿志两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主子一怒，奴才大惊，于是马上退而辩解：“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思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思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精卫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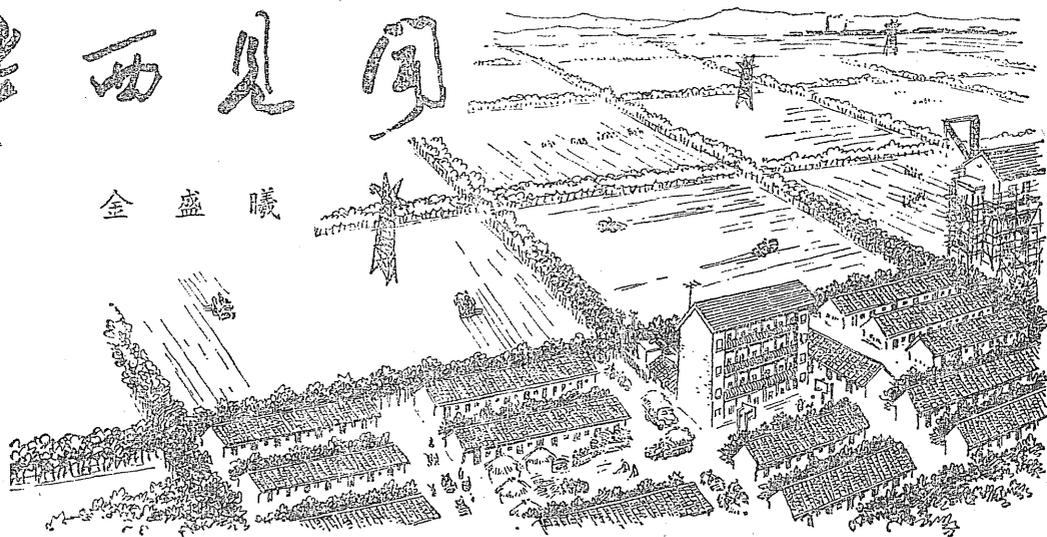
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地想：此行虽然不大顺当，但头号奴才总算当得成了。

他哪里知道一回国，事情又会发生了变化呢？

（未完，待续）

华西见闻

金盛曦



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马克思

大寨，它是我们祖国的骄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广大农村，从山花似火的南国到白雪皑皑的北疆，大寨之花遍地盛开。江苏省江阴县华士公社的华西大队，就是社会主义祖国百花园中一朵引人注目的大寨式红花。

华西新貌

从江阴县城向东南，沿公路走四十余里，有一条高约一百多米、东西绵延达十里的短短山脉，山上郁郁葱葱地长着各类树木，犹如一道深绿色的翡翠屏风，拱卫着方圆数十里的一片平川。华西大队就处在这道屏风的南面，南临张家港，背靠向阳河，东边是华士镇。

我们是从上海乘车去华西的，车子一进入江阴境内，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往窗外注视着，大约行驶有半个多钟点，望见公路旁几里路外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突兀地矗立在田野上，在蓝天的衬托下，气势分外雄伟。正要询问这是到了哪儿，旁边一位同志欣喜地说：“华西大队到了！”

“这就是华西大队？”我心里不禁有点纳闷：在不算太短的旅途上，我已经几次估想了华西大队的面貌——富饶的田野上，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在微风中有节奏地晃动——可就是没有想到在平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座高大的建筑。正想着，腾，车子转了个陡

弯，面前有一条拖拉机路与公路构成丁字形，远远地一直往前伸展开去。

从拖拉机路往前走，不消一会，便来到了这座高大建筑物的面前。这是座四层八开间的大楼，上上下下共有三十二个房间。它是华西大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文化大楼。在底层，是商店、卫生室以及缝纫、理发等生活服务组；二楼以上，是大队的农民政治学校和农民业余大学，还有电视室、图书室和乒乓室等，全大队的每个生产队都在这里占有一个房间作为学习活动室。每到晚上，整座大楼灯火通明，社员们有在这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学习文化技术知识的；有时也在这里举办政治时事讲座或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在大楼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整整齐齐的农民新村，全大队二百四十三户一千余人都集中居住在这里，每个人的平均居住面积约十八平方米。这是几年来采取坚持自愿、统一规划、自己投资、集体建造的方法，分期分批地盖起来的。在农民新村旁边，是大队的粮食加工厂、农机修理厂、电灌站等单位 and 农机停车场。在这里，一排排八架梁的瓦房，鳞次栉比，真象是座小城镇。

登上这座文化大楼的最高一层，凭栏远望，全大队的自然景色全都收入眼底。在大队四周与邻近大队的交界处，密密层层地种植着一排排高大的树木；有柳树、榆树和泡桐，也有挺拔的水杉和苍翠的香樟，这道绿色的屏障把全大队的八百多亩土地都圈在里面，构成了华西大花园的天然围墙。在这个大花园里，一条条笔直的道路把田地整齐地划成一块块方格，方格里面是华西贫下中农辛勤建设起来的高产稳产田，为了就近送肥和脱粒，在四个角落上还各建有集体饲养场和打谷场。在这里，道路、河岸的两旁和新村、饲养场的边沿全都种上了各类树木。站在文化大楼顶层上望下去，就象是在地上铺展开了一块绣着格子花图案的大绒毯，它的色彩是那么艳丽，而气魄又是那么宏伟，这该是人们花了多少劳动、流了多少汗水方能绣成的呵！据华西的同志介绍，自从学大寨以来，这里一共种了十多万棵树木，其中包括几千棵桃、梨、苹果等各种果树，如果你在春天到这里来，绿树丛中掩映着粉红的桃花和洁白的梨花，地上是一坳坳青青的麦苗和金黄的菜花，那才真是美呢！

在大楼不远的东南角上，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景象：在脚手架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打夯的打夯，运土的运土，几米高的砖墙已经垒起来了。华西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将是华西的教育大楼。这座楼一共有五层，底层是幼儿园，二楼以上是小学、中学和业余大学。县教育局本来打算拨一点款子给华西，但是华西的同志坚持不要，从资金到劳力，全部都由本大队自筹解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在将来再有机会来华西，登上这五层楼，在眼前又将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啊！

然而，华西在十年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解放前的华西是个出名的穷地方，村破、田瘦，十年九荒，八百多亩土地大大小小分成了一千三百多块，地势高低不平，高的象笠帽顶，低的象浴锅潭，半月无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那时的华西，是苦难的华西。华西的人民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半饥不饱地过着牛马

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天亮了。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运动，华西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直到一九六四年，也就是在十年以前，华西的土地仍然是那么东一块西一块的，高高低低，七零八落。虽说土地早已归集体了，但社员们在称呼这些小田块时，用的仍是什么“吴家三亩”、“李家二亩”的旧名称。它反映了这样一桩事实：如果不去消灭土地上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痕迹，人们头脑中的私有制痕迹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铲除。华西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华西大队的贫下中农也看到了这一点。

一九六四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这股春风吹进了华西大队，吹进了吴仁宝和贫下中农们的心田。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安排山河，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的旧天地。

“那时候可真是难哪！”陪同参观的一位老贫农对我们说。他名叫瞿汝生，今年五十七岁，祖祖辈辈都住在华西的下瞿巷，现在是老愚公战斗队的队长。“学大寨可得有个规划哪！那一年，吴仁宝带领着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跑遍了全大队一千三百多块田，三十条河沟，十二个村庄，一块块认真观察，仔细商量，提出要在十五年内，开挖一条华西河，建设一片稳产高产田，做到每亩年产一吨粮，同时，在全大队群众普遍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有步骤有计划地将十二个村庄集并起来，建设一个新农村。

“这一下，可真是轰动了整个华西。有的同志见了吴仁宝，便开玩笑地摸摸他的额头说：‘是不是热得发昏了？’还有的人在背后放空气说：‘吴仁宝要拆天了！’有的人还认为这个规划是‘吹牛’，外面有些人也把华西大队叫做‘吹牛大队’。就拿我自己来说，当时也真有点替仁宝担心。农业合作化那一年，我们六队、八队、九队三个队全力填平一个一亩多大的池塘，就整整干了三个月才算填完。现在要把河填成田，把田开成河，这可不是容易事哪！再说，当时不少干部嘴上不说，心里可都对这个规划有看法，要解开这些思想疙瘩，可就好比填沟开河更难了！”

“那怎么办呢？”瞿汝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

“仁宝真行。”老瞿接着说：“他看出了我们的心事，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的教导，要我们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地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他还给我们仔仔细细算了这样几笔账，鼓励我们说：‘我们全大队八百多亩田，每年平它五、六十亩，每亩二、三百个工，总共不过一两万个工。我们全大队四百个劳力，每人每年做五十个工，十五年怎么平整不完？现在我们亩产八、九百斤，如果积足肥料，科学种田，十年里每年增产一成，十年后每年增产半成，干它十五年，为什么不能达到一吨粮？再说，现在如果不搞规划，到处乱造房子，看不到人口年年增加，一家一户都要有个小宅基，死一个人一个坟墩头，那么，不要六十年，华西就只剩下房子和坟墩，连种的地也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他这样一算账，算得大家口服心服。他大会讲，小会讲，讲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下定决心要象大寨人那样地大干。”“当时大家齐

着一条心：吹牛不吹牛，十五年后再看吧！现在才过去十年，土地平整得怎么样，这个我就不说了，反正你们已经都看见了嘛！要说粮食，一九七二年就达到了亩产一吨。去年全大队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六十多万斤，平均每亩提供七百斤商品粮。今年看长势，亩产要超过‘三纲要’——可能要到二千五百斤。”老瞿的话使我们振奋，也使我们激动，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大队每人平均只有八分地，要交售这么多商品粮是多么不容易啊！

老瞿说自己记不清许多数字，要我们到文化大楼三楼会议室看图表。我们原先对数字并不感到太大的兴趣，但一看之下，却是惊奇了。十年来，华西社员的分配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过去，大队欠国家一万五千多元，现在不仅还清了欠款，而且还积累了集体资金四十三万余元，集体储备粮二十九万斤；在所有制关系上，社员在一九六五年时，集体收入约占百分之七十，个体收入约占百分之三十，而到了一九七四年，集体所有制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个体所有制收入下降为百分之二点三。从这些数字里，我们听到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胜利前进的脚步声，看到了农业学大寨的革命群众运动如何在全国各地开放出了艳丽的花葩。

十年，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只能说是短短的一瞬。在这十年中，一些人忙忙碌碌地经营着自己的安乐窝，让时光平平庸庸地流过去了；另一些人却在这段时间中过着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献出了自己的壮丽的青春。只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把自己生命照亮的革命者，才能使时间的意义最充分地显示出来，才能在同样的时日中创造出其他人所不能创造、甚至不可思议的奇迹来。十年前，当华西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学大寨的十五年规划时，有人不是曾经嘲笑过他们是“吹牛大队”吗？但是，经过十年的努力奋斗，当年那些被认为是“海市蜃楼”的幻想，今天不是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吗？华西大队十年来所经历的伟大变化，是全国农村学大寨的一个缩影，它显示着祖国几亿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社会主义的带头人

在华西，要找干部谈话可真是不容易哪！

到华西的第二天，大队党支部的三位副书记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望了一下，当时正值“双抢”大忙季节即将开始，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要深入了解大队情况，总得再找他们聊聊。但几次去大队办公室，都扑了个空。是去公社开会？不是。他们都到田头劳动去了。

虽说是扑了好几次空，却也不能说是毫无收获。在大队办公室，就看到了这样一张干部劳动统计表，上面记载着：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等共九人，每人每年参加劳动的平均天数都在三百天以上。我们看到这里，心头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在这一点上，华西学大寨可说是真下了功夫。

江南的八月夜晚，天气真是闷热，许多社员仍然在田头继续劳动，我们同留在家里的一些老人闲聊起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上——

“你们大队的干部每年参加三百天劳动，真是不简单。可他们开会、工作的时间放在哪里呢？”

“晚上嘛！我们大队的干部们在白天是不开会的，也不允许把社员从田头喊出去谈话。自从仁宝一九六八年去大寨学习、参观回来后，就定下了这么一条规矩。”

“你说的是不是你们大队支部书记吴仁宝同志？”我们问。

“他现在是我们江阴县委书记了。”

“当了县委书记，那么忙，还能参加劳动？”

“谁说不能？他常来我们大队参加大田劳动，劲头可大呢！就拿前几年来说，他是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又兼任了公社党委委员、江阴县委委员、苏州地委委员这些职务。工作这样忙，仍旧保证了二百多天的劳动。有一年春节，大队党支部带领我们广大社员平整土地，在分配任务的时候，仁宝和社员中的强劳力一样，照领了六十个土方的任务。刚开始挖了两天，公社通知仁宝去参加批林整风会议。社员们对仁宝说：‘批林整风是大事，你去安心开会吧，留下的土方任务交给我们来完成。’仁宝笑笑说：‘开会重要，参加劳动也重要。干部参加劳动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这和批林整风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白天参加会议，回家后坚持挑土，有时甚至干到晚上十二点钟。这样地起早摸黑、争分夺秒，六十个土方一个也不缺地完成了。一九七三年，他担任了江阴县委副书记，工作更忙了，加上参加党的‘十大’和省里举办的学习班，又去了八十多天时间，但这一年他还是劳动了二百零三天。有了这样一个带头人，在我们大队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干部自觉地坚持参加劳动的风气。”

“吴仁宝同志对自己的要求真严格！”

“可不是！他不仅在劳动上是这样，思想上、生活上都处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就拿一九七二年的年终分配来说，他在自报公议时只报了三百四十四工，比社员中的强劳力少了四十二工。这一来，社员们心里都感到不安，说：‘你每天这样日干夜干，拿五百工也嫌少，应当和大队里的最高工分一样。’但仁宝却再三耐心地向大家做说服工作，最后还是坚持不加一个工分。其实，他家的生活比我们这里的一般社员的家庭还要差些。也还是这一年，上级商业部门分配给我们大队好几条棉花胎，说是照顾困难户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岳歧跑遍了全大队二百多户人家，横比较竖比较，比来比去还是吴仁宝家里最困难，就按照制度规定，分给了他一条棉花胎。但是，仁宝说什么也不愿要。他对吴岳歧说：‘阿岳，解放前，我年年冬天睡的是白席，那个年月也还不是过下来了。现在我已经睡上了棉花胎，不过是旧了一点，盖在身上照样是暖烘烘的。这条棉花胎还是让给别的社员吧！’‘你家最困难，按规定该是你家拿，这可不是什么干部搞特权。’吴岳歧有点生气了。但是，吴仁宝还是不肯拿，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长工，让社员吃的住的都比我们

好一些,这才算尽到了责任。’他亲自一家一家地进行访问,结果把这条棉花胎给了比他家条件要略好一点的五保户。”

夜深了,该是结束谈话的时候了,社员们明天还得出早工呢!但是,我在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吴仁宝的形象仍然久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可真是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得设法找他谈一谈才好。听说他在当了县委书记后,经常往下面的各个公社里跑,边劳动边搞调查研究,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公社,要找也无从找起。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明天还是先找别的社员聊聊吧!

.....

第二天,从社员的口中听到了吴仁宝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许多生动事实,其中有个“割尾巴”的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此,这天收工后,我们就到孙满泉家里去拜访。但是,左等右等,孙满泉就是不见个人影。向他家里人一打听,原来孙满泉是大队的副业队队长,整天里里外外忙这忙那,总要天很黑很黑才回家。眼看人是等不到了,到饲养场去找吧,天又晚了,我们只得回住地去了。

隔天一早,我们刚起身不久,听见有人向隔壁房间询问:“上海来的几位同志住在哪里,你们知道吗?”“这是谁?”我们心里正疑惑着,门推开了,一个人匆忙地跨了进来,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叫孙满泉。”

我们赶忙起来让坐,端了杯开水放在他面前。他坐定后,说:“同志,真对不起,这几天养猪场里有些事要处理,累你们久等了。”

“别客气,我们知道你们大队的干部都很忙,但还是想找你谈一下。听说你们大队党支部对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很坚决,你有比较深的体会,想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怎么个谈法呢?”他有点迟疑,低头想了一会,然后抬起头来爽朗地说:“好吧,就从这个‘忙’说起吧,我现在的忙和过去的忙可大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呢?”

“过去忙,忙不到点子上。现在忙,忙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能说这两个‘忙’是一样的吗?”一说开了腔,就有点激动起来了,他说起了自己的这样一段经历——

孙满泉原先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他那个队底子薄,收入低,是个穷队,但他队里有社员会做豆腐,队里就设了个小小的豆腐坊,外队的社员拿黄豆到这里来加工、做豆腐,队里也可以落点豆腐渣喂猪。有一年冬天,孙满泉正为社员年终分配收入少而犯愁,眼里望着豆腐坊,心里不禁想着最近队里有一批黄豆质量比较差,如果把它加工成油豆腐,再用油豆腐向社员换好的黄豆进来,然后把它加工成豆腐,趁春节用高价卖出去,岂不是一笔好收入!他找几个人粗粗算了一下,到年终至少可多收入四五百元钱。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动手干了起来。

刚做了三担油豆腐，给吴仁宝知道了，当晚就找到了一队。他拍了拍孙满泉的肩膀，笑笑说：“今天我这把刀磨得快快的，要来割你的尾巴！”

“啥，割我的尾巴？别开什么玩笑，我可没有什么尾巴给你割。”

“怎么没有？你想做豆腐卖高价，就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

“卖豆腐赚钱是为了增加社员收入，对集体也有好处，又不落我孙满泉的腰包。这怎么能算是搞资本主义？”

“满泉啊，不要小看多卖少卖几个钱，这里也有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如果大家都去卖高价，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我们干部是带头人，可得带大家往社会主义道路上奔呀！”

当时孙满泉的心里可实在想不通。好好一件事，就叫你吴仁宝这样给轻轻巧巧地搅掉了。个别社员也有看法，觉得吴仁宝的这把刀子实在太快了。吴仁宝听到反映后，说：“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把刀就是要快。钝刀子割肉是割不出血来的。”后来，通过大队党支部的耐心教育，孙满泉终于想通了，最后把这三担油豆腐用平价卖给了社员。路子摆正了，生产飞快地翻了上去，社员们的收入也做到了一年比一年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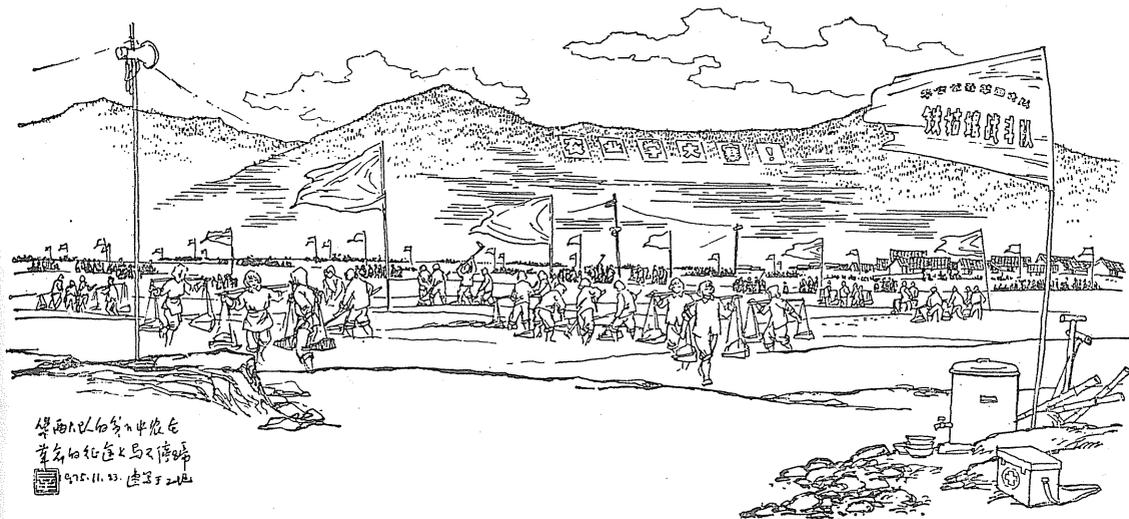
“对，这把刀就是要快！”在听了孙满泉的这一席话后，我们都不由得这样想。后来，当我们在华西大队接触到了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以后，就越来越深刻地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了上来，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就被压了下去。在华西，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思想深入人心，蔚为风气。有个老饲养员摔坏了腿，儿子给他买来了云南白药，他却去敷在集体饲养的公猪的伤口上。池塘里的鱼跳到了岸上，路过的社员拾到了就送到大队，没有一个把它拿回家去的。有个社员家的南瓜藤蔓延到了大田边，结了个大南瓜，这个社员在南瓜成熟后把它摘下送到大队办公室去。一瓶白药，一条鱼，一个南瓜，这都是些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上却反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一种共产主义的新道德。华西人们的思想面貌就是这样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双抢”大忙季节到了，我们在华西的访问也将告一段落，遗憾的是始终没有能见到吴仁宝同志，打算在回程中去江阴县城访他。说来也真巧，吴仁宝同志却主动上门来了。原来江阴县委今年在吴仁宝主持下作出了个决定：“双抢”大忙期间，凡是县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都到蹲点的大队劳动十天，工作十天；县级机关干部，包括国营企业的领导干部在内，除留下少数人处理日常工作外，也一律都到大田去劳动十天。老吴这次就是来大队参加劳动的，劳动期间还当了五天的作业组组长，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晚上一直劳动到十一点钟。

见到了吴仁宝，根本看不出是个县委书记，裤管卷到小腿肚上，赤脚穿了双塑料鞋。一握手，手上全是厚厚的茧，粗糙而又温暖，难怪当地的人们都亲切地用“赤脚书记”来称呼他。他和我们谈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生动地谈到了华西大队的未来，江阴县的未来，谈到了新的远景规划和进一步学大寨的具体措施。听着，听着，我们不由得入迷了。他的

思想境界是那样地开阔,又是那样地深远,一直引导着我们去看到了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这里不又是一个大寨式的英雄人物么!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推动下,在亿万农民中必将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大寨式的英雄人物来。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几亿农民,有了这样一批农村的社会主义带头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完全不难在二十世纪内实现的!



铁姐和铁姑娘们

铁姐,又叫阿铁,是华西大队铁姑娘战斗队的第一任队长。

其实,铁姐并不姓铁,她原来的名字叫赵毛妹,铁姐是别人给她取的外号。外号叫出了名,在华西不论是大人或小孩,一提起铁姐都知道是赵毛妹。

树有根,水有源。赵毛妹得上铁姐的外号,其中也有个因由。一九六八年,赵毛妹二十二岁,她跟着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一起去大寨参观,回来后,比着葫芦画个瓢,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学大寨铁姑娘战斗队”,一起报名参加的有六十多人。当地贫下中农提起这个铁姑娘队,没有一个不翘起大拇指夸赞的。

铁姑娘战斗队刚一成立,就碰上了一场硬仗。当时,大队党支部为了实现学大寨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决定建造一座电灌站和一条一千米长的地下渠道,还准备在当年平整好六十亩土地。修筑电灌站要大批石方,支部书记吴仁宝带领着一批青壮年劳力上山采石去了,平整土地的任务就落到了铁姑娘和留下来的社员们的肩上。那一年的冬天,恰好逢上了江南罕见的严寒,大雪封门,天寒地冻,屋檐边沿上挂下了一尺多长的冰棱。赵毛妹带领

着铁姑娘们,不管刮风下雪,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天天如此。地冻得硬梆梆的,一铁镢盆下去,地面上有时只留下几个浅浅的白色齿印。铁姑娘们虎口震裂了,肩膀挑肿了,但谁也不肯吭一声。铁镢盆坏了,换一把。扁担挑断了,换一根。赵毛妹一个人就盆坏了三把铁镢,挑断了三根扁担,最后干脆丢下了竹扁担,换上了更结实的树扁担。就这样,她们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原来估计要三十二天才能完成的土方任务。这一仗打胜后,铁姑娘的声名在全华西传开了,赵毛妹也就从此得了个“铁姐”的外号。

那几年,华西大队为了彻底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年年移河填沟,平土整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干得十分欢腾。那些富农分子看见自己原来的田块连成了整整齐齐的格子田,就象挖了祖坟似的,恨得牙痒痒的,便在人前背后放风说:“不得了啦!干部出风头,群众吃煞老苦头,大家都要做煞了!”有些思想觉悟不高的社员,也跟在后面一起叫喊:“做煞了!做煞了!”别的大队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了这些叫喊,也误认为华西大队真的是个“做煞大队”了。一来二去,“做煞大队”就这样出了名。

可不要小看了“做煞大队”这个名称,它所掀起的风浪可大着呢!当时,华西的男青年娶不到外队的女青年,那些女青年的父母一听说自己的女儿找上了华西的男青年当对象,就千方百计地劝阻,说是“有女不嫁华西人,要做煞的!”华西大队有个男青年叫赵福元,已经和另一个大队的一个女青年订了婚,谁知对方在这时竟要求立即解除婚约,一头亲事就这样吹掉了。华西的女青年在外队找有对象的,对方的父母也是竭力阻挠,有的人还难听地说:“做煞大队的姑娘,年轻的时候都做伤了,嫁过来也出不了大力。”

这对华西的男女青年们是一场严重的考验。究竟是前进呢还是后退?华西的每个人都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经过周密的调查,揪出了那个散布流言蜚语的富农分子,发动群众进行批判,肃清流毒;同时,在社员群众中开展基本路线的教育,还广泛地开展了“要不要艰苦创业”的讨论。这场讨论可真是热闹呢!五十八岁的老贫农朱法生说:“一个苦字两样味。要是现在怕艰苦,留着小农经济的根子不拔掉,资本主义还会有复辟的可能。到了那个地步,才真正有得苦哩!”那个赵福元跳上台去表决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华西,一辈子讨不到老婆也心甘!”华西的铁姑娘们也纷纷激动地说:“人家说我们是‘做煞大队’,我们就是要一辈子不离华西,看我们究竟是不是做煞了!再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我们就是做煞也情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是说“有女不嫁华西人”吗?赵毛妹就偏偏爱上了那个被退了婚的赵福元。过了没有多久,两个人就结婚了。你看,赵毛妹这个人的性子倔不倔?这位铁姐是名不虚传的,她要拿定了主意,九条牛也休想牵得她转。

在大队内外,有不少人对赵毛妹有看法,说她这个人好憋气。的确,这话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她在当时确实是憋了一肚子的气。试想一下,华西大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战天斗地,而有人竟诬蔑说是“做煞大队”,她能不气?华西大队的青年女社员们发挥了半

边天的作用，有人却在背后对铁姑娘队指指戳戳，她能不气？如果见了这些都不气的话，还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

赵毛妹的钢铁性格是在大风大浪中锤打出来的，华西的铁姑娘们的钢铁性格也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锤打出来的。

按照华西的旧习惯，妇女们是不准上屋、摇船的。当地有句俗话：“妇女上屋屋要坍，妇女上船船要翻。”但阿铁和铁姑娘们根本不领这个账。上屋架梁，翻顶盖瓦，干！摇橹运肥，干！凡是男社员能干的活，她们没有一样是不能干的。在华西的铁姑娘战斗队中，象赵毛妹这样的先进人物，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拿黄苗娣来说，她是从别的大队嫁到华西来的。她娘家大队的人说：“苗娣嫁到了‘做煞大队’，要苦煞了。”但黄苗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坚决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华西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她有一段时期担任了养猪场的饲养员，每当母猪产小猪时，她整天整夜守在猪棚里，很少合过眼皮。有的小猪生下来后，眼看快要咽气了，她就嘴对嘴地把小猪口里喉咙里的脏东西一点一点地吸出来。她在娘家时只做个忙头，刚嫁来华西时，处处不习惯，很多农活都拿不上。但在大队党支部教育下，树立了革命理想，终于成为华西这个钢铁集体里一名出色的女战士。铁要经过锤打，方能成为好钢。黄苗娣所走过的道路，就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女人呵，你的名字是弱者。”这是西方资产阶级作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是，在铁姐和铁姑娘们的身上，你能见到一丝一毫弱者的影子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妇女，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正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越来越重要地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大寨的铁姑娘是如此，全国千千万万的铁姑娘也都是如此。

铁姑娘们呵，愿你们在革命的熔炉中百炼成钢！

令人羡慕的人们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经说过：“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华西的贫下中农正是这种值得羡慕的人。他们改变着自己脚下的土地，也改变着自己的思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天傍晚，我们又从那座熟识的文化大楼门口走过。往常这个时分，社员们大多还在家里吃晚饭，只有那些吃起饭来狼吞虎咽的青年们，飞快地扒完了碗里的饭，便急急忙忙地带着学习资料和二胡、笛子赶先来了，把自己的笑语欢歌送向炊烟袅袅的农民新村，报道着又一个欢腾的夜晚的来临……

可今天多奇怪啊，每个小队学习室早已灯火通明，窗口飘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和碗筷的声音。我们信步走进去，哈，每个房间里摆了三、四桌，每桌坐八个社员，中间放着四大盆

菜：一盆豆腐干烧鸡，一盆辣椒炒肉丝，一盆炒笋瓜，一盆炒豇豆，还有一面盆的咸菜豆瓣汤。吃饭的社员们见我们进去，都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

原来这天大忙开始了，社员们在农忙食堂里吃饭。我们说：“你们吃得真不错呵！”

“是呀，我们这里就有这个规矩，平时要节约，大忙时体力消耗大，要吃得好一点。”这时，一个刚吃完的青年社员站起来，边说边领着我们到其他房间去看，还给我们讲起了这个农忙食堂的历史。

这是一九七一年的“双抢”季节，支书吴仁宝和社员们一起冒着炙人的炎热在割稻，中午收工时，一个男社员说了句：“真热！”一个中年妇女笑着说：“你们男同志回去还好坐坐歇歇，我们妇女一回去又要钻热灶头，等吃好饭又要下田，可比你们艰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天晚上，老吴召开了支委会。大家谈起了铁姑娘们前些天表示的决心：“宁愿掉了几斤肉，不让后季稻缺只角！”“不怕浑身筋骨痛，不让季节拖后一分钟！”大队领导干部们认真地讨论着：怎样才能使社员们在大忙季节“不掉肉”？

作为这次支委会的决议，农忙食堂很快就办起来了。几天后，社员中午一收工，就往农忙食堂跑，食堂里有冷开水、大麦茶，有时还有番茄、西瓜，吃罢饭，还规定午睡一小时。往后，年年如此。

老吴办事，历来讲究实际效果。食堂办了，但社员经过大忙究竟还“掉肉”吗？这成了他的一桩心事。第二年大忙前，他特地指定六十位铁姑娘去称了称体重，把数字记下，待大忙一过再称，竟有三十九人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一九七三年又称了四十九名铁姑娘的体重，有三十一名增加了。到去年，大忙前又找了些社员称了体重，但大忙一过大家都说：“不用再称了，看脸色就知道了！”

听了这段有趣的历史，再穿行在一排排饭桌间，我们哪能不从声声笑语、阵阵菜香中感受到了党的温暖，闻到了社会主义农村新生活的气息？

当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有些吃完饭的社员陪着我们边走边说：除了农忙食堂，还有个常年食堂，主要服务对象是插队知识青年和学校教师。社员家里来了客，不必误了工上街买菜，这个食堂可以代买代烧。华西大队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和积累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举办了类似集体福利事业：要理发，大队有三名理发员，每个社员每年只要交一定费用就可以包理全年；要做衣、鞣鞋，有缝纫组、鞣鞋组，收费很低廉；要洗澡，有男女浴室各一座，利用加工厂余热温水，全部免费；生了病，有合作医疗，每月十元以内的药费，由公益金报销一半；小孩没人领，大队有托儿所、幼儿园，甚至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架爆炒米花的工具；小孩长大要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学费全部由公益金支出……

我们几乎听得入迷了，说：“你们想得真周到啊！”他们说：“这不是靠谁想出来的，是实际斗争中逼出来的。要学大寨，把劳动力有效地组织起来，没有这些后勤措施不行；而学了大寨，集体积累增加了，又使这些措施的实现有了保证。”

就这样，我们和社员们谈着，谈着，要不是考虑到他们今晚还要继续战斗，真想一直谈下去。从他们朴素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生产方式的变更正在引起生活方式的变更，精神生活的前进正在促进物质生活的前进。华西的贫下中农一旦看见某一种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成了前进的绊脚石，便下定决心抛弃，然后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新的习惯。为了不耽误革命、生产，春节假日期间，是华西男女青年嫁娶的日子。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仪式可隆重呢！干部、家长上台讲话，鼓励新婚夫妻们继续革命；接着是新郎新娘上台表决心；晚上，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招待新婚夫妻和来贺亲友。招待吃饭，大家也合计了一个既热闹又朴素的规模，而且食堂可以代办。铁姑娘若要嫁到外队去，大队一定要送她三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套六件小农具，农具上用红字写着：“华西铁姑娘，继续革命不转向。”就象种子一样，铁姑娘们带出去了华西大队的革命精神，生根发芽在新的土地上。

社员去世，在华西也都实行了火葬。在全大队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有三间骨灰存放室，四周松柏森森，碧草如茵。每年清明节，党支部在这里召开纪念会，请老贫农向青年们讲述过去老一辈的苦难史和斗争史。结果，这个纪念会每年都变成了新一代继承前辈革命遗志继续往前闯的誓师会。

这一切，看来都是生活琐事，却使我们听得浑身发热。躺在床上很长时间睡不着，田野的风在窗外吹过，但在我们听来，好象是一阵阵含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活浪涛在耳边轰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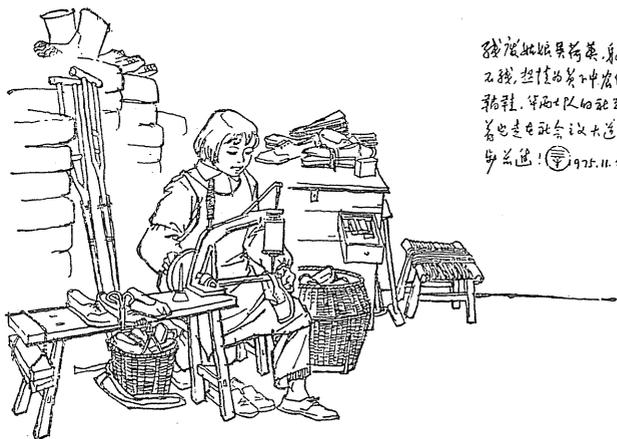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我们没有任何迟疑，便朝大队办的生活服务部门走去。

商店、卫生室、理发室、托儿所……一个接着一个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它们统称之为“为人民服务战斗队”，是啊，和热气腾腾的田头一样，这儿是另一条战线；同样的紧张，同样的欢悦，同样的洋溢着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战斗豪情！

在这些服务部门，我们看到不少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同志。他们参加大田战斗有困难，但实际上，他们却从侧面保证了大田的战斗。对其中许多人来说，他们不仅用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参加大田战斗的同志们的手脚，同时，也解放了自己。

现在，我们走进了缝纫鞣鞋组。只见那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鞋匠，而他们的身边，各放着一副拐杖，原来两个人都是残废。他们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大家就攀谈起来。女的自我介绍，叫吴荷英，二十二岁，鞣鞋组组长；那个男青年叫李忠兴，才十九岁，是她的徒弟。我们见她边说边干，技术熟练，就问：“你什么时候学做皮匠的？”

小吴爱笑。我们从她不时夹着笑声的回答里，知道了她简单的经历。她从小双脚瘫痪，到十六岁还坐在家里吃闲饭。看到和自己同龄的铁姑娘们在豪迈地战天斗地，她常常坐在家门口羡慕地看着她们，流过好几次眼泪。党支部看见了这位姑娘希望参加战斗的迫切心情，考虑过种种工作，都不合适，最后想到了皮匠。于是，有一天支部书记吴仁宝亲自划了一条小船，把小吴送到华士镇上学鞣鞋的手艺，“包袱”就这样地变成了财富。小



残废姑娘吴英，决心
工线，想给贫下中农修鞋
鞋。华西大队的社员穿
着也是社会主义大道上阔
步前进！（1975.11.21）

吴当鞋匠干了六年，华西贫下中农穿着小吴修制的坚实鞋子走了六年；在他们前进的深深脚印里，也倾注着这位残废青年的一片心血和满腔豪情啊！

残废青年焕发青春的消息也激动了残废的老年人。离开吴荷英以后，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看见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在搓绳。她叫赵香妹，今年正

七十岁。几年前，她多次提出也要参加学大寨的战斗，而且说自己能搓绳，插秧拉线、搭棚都需要。她还说：“反正不干活也在家闲着，我搓绳不要工分！”党支部同意了这位老年人的请求，但工分一定要照常给她。赵香妹老太太听到我们进去，就愉快地对我们说：“同志，我人没去过北京，可到过北京的仁宝对我说，我这几年搓的绳子接起来有三千多里长，可以通到北京了！”她说这话时，神情里充满着残废人所罕见的豪迈气概。

看着这位双目失明的老太，我们激动得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转。残废人的命运，往往最能照见一个社会的性质。吴荷英、赵香妹，如果在旧社会，她们的命运怎么能设想呢？但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她们的命运和其他社员一样，也是“令人羡慕的”。这是因为，她们不仅在过着一种新生活，而且也用自己的双手在创造着新生活！

从生活服务部门出来，我们看到了大队办的少年武术队在练功，学校在上课，业余文艺宣传队在排演节目，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欢唱……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天地啊！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大胆的幻想家。在我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曾写过《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理想世界，借以寄托自己要求改变当时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局面的愿望。在外国，也有人写过《乌托邦》、《太阳城》等等。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描绘的图画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在千千万万个向大寨的高度努力攀登的农业先进集体中，比前人的愿望不知美妙多少倍的光辉理想正在逐步实现，华西大队正是其中的一个。敬爱的华西贫下中农们，你们就象大寨的贫下中农一样，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缩影，你们在用自己艰苦的努力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离开华西大队后不久，听到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的消息。听说吴仁宝同志也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华西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又该矫健地向前迈开了新的步伐了吧！我们在惦念着。

学 习 与 批 判

一九七五年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后一数字是页码)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4)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张春桥(2·12)
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2·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2·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2·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2·28)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3)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3·16)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4·3)

加强革命团结的保证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方 海(2·30)
《国家与革命》和叛徒布哈林
.....上海吴淞化工厂工人 余锡君(2·34)
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一点体会··辛 彬(2·37)
抓好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党总支委员会(2·40)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一点体会
.....方 海(3·25)

伟大的道路 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雍 昌(3·28)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3·33)
读旧报有感·····翟 青(3·38)
有这样一张便条·····章智明(3·42)
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任 菁(3·44)
立党为公 不谋私利
——读《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齐永红(4·11)

要认真克服经验主义

——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一点体会
.....方 海(4·14)
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回顾·····翟 青(4·17)
读《清贫》·····沈逸珍(4·21)
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培光中学应届毕业生 胡兆禹(4·24)
“饭碗”小议·····陆 实(4·27)
“同志”——崇高的革命称呼·····昌 华(4·29)
柜台边上的杂感·····龚 青(4·30)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4·32)
把理论学习当作首要任务抓好
.....中共上海市机床制造公司委员会(4·36)

重视调查研究

——学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一点体会·····官效闻(5·3)

砸碎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方 海(5·6)
漫话城乡差别·····康 立(5·11)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二)·····(5·15)
商品自述·····景 池(5·19)
刘华——“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
.....上海中华印刷厂 许豪炯(5·25)
旧事重提·····翟 青(5·33)
读《带镣行》·····东风线厂 沈逸珍(5·36)
不要拒绝做“小事”
.....上海第二机床厂 司徒伟智(5·39)

当理论为群众掌握的时候

——上钢五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侧记
.....本刊通讯员、记者(6·3)

增强党的观念

——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常学新(6·12)

在理论学习中加强党员教育

.....中共上海砂轮厂委员会(6·15)
漫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康 立(6·17)
商品自述(二)·····景 池(6·22)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完)·····(6·27)
忆柯庆施同志二三事·····叶伯乐(6·30)
读一个旧《通知》·····季昌华(6·34)
“函授”日记摘抄·····复旦大学新闻系 林 帆(6·37)
论“气派”·····陆丽芬(6·39)
份内、份外·····龚 青(6·41)
“钱能通神”及其他·····谷 卓(6·42)

还要努力作战

——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点体会
.....中共上海县委(7·3)
牢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任志高(7·9)
在理论学习中促进安定团结
.....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党委书记 干忍安(7·13)

商品自述(续完)……………景 池(7·15)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学习《论联合政府》的一点体会…谷 珊(7·30)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上海前哨农场青年工人 韩天宇(7·33)
 一份鼓舞人的个人计划
 ……江南造船厂青年工人 黄永林(7·35)
 八路军的“样子”
 ……上无十六厂青年工人 陈传宏(7·36)
 延安干部的品格…上海机械施工公司 吕长生(7·38)
 光明的一生
 ——记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史 锋(7·41)
 赞“穷棒子”精神……………第二机床厂工人写作组(7·51)
 做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评《杜鹃山》中雷刚的一枪……………君 葳(7·53)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范中柳(7·55)
 “礼多人不怪”吗?……………文 波(7·56)
 也谈“份内、份外”……………唐戡国(7·57)
 加强纪律性
 ——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一点体
 会……………方 海(8·3)
 井冈山油灯红又亮
 ……上港五区青年工人 傅正宇(8·7)
 送枪上井冈山…上海市长宁区房管局 王少普(8·8)
 一次不平常的“交换”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李长青(8·10)
 一袋干粮见风格
 ……上海先锋电机厂青年工人 顾建国(8·12)
 红灯代代有人传……………龚 青(8·13)
 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申 越(8·15)
 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学习《〈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一点体会
 ……方 海(9·37)
 要教育党员带头继续革命
 ……中共上海吴泾热电厂委员会(9·40)
 怎样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9·42)
 定额制度也有资产阶级法权吗?……………(9·46)
 漫话私有制的起源……………康 立(9·48)

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洪立新(12·3)
 坚持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的调查
 ……《文汇报》通讯员、《文汇报》记者(12·6)
 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
 ——谈谈为农村办好函授教育的体会
 ……中共上海市教育局委员会(12·11)
 必须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杨希康(12·14)
 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河口海岸研究室(12·17)
 不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旦大学延风(12·18)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9·3)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翟 青(9·4)

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魏永征(9·11)
 论阮氏三兄弟……………陈大康(9·15)
 论晁盖……………杜恂诚(9·19)
 《水浒》改名的启发……………徐 震(9·22)
 宋江的“反诗”…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仲富兰(9·24)
 青年工人谈《水浒》
 ——八月廿日座谈会的发言纪录……………(9·25)
 《水浒》研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综述……………(9·29)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思鼎(10·24)
 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翟 青(10·32)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余秋雨(10·38)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徐缉熙(10·44)
 试论吴用……………章智明 完绍元(10·48)
 评宋江“上山”……………石 川(10·52)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
 ——《水浒》杂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方 群(10·55)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
 ……中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10·56)
 宋江的“借”和“买”……………五七农场 杨建文(10·58)
 “胡敲”与“葫芦”……………上海柴油机厂 黄来纪(10·59)
 权谋和宋江……………上海电机厂工人 周勇闯(10·60)
 方腊传……………齐 矛(10·63)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思鼎(11·21)
 论《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
 ……康 立(11·28)
 宋江与武训……………洪延青 杜恂诚(11·31)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徐 震(11·33)
 “呼保义”新考…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 费秉勋(11·35)
 “风宪衙门”及其他……………石 岩(11·37)
 评《水浒》的人性论……………翟 青(12·21)
 《水浒》与“国防文学”……………红 宣(12·26)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
 ……复旦大学工宣队员 汪祖根(12·30)
 《水浒》中的上山与下山
 ……上钢五厂工人 彭大华(12·31)
 识破“潜身”术……………严栋生 马宝英(12·33)
 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
 ……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 沈 津(12·34)

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史研究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
 ……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1·3)
 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申 越(1·7)
 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孙乐英 陆丽芬(1·11)
 女皇帝武则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
 ……胡申生 冯丹枫 黄龙珍(1·16)
 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
 ……上海焦化厂 劳 初(1·20)

- 评淮西之捷
——读《旧唐书·李愬传》……罗思鼎(2·43)
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红 宣(2·49)
“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陈旭麓(2·54)
沈括和《梦溪笔谈》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二
……韩天宇 王国荣(2·61)
对《论淝水之战》的几点意见(读者与编者)……(2·65)
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吴乾兑(6·62)
评黑格尔对孔学的批判
……上海汽轮机厂 郭哲祖(6·65)
《秦献记》和《秦政记》的写作年代……沈 澹(6·70)
关于荀彧的死和他的政治倾向(读者来信)
……南开大学哲学系73级工农兵学员 韩 强(6·72)
“眼前二万里风雷”
——评《儒法斗争史话》……黄 霖(12·61)
汪精卫卖国记(上)……史 锋(12·69)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 创造奇迹的人们
——记金山工地的日日夜夜……金盛曦(7·58)
新泾一年……本刊通讯员、记者(7·68)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焦 沅(10·3)
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10·7)
社队工业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亭子大队党支部(10·11)
一个技术落后的行业实现了自动化
——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
……本刊记者(10·13)
改造老设备 创出新水平
……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10·17)

学根本 抓路线 普及大寨县

- 苦战一年 建设大寨县
——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11·3)
堵住资本主义道路 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 丁巧生(11·8)
农业学大寨 穷队赶富队
……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 徐连生(11·10)
要想山河变 就得艰苦干
……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 金照根(11·12)
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
……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11·14)
前进路上又一年……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11·16)
华西见闻……金盛曦(12·80)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史 锋(1·24)

要胸有全局

-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关良 王耀坤 孔幼贞(1·31)
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唐思汶(8·18)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史 锋(8·23)
团结战斗的凯歌
——直罗镇大捷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吴云乡(12·64)

经济问题研究

-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
……余惕君 仇肖群 郑树清 宣玲玲(1·35)
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1·45)
我们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1·49)
战天斗地的杰作
——记上海郊区八十个粮食亩产二千斤以上的高产队……凌 岩 袁夏良(2·66)
医疗器械用上了先进的技术成果
——上海市发展精密医疗器械工业的调查
……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革命委员会调查组(2·7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续一)……陶友之(2·76)
国际执手的真相
——评最近两年苏修对外贸易
……上海师大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戚士毅(2·81)
阿拉伯国家石油斗争的前前后后……秦正先(2·85)
“两泵”对比以后……
——上海水泵厂访问记……本刊记者(3·65)
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3·71)
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执行社会主义政策
……立新船舶修造厂党委书记 袁广夏(4·52)
试论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关系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樊 秀(4·54)
反对“平方米挂帅”
……上海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五〇三工程队党支部书记 周连喜(5·40)
按社会主义原则办好社队企业
——上海县新泾公社加强对社队企业管理的调查……上海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5·42)
为缩小三大差别而战斗的人们
——上海市国营农场调查散记
……袁夏良 赵锦绣 侯汝蔚(5·46)
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专政……官效闻(6·49)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上)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6·52)
“公事公办”
——发生在凤城大队的故事……宋兴峰(6·58)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8·62)
抓纲促钢 大干快上……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12·36)
商业工作要努力为工农兵服务……戴 泉(12·38)
人民饭店为人民……徐 堃 吴宗英(12·40)

立足工农兵 服务无止境
……中共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委员会(12·45)

学哲学 用哲学

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方海(11·62)
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
……胡润松 完绍元(11·66)
辩证法开出技术革新之花
……上海电器电镀厂党支部书记 王连庆(11·69)
三十万与三千万……李关良(12·48)

文学史研究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余秋雨(8·30)
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第一章
……刘大杰(8·41)
批判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
——试论唐代古文运动
……上海牙膏厂青年工人 郭成兰(8·51)
漫谈看一点文学史……徐缉熙(8·58)

文艺评论

读《朝霞》一年……任 侠(1·52)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 楼乘震(1·58)
读《红与黑》……刘大杰(1·61)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杜华章(3·50)
附:交换(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
由“结合部”想到的
——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
……上海味精厂工人 杜恂诚(3·63)
“我是共产党员”!
——读短篇小说《洪雁度假》……杜华章(4·39)
“种子”寄语
——看中国画《给妹妹回信》有感……徐国芬(4·42)
谈“出冷门”……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4·43)
从“适得其所”到不得其“所”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方泽生(4·45)
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后感
……高义龙(10·20)
读鲁迅的诗论……石一歌(11·38)
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刘大杰(11·42)
略论《文心雕龙》……志培松笔(11·53)
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札记……石川(11·57)
努力塑造好银幕上的英雄形象
——看影片《第二个春天》札记……石川(12·50)
读诗漫评……徐缉熙(12·55)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
的调查……何欣(3·73)
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规划……(4·64)

上海实验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草案)……(4·65)
继续沿着开门办学的方向前进
——谈谈我校今后几年教育革命的规划
……中国“五·七”中学党支部(4·68)
办好社会主义的工科大学
……中共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委员会(7·74)
努力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
……中共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委员会(7·80)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10·73)

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

西双版纳来信(续一)……吴文虎 姚纪梅(1·75)
西双版纳来信(续完)……吴文虎 姚纪梅(2·94)
赣南纪行……吴文虎 曹溶(7·90)
赣南纪行……吴文虎 曹溶(8·89)
赣南纪行……吴文虎 曹溶(9·70)

社会调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章智明(1·70)
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 阎水金(3·77)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 陆晓禾
当你通过红绿灯的时候
——一个交通岗亭的工作日记……陈雨石(5·51)
他们是怎样当好生产参谋的?
——对一个单位坚持调查的调查
……章智明 王之璋(7·85)
上海女篮访问记……沈逸珍 李海生 陆晓禾(8·72)
翻砂工人话革新……任菁(10·76)
“电子迷”的故事……李海生 陆晓禾(11·71)

杂文·小评论

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周立安(1·23)
“小锅菜”里有大方向……陈熙春(2·92)
观招牌有感……龚青(2·93)
三分钱盐还得好!……树清(3·48)
读苏修《真理报》的书评有感……李海生 王秉森(4·63)
学理论不能等待……中华造船厂 高志仁(6·45)
评“吃得开”……求新造船厂 章智明(6·47)
为谁辛苦为谁忙……新新机器厂 郑世瑶(7·28)
2-1=?……沪东造船厂船体车间“雄鹰”班(9·51)
没有想到……
……上港一区 任慈杰(9·55)
灵牌小议……延风(10·71)
从配棋子想到的……完绍元(12·47)
并非小事……陈大康(12·60)

人物传记

鲁迅传……石一歌(4·72)
鲁迅传(续一)……石一歌(5·57)
鲁迅传(续二)……石一歌(6·75)
鲁迅传(续三)……石一歌(8·78)
鲁迅传(续四)……石一歌(9·57)
鲁迅传(续五)……石一歌(10·81)
鲁迅传(续六)……石一歌(11·76)

一九七五年

第十二期

总第二十八期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